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MAOZEDONG
ZHEXUE
SIXIANGYANJIU

辽宁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李 哲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Maozedong Zhexue Sixiang Yanjiu

李哲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号) 沈阳市第十三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0,000 开本: 787×1092¹/₃₂ 印张: 13³/₈
印数: 1—1,5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志华 责任校对: 周全
封面设计: 孙明

统一书号: 2090·80 定价: 2.00元

目 录

绪 论

-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
-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11
-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19
-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26
- 五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32

上 篇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认识论的观点.....42

- 一 以社会实践为特征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43
- 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49
-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6
- 四 认识的辩证过程.....62
- 五 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69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矛盾的学说.....76

- 一 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77
- 二 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83
- 三 要特别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91
- 四 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97
- 五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104
- 六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109

七 要学会客观地、全面地和本质地看问题·····	114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运用·····	121
一 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	122
二 充分发扬符合战争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127
三 正确处理战争中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	133
四 根据矛盾的转化适时转变党的军事战略·····	138
五 善于化劣势为优势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143
六 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	151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159
一 正确分析国情是党创立革命理论,制定纲领、路线的基础·····	160
二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164
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168
四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战略方针·····	174
五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179
六 统一战线是革命和建设的法宝·····	188
第五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197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197
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207
三 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19
第六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	232
一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232
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39
三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244

四	抓住中心带动一般·····	250
五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257
六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263

下 篇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第七章	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270
一	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270
二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278
第八章	重新确立并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85
一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党的 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	285
二	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	293
三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	298
四	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304
五	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310
第九章	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318
一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规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依据·····	319
二	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前进， 讲求实效·····	327
三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35
四	逐步建设中国式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344
五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352

第十章 科学地认识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	358
一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359
二 正确认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改革并 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367
三 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阶级斗争	376
四 重新确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 生活的主题	384
第十一章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393
一 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	393
二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发扬群众路线的 优良传统	402
三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411

后 记

绪 论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包括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的哲学论证；对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哲学分析和批判；对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教给我们以方法。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

智慧的结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以及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历史要求。实现这个历史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近百年来，由于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中国，振兴中华，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多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直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实现解放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此后不久，即一九二一年七月，又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欧洲地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得到了广泛传播，各国陆续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列宁的倡导和关怀下，成立了有三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参加的共产国际，促进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在这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要不要、能不能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课题，成为各国革命兴衰成败的关键。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同西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正如列宁向东方共产主义者指出的：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由于在中国共产党内一度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仅没能完成列宁所提出的任务，反而使中国革命在有了马列主义之后，依然一再遭到严重的失败。

实践证明，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并不能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科学的世界观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特殊、复杂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政策和方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革命的独特条件和丰富经验，以及中国古老文明的哲学传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一方面博览群书，广泛接触中外思想史上的各家学说，特别是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广泛参加社会实践，当兵，办工人夜校，作农村调查，“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②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同志热切地搜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自觉地同工人阶级相结合。他主办

^①《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8页。

^②转引自《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1页。

《湘江评论》，领导湖南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从事发动和组织湖南自治运动的革命实践，对于促使他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自己说的：他的思想曾“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后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和一九二一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先后给蔡和森等同志写信和在新民学会年会上发言，深刻批驳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及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明确表达了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标志着青年毛泽东由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以及他早年对中国历史、哲学的渊博知识和修养，他对中国社会的悉心考察和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逐步结合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思想路线、工作路线的历史过程。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革命经验，在许多重大决策上主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在对陈独秀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斗争中，我们党的许多领导者开始对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作独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版，第31、39页。

立的探讨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代表作，这些著作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受到了极大的锻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革命道路。在同当时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提出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从社会调查中决定斗争策略，以反对主观主义。可以说，这是联系到革命的指导、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开端，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萌芽，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始。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它极其尖锐鲜明地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这篇著作通篇的精神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①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还明确提出并论证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共产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只能产生于群众斗争中，产生于实际经验中等思想。这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形成并得以坚持的科学方法。所有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①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4页。

②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8页。

盛行的情况下，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勇气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这篇著作中都已初步提出来了，并且相当深刻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是第一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最初十年中同右的和“左”的错误斗争的哲学总结，是毛泽东同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革命理论著作的哲学概括。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反对本本主义》的深刻思想，当时并没有被全党所理解和接受，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在全党还没有解决。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①这时全党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汲取了失败的教训，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们党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已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对它们的哲学概括。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3—754页。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极大损失。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哲学总结。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不可能达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阅读了当时可能搜集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哲学界著作的中译本，阅读了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批判地汲取了前人和同代人已有的科学成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同志连续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这“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我们党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们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原理的阐述上特有的完整性、明晰性和创造性。同时，它们又深深地蕴藏着中国革命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新鲜经验，而且汲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遗产。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又是中国民族化的哲学。《实践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其基本思想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矛盾论》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从理论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为在实践中正确地分析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两论”为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两论”发表之前，毛泽东同志曾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两篇

文章。这两篇文章完整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政治策略的诸问题，为了清算“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倾向。并且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这两篇文章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先导。“两论”中许多精华的思想，在这里都结合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相当系统地提了出来。

在《实践论》、《矛盾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写出了许多包含丰富哲学思想的科学著作，这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并向多方面的展开。毛泽东思想构成了包括我们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各个方面的、完整的、丰富的科学体系。贯串于这个科学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都是在这个时期内以明确的语言、完整的形式提出来的。它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而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创性的内容。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以及《论联合政府》等等，都既是卓越的政治、军事著作，又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是直接为了解决党的思想路线而写的，以后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整风报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都是我们党解决思想路线的重

要文献。延安整风作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理论上清算了党内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从全党重要领导骨干的思想上，从全党形成系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作风上，确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的历史地位。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号召全党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党的七大以后，由于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全党所接受，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新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解放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在更广泛的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

首先，毛泽东思想关于战略和策略的观点大大地发展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根本战略思想，后来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这一讲话中，完整地、科学地论述了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不要四面出击》一文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这些都

是运用辩证法制定无产阶级政党战略策略原则的范例。

其次，毛泽东军事思想大大地发展了。解放战争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毛泽东同志总结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制定的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的作战方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军事领域中新的运用和发展。

再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大大地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两类矛盾的学说，批判了国际上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但是，在胜利面前，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出现了主观主义的偏差，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了加强调查研究、端正思想路线。一九六一年，党内重印了《反对本本主义》，同时毛泽东同志给党内写了好几封信，强调调查研究，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后，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这种恢复工作

没有进行到底。相反，毛泽东同志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他的主观主义由于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以致造成十年内乱。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丰富发展了。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由于它产生于中国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解决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遇到过的极端复杂和特殊的中国革命问题，所以它不能不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独创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总结和概括，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论证

毛泽东同志由于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心，他始终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②他坚持世界观与方法论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5页

的统一，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明显的特点，是紧紧地抓住人类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碰到的最基本问题，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这里包含着哲学的全部问题：承认在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两者中间后者是本原，这是唯物论；两者又是对立的统一，这是认识的辩证法。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三个基本方面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要求我们着力于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而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要求我们按照实际情况而不是按照任何本本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同志把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实践，同时看作是历史唯物论的范畴，创造了我们党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同志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仅是指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的力量基点上，同时也是指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同志的矛盾学说讲的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同时也是认识的辩证法。他从辩证法原理上论证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违背马克思列宁

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哲学批判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始终担负着繁重的实际领导工作，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在书斋里从事系统的学术研究和著述。他的哲学著作完全是为了总结革命经验、指导革命实践的。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主要不是在学术领域同以完备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派别进行论战，而是以全部注意力集中批判在革命实践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批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作中的错误思想路线，即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的教条主义。

什么是主观主义？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主观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②他从哲学上分析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形态、特征和实质。主观主义不看事物的全体，不触及事物的本质，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主观主义者的思想离开社会的实践，静止地看世界，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或者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看作真理。他们把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把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页。

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并颠倒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①“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②即使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只要自己的思想不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就必定要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深刻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而“本本主义的科学研究法”，“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③因此，结论只能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④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批判主观主义的锐利武器。

①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②③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5、4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实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 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的理论

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领域，形成一整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毛泽东同志毕生致力于哲学的解放，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首先是成为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即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我党一再强调“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①毛泽东同志论军事、论政策、论策略、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大量著作，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它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是统一的。在我党历史上，每当在解决政治路线、克服某种错误倾向等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总是从认识路线着手，把问题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批判主观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就不限于军队建设的具体问题，而是着力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首先提出的不是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认识论问题，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问题，解决如何着重研究中国革命战

^①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4页。

争的特殊规律问题。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必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我们党干部思想和行动的准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要求。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是唯物史观的系统运用，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生动体现。

强调充分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由此形成了我党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一整套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我们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创造革命新局面的一整套工作方法和优良作风。

如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既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又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在统一战线中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等等，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化为党的工作方法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矛盾学说，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矛盾的科学方法。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思维的民族，具有古老的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在很早以前，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就提出了知行问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长期争论不休。正是与这种传统影响有关，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紧紧抓住了知与行即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具体阐明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从而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使之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许多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其中有些著作已经猜测到了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猜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如《易经》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初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

步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又如《道德经》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明矛盾双方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和改造。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解释了“相反相成”这一古代哲学命题，他指出：“‘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系起来，获得了同一性”。^①毛泽东同志把相反相成的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对战争过程中胜与负、优势与劣势、内线与外线、战略与战术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分析，也都贯穿着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

“实事求是”一语，中国古已有之。《汉书·河间献王传》称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当时只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毛泽东同志则给予科学的解释。他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的语言，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作了简明而深刻的表述，概括了我们党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还借用中国古籍、文献、文艺作品甚至民间的成语、谚语、寓言、故事等，来说明唯物辩证法的道理。如他引用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话，来说明要了解矛盾双方，全面地看问题，切忌看问题的片面性；借用“愚公移山”的寓言，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

毛泽东同志还成功地运用我国传统哲学的表述形式，对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等各个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哲学概括。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战略上“以一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8页。

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团结——批评——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毛泽东哲学思想独具的民族特色，使它能够迅速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在许多问题上有它特有的系统性、明晰性和创造性。它在系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或者系统地展开那些前人虽已提出但未展开的哲学命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一）抓住哲学基本问题，深刻地阐述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务”^①。列宁讲得更明确：“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②“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③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的这个思想阐述得更加明确了，进一步揭示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他明确地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④。

首先，这是以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基本原理为前提的。毛泽东同志在肯定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对物质的反映，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具体的物质形态和具体的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个科学的概括，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回答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又贯彻了唯物辩证法，发展了思维存在同一性的思想。这同只承认精神变物质，否认物质变精神，把精神夸大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是根本相反的；同认为世界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本原的二元论也是根本对立的。这个科学概括又同只承认物质变精神，而否定精神变物质，不懂得精神不仅反映世界而且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机械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其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本来含义，讲的就是人们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制定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④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4页。

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措施，这就是物质变精神，即认识世界；人们根据这些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措施去实践，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这就是精神变物质，即改造世界。可见，在本原和派生的关系上，精神和物质的对立是绝对的，本原的不能变成派生的，第一性的不能变成第二性的，反之亦然。但是，一旦超出本原和派生关系的范围，进入物质和精神的反映和被反映、改造和被改造关系的范围，它们的对立就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仅物质可以变精神，而且精神可以变物质。

第三，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有条件的。这里讲的变，是既需要有物质条件，又需要有精神条件，特别是有实践这个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①。强调规律是客观的，要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充分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只有把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实践，才能使物质和精神互相转化。

（二）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全面系统地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和发挥，是在深刻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来的。他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②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5页。

列宁关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①毛泽东同志在肯定了列宁关于一般和个别互相联系的思想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一般和个别在不同的场合是互相转化的；把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相互关系的理论上升为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为什么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来说，因为任何事物，任何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对立统一，即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所以正确反映这种对立统一的道理就成了矛盾问题即对立统一学说的精髓，它贯穿于唯物辩证法的每一个原理之中：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的具体表现是特殊的相对的；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的同一性即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具体的矛盾斗争性质和斗争形式又是特殊的相对的。可见，只有懂得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这个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道理，才能深刻理解和真正掌握唯物辩证法。相反，割裂了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相互关系，认为相对只是相对、绝对就是绝对的观点，就是不懂得矛盾问题的精髓，就是抛弃了唯物辩证法。

^①《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9页。

正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一般是在于个别之中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不仅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各方面，各个事物发展阶段中的矛盾，各个发展阶段中矛盾的各方面，都各有其特殊性。只有在一般原理指导下，深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具体分析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才能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而丰富和发展关于事物的共同本质和共同规律的认识，而使这种一般原理不致变成僵死的东西；做到从实际出发，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

根据这个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反，不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错误，都是片面地夸大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个别方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三）抓住实践第一的观点，系统地阐述了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认识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认识路线具体地描绘出来，把解决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的这个辩证途径揭示出来。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开始是感

性认识，感性材料经过头脑的加工，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即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然后拿这种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检验和发展认识，这又是一次飞跃，由认识到实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这两个飞跃的辩证思想是对于整个人类认识过程的科学分析和概括。然而，因为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决不是经过一次实践和认识就都能看透的，所以，只有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才能取得正确的思想。又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①人们要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普遍规律，这样才能防止思想僵化。总之，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认识的发展是一个主观和客观反复地相统一的辩证过程，实践是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想相互转化的中介、桥梁。这就进一步地揭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辩证统一，把认识论牢固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又把辩证法彻底地贯穿于认识论之中，突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彻底地同精神产生物质、精神外化为物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划清了界限，同脱离实践、否定辩证法的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划清了界限。把上述理论归结到一点，就是教导我们做工作要注意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起来。

（四）抓住社会基本矛盾，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社会意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理论的基础上，又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①

首先，指明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毛泽东同志坚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要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次，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一是从矛盾性质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二是从矛盾的地位和作用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第三，指明了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正确方针和方法。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人民内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2—4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7页。

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

第四，指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①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是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旺盛的生命力，既没有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也绝不会因为毛泽东同志逝世而停滞、枯萎。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日臻成熟的理论表现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其历史条件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有相似的情况：即都面临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艰巨任务，都要求回答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新的历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0—491页。

史课题，都集中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斗争。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思想上坚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从指导思想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都清理了“左”的错误，有力地实现了全面的拨乱反正。真理标准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罕见的全党全国规模的哲学大讨论，这场讨论促进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进行，解放了全党的思想，恢复了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从而使党中央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但没有认真、系统和一贯地实行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正确地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比较完整地、准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我们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战略目标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我们党正是在实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在全党的集体实践和理论创造中，把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我们党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它包括：一、在历史性转变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二、对被“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搞乱了、背离了的一些正确原理的重新肯定和正确阐发，对一些错误倾向的哲学批判；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鲜经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些理论原则的充实、发挥和丰富，作出了一些新的哲学概括，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原则。

（二）邓小平同志是新时期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

《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在这一时期的斗争实践和理论创造，是伟大历史性转变的理论表现。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一篇宣言。他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反对思想僵化、端正思想路线的先声。他在党的十二大上的开幕词，是开创新局面，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文选》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历史经验，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典范。

《邓小平文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大纲，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实现四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正确方针，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第一次提炼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指出这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关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独创性的理论。因而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出了科学方法。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我们党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党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开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我们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地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自己的成功经验，用实践的观点认识和研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设想作了补充、修改和发展，既纠正了过去把马列著作某些论述教条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绝对化的错误，也克服了新的教条式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认识论的实践标准，在这几年如此深入人心，赢得这样的权威，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的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现、运用和发展。它真正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外国模式的束缚，生动地深刻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党确立了稳定地健康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道路，提出了促进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这是我们党全面地清理和纠正过去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脱离国情、超越实际可能性、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的“左”倾错误的结果。表明我们党在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和我们主观之间的矛盾方面,大大前进了,对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我们党正确处理了速度与效益、积累与消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实行计划经济与发展商品经济、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经济建设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等等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工作领域坚持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矛盾的学说,把辩证法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具体化。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具体发挥了、丰富了并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理论。我们党重新周密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得出了一系列科学结论,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在实践中真正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明确了人民和敌人的范围,如实地认识新时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法律上、制度上和政策上解决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运动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总的原则和基本方向,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在上层建筑方面,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民族、统一战线等理论原则。

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原理,系

统地运用于我们党的革命实践，形成了我们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将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方针。新党章在党的领导制度和党内政治生活中作了一系列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防止个人崇拜和权力过于集中的规定。我们党明确指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把“一切为人民”当作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总之，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运用已经发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并且使之法律化、制度化。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曾从不同方面和在不同程度上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但是，把这方面的任务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样一个理论命题，明确规定这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并用实践的观点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含义及二者内在的辩证关系，提出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首先是一种运动。这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原理，观察人类社会进步和社会生活发展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独创性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方面也进行了拨乱反正。特别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原则。正确规定了党同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阐明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等等。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认识工具。毛泽东同志也一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正象他所说过的，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人民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同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实现新的伟大转折，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无不是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取得的新胜利。

五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央领导同志曾一再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曾发出通知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在党内曾经流行过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对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罗列各种现象，不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主观地轻率地决定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曾经对我们党造成很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总结了这一段的历史经验，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坚持和倡导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分析和说明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著作，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范例，是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范例。学习这些著作，就是从我们党的历史事实中，通过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思想方法和作风的比较，来领会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时，是怎样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从而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党的干部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克服主观主义、片面性和其他错误思想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提高研究新情况、正确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一）新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重新学习

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①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全面开创建设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党的状况，迫切要求全党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掌握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这是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关键。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当转折关头，每当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正确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是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总是把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分清理论是非，统一全党的思想。遵义会议以后，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由于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才把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延安整风的根本经验，就是从思想理论上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达到主观

^①《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和客观的一致。建国以后，在五十年代后期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虽曾有所察觉和纠正，却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以致愈来愈严重，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仍在继续，使全党付出了重大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行了拨乱反正，为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首先是从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为这种“结合”，为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和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也是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独创性的科学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这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和发展战略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要达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之统一，主观与客观之统一。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党的状况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我们党内这种状况“还在许多方面同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加强党的建设，完成整党任务的强大理论武器，党中央一再强调要着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73页。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我们党最基本的思想建设。我们要通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使全党、首先是党的各级干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使党的新时期的正确路线，成为人们坚定不移的意志和信念，成为亿万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成建设新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就我们党在各条战线、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来说，总结经验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对此，党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自己主管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办法。我们的许多同志还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不善于从世界观的高度去思考，不善于对自己周围的环境作周密的调查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使之上升为理论的认识，以指导今后的实践。这样的同志尽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却不能从错误和挫折中变得聪明起来，反而陷入盲目性。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我们总结经验的锐利思想武器。

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思想方法的核心是要搞辩证法。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流毒很深，至今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很僵化，好搞绝对化。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很不利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找出新办法，开创新局面。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它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一种考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

的科学方法，学会比较全面地看问题。

总之，各行各业的干部，都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哲学基础，都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二)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反对两种倾向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成科学看待。”^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科学，我们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它。所谓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要学习它，运用它，既坚持，又发展。不坚持它的科学原理，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不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它，也就不可能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它。为此，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另一种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价值持怀疑态度。

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曾一度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哲学观点神圣化，认为毛泽东讲的一切哲学观点是创见。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这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但是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怀疑、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价值。他们不懂得哲学创造和继承思想资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懂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离开这个结合和运用，单纯从哲学概念、命题和原理上比较，无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实践中起到如此巨大指导作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说成没有什么新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其研究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法仍然是教条主义的。

有的同志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运用。他们不懂得没有运用就没有发展，运用和发展是辩证的统一。斯大林在论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时就说过：“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但是，“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①任何一门科学，当它运用于一种新的领域或现象并取得成功时，必然揭示事物的新的方面，从而丰富和发展它自己。而且，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本来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而每一次按照科学方法的循环，都将使人类的认识提高和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列宁主义一样，都是这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任何科学著作都不能不受一定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同志的闪烁光辉哲学思想的科学著作，是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革命胜利的产物。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②无论过去有人利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制造先哲一类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或者现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0—6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在有人抓住只言片语不尽科学，散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怀疑，都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某些论点提出疑问，发生争论，原因之一是在实际生活中对这些论点有过“左”的曲解，毛泽东同志晚年也曾把过去获得的某些真理绝对化，弄过头，使真理成了谬误。因此，我们在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的时候，必须继续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属于经过实践证明的普遍原理，哪些是属于阐述或执行中产生的偏差，特别是要把“左”的思潮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解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容区别开来。比如十年内乱期间所谓的“斗、斗、斗”，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矛盾学说的曲解。有人把两者混淆起来，说《矛盾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源，显然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矛盾论》正是批判王明“一切斗争，否定联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政策的产物。

《矛盾论》讲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就是针对王明“左”倾错误而提出来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的哲学表现。

《矛盾论》这样来展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论述同一性在矛盾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贡献。《矛盾论》提出关于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的原理，关于斗争的绝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相对性的原理，也都是为了从理论上纠正只强调斗争而不讲究斗争方法和策略的错误倾向的，所有这些，既同苏联三十年代片面强调斗争的错误倾向根本对立，也同所谓“斗、斗、斗”根本对立。

（三）理论联系实际，把学习和运用结合起来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原则和

根本方法。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必须把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著作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理解为仅仅是《实践论》、《矛盾论》，或者以为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就是找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成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哲学，都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割裂，这样既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不能实际地、具体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必须把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同学习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密切结合起来。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内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源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如果离开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去孤立静止地学习和研究，那就不可能深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不可能深入了解毛泽东同志是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考察中国革命具体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积累了丰富生动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概括成理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寓于党的革命实践之中又指导党的革命实践，离开了党的革命实践就没有生命力，我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三必须把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结合起来，同整党结合起来，继续清除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影响。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

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只要我们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我们就一定能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上 篇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 认识论的观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他还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论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起来。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认识论的观点，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毛泽东同志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反复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说哲学就是认识论。我们不仅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其他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实际

问题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全面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论观点。

一 以社会实践为特征的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论观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三七年《实践论》的发表，我们党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实践论》从哲学高度总结了这段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确立党的科学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失败，除了在客观上由于敌人过于强大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由于当时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由于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仍然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来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交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由于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由此看来，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不是以系统的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不是直接否定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基本原理，而是轻视中国革命

的实践，认识脱离了中国革命实践，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毛泽东同志为了在哲学上清算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思想，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科学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他抓住了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论述了认识的根本任务是在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去努力地改造主观世界，使主观符合客观，从而达到为人类服务的目的，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科学论述，既肯定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又承认了认识的能动性，坚持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既同唯心主义认识论划清了界限，也同旧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直观的反应论划清了界限。

概括起来说毛泽东同志是从三个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的：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625页。

（一）实践性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的一个基本特征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多方面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能动性。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的一种“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客观的活动”,同时这种活动又体现了人的“主观方面”、“能动的方面。”^①并且指出人们的反映就是在这种客观的能动的活动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列宁更明确地把实践称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他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②人们就是在这种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行动中去反映和认识世界的。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一个最基本特征。

毛泽东同志在同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明确地把实践概括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指出实践就是“做或行动”,这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即“自觉的能动性”。^③毛泽东同志这一理论概括,极其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它说明实践既不是停留在主观范围的概念活动,也不是离开人的主观的纯粹的物质活动。也就是说,它同自然界那种自发的运动,同生物界适应环境的那种本能活动是有本质区别的。它表现为主观活动和客观活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辩证的统一,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才能实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页。

首先，正确的反映只有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才能实现。承认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是一切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共同点。但是，主观怎样反映客观呢？是消极适应，直观的反映吗？这种反映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正确的认识是在能动地变革世界的物质活动中产生的，物质的东西只有通过改造世界的活动才能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这是因为作为认识的客体即外部世界，它的本质、内部联系和规律性一般地不能静止的、直观的反映到人的意识中来，往往要在对它的变革中才能显现出来，并被人们所反映。因此，离开了人的能动作用、实践作用、变革作用，就无所谓正确的反映。这同那种只把客观实在看成是认识来源，否定实践是认识源泉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有根本区别的。

其次，正确的认识只能通过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结果去判定。毛泽东同志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①这就是说，不仅人们的反映是在能动地变革世界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而且这种反映是否正确，也要由这种能动地变革世界的活动结果来证明。如果离开了这种能动地变革世界的物质活动就会陷入真假难辨、是非难分的主观标准论。

这两个方面都清楚地说明了人们的反映过程是主观和客观、意识和存在的对立统一的过程。主观和客观既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双重关系中，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人们改造着客观世界，也改造着自己的认识能力，使正确的反映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所以只有懂得了实践是客观性和能动性的统一，才能从根本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上弄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二) 认识的辩证发展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又一个基本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指出了人们认识过程中的特殊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的辩证关系，说明认识是一个不断地能动地深化的辩证过程。列宁对认识的辩证发展作了更加明确的原则概括，提出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性和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认识过程展开了具体地分析和论述，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次能动性飞跃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能动性和辩证发展的性质。

人们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从个别性的认识上升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又能动地运用理论去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如果没有这种能动的革命的由个别性的认识上升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的飞跃，人们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内部的规律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变革事物的目的。人不仅有多种感觉器官，能够从各个方面捕捉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人还具有高度发达的特殊物质——大脑，可以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抽象，把握事物本质的特征和内部的规律性。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过程，是一点也离不开主观能动作用的。

如果没有从理论向实践活动的能动飞跃，人们就不能有

效地改造世界。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认识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能动作用。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不是消极的适应自然，做自然的奴隶，而是把自己的思想、行动愈来愈多地打印在自然界上，改造自然界为人类服务，使人类逐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又说明，人在改造世界活动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是离不开主观能动作用的。

这两个飞跃的思想，从认识过程的能动性和辩证性上揭露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指明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三）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具体体现

中国革命是在情况极端复杂、敌人十分强大的条件下进行的，革命者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充分发扬主观能动作用。但是，这种主观能动作用必须同客观规律相符合。人们的认识就是在不断地解决自觉的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这对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①又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②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客观物质条件和对客观事物本质认识及内部规律性的掌握程度为基础的，否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6页。

则只能是盲目性、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内部规律性的基础上，可以利用这个规律去创造条件和改造条件，夺取工作的胜利。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越深刻，对其内部固有的客观规律掌握得越准确，则自觉的能动性发挥就越充分，其作用就越大；反之，自觉的能动性发挥越充分，它的作用就越大，也就越表明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更正确、更深刻。人们的认识就是在这个自觉的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得到深化，形成了人们认识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无限过程。

总之，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大贡献。在今天，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论述，对于我们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加快四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伟大革命。《实践论》一开始就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①毛泽东同志这一论述，说明了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指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

关于实践在认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基本原理方面分别都作过论述。毛泽东同志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9页。

的贡献在于，他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用实践的观点把认识的源泉和发展过程、检验认识的标准、认识的目这些认识论诸问题串起来，具体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认识基础的原理，阐明在实践基础上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同否定实践在认识当中的决定地位和作用的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

（一）实践是认识的源泉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承认认识是对存在的反映，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特点。但是，旧唯物主义把认识看作是消极被动的反映，不懂得实践在认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认识领域，才说明了认识的来源，说明了认识只有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才能产生。客观事物只有在被改造的过程中，它的本来面貌才能暴露出来，使人们得以认识。感性的直观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实践能够把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起来，从而产生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①

教条主义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用马列主义为指导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才能获得，只有应用马列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才能产生。他们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否定直接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

经验对获得真知的重要意义，把外国的经验和马列主义的词句绝对化和神圣化。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着力阐明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指出：“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①教条主义者贬低直接经验，甚至把强调亲自参加革命实践的同志，诬蔑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这就不但表明他们在认识来源问题上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窍不通，而且也表明他们在实际上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证明他们反对的不是什么“狭隘的经验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进行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各种矛盾极其复杂。如何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谁的命？对这些重大问题，马列主义的书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亲身实践，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对象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路线和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针对着党内一些同志，不知道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和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明确提出：“人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5页。

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①反复提出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针对教条主义脱离实践的根本错误，反复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但也并不否定学习间接经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②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但不否定认识的相对独立性，不排斥学习间接经验的重要性。就一个人的知识来讲，多数是从间接经验获得的，但这对前人和他人来讲也是直接经验。所以，就知识的总体来讲，任何知识的获得，都必须经过直接经验这一环节，归根结底都发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教条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学习本本，而在于他们理论脱离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人的认识不仅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且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只有实践的需要，才使它们进入认识领

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1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

域，成为认识的对象。科学研究的任务，实际工作中的课题，都是由实践的需要提出来的。离开实践斗争的需要，认识的任务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发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出现新事物，提出新课题，要求人们去研究去解决，推动着人类认识运动的不断发展。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①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根据客观实践的发展，善于捕捉实践活动中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提出新理论和新观点，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才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只有随着实践斗争的发展而发展，只有不断地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才能永葆其革命的青春，显示其巨大的生命力。中国革命是在一个矛盾极其复杂的社会中进行的，在这样的国度里，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样领导革命，怎样制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实践向东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的经验，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可是，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拒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照抄照搬旧范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看不到在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

命，已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革命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结局和归宿必然是社会主义。而把革命领导权拱手交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则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先哲一类的东西，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的词句变成万古不变的僵死教条，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实践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创立了科学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迎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还表现在认识的目的是为实践服务。认识既然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认识产生之后，必然回过头来为实践服务。实践既是认识的起点，又是认识的归宿。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①人们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任何科学知识如果没有它产生的实践的目的，它既不能发生，也没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教条主义否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也就必然要否定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教条主义研究马列主义理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论，不是为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装璜门面，借以吓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针对教条主义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特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又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②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又反复地批判教条主义者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拿来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毛泽东同志十分尖锐地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③他反复教导我们，马列主义是一门科学，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269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页。

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①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②恩格斯指出，对不可知论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③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反复论述“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④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运用马列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理，批判了教条主义的主观标准论，阐明了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

（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一切唯心主义由于否定实践在认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之中有的以“圣人之言”为标准，有的以自己的感觉和观念为标准，有的以概念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的明确和清晰为标准，有的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标准，有的以能否满足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否“有用”为标准。黑格尔虽然接近于主张实践标准，但他所讲的实践仍然是一种绝对观念的运动。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认识领域中寻找真理标准，用认识去检验认识。这样的标准都是主观的，不确定的，是完全错误的。旧唯物主义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标准。这种说法只回答了什么是真理，并没有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他们虽然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由于不了解实践的革命意义，不了解实践在认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也不能科学地解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引入认识领域，才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那么，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首先，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的本性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人的主观认识，包括思想、理论、路线、政策、计划、措施等，只有同客观实际相符合，才是真理。否则，就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所谓检验真理，就是检验人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合，符合到什么程度。要做这种检验，客观事物本身和认识本身，都不能作出回答，必须通过实践把主客观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对照，由实践作出判定。所以，检验真理的标准，既不是客观事物，也不是理论本身，只能是社会实践。

其次，实践具有把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
点，它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一方面具有主观性，因为它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活

动，具有客观性。人们通过实践活动获得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变客观的东西为主观的东西，实现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人们又通过实践改造客观的世界，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实现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实践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能将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对照，判断认识是不是同客观事物相符合，达到检验的目的。

再次，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但是理论却没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因为理论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不能直接引起客观现实的变化，只有实践才会给人们直接带来物质成果。人们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活动，如果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就证明人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相符合，就是真理；如果在实践中失败，就证明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它就不是真理或不完全是真理。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认识论基础，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对发展真理，发展科学，具有重大的意义。以实践为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离开了实践标准，必然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二）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标准的运用和发展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曾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张口闭口“拿本本来”；把马列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自吹自擂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把以毛泽东

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诬蔑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在干部和群众当中造成极大的混乱。为了从哲学上清算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①“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②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实践标准时，用的是“只是”和“只有”，说明了实践标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有力地批判了教条主义的主观标准论。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发展规律是一致的，因此，某种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就证明它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证明是真理，与之相反的则是谬误。所以，毛泽东同志教育广大党员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毛泽东同志还把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同发展社会生产力统一起来，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④毛泽东同志这些精辟的论述，都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更深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的原理展开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3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7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0页。

了，具体化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标准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坚持实践标准，同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这个认识论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论述了只有坚持实践标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马列主义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那么它还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客观世界和实践活动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列主义没有穷尽物质世界的一切方面，没有结束真理，它就必须同各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使之真理性得到完善和发展，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毛泽东同志说：“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①教条主义否定实践标准，必然否定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拒绝接受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拒绝用中国革命新鲜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真理，从而把马列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总结这个历史经验时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

毛泽东同志这些科学论述，武装了全党干部和群众，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正是运用实践标准总结历史经验，实现了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大统一。事实证明，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和挫折，往往是离开了实践标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

（三）坚持实践标准和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是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就否定或贬低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既阐明了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又阐明了理论对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首先，理论的指导作用是以实践标准为前提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指导革命实践，就是因为它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所证实，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①教条主义否定实践标准，实际上也就否定了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

其次，只有坚持实践标准，不断发展理论，保持理论的生命力，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一个科学理论接受检验的次数越多，它就越正确，越丰富，真理性就越完善，它的生命力就越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越大。实践是需要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来指导。教条

^①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4页。

义主拒绝用中国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实际上也就扼杀了马列主义的生命力，失去了它的指导作用。

再次，理论要发挥指导作用，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掌握群众，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①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全在于改造世界，掌握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教条主义拒绝把马列主义同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主义看轻理论，满足于局部经验，他们从两个不同方面否定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总之，理论只有接受实践的检验，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而只有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践才可能去检验和发展理论。它们是认识论中统一不可分的两条基本原理，既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

四 认识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同时也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马克思对理性认识的形成过程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②列宁则对整个的认识过程作过高度概括，他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

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①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从总体上勾画了认识过程的轮廓。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人类认识的辩证途径作了具体的展开和发挥，提出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的思想；对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进行了概括，提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的辩证法的原理。

（一）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

毛泽东同志以实践为基础，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认识的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第二阶段是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统一不可分的两个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但二者又有质的区别，感性认识是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高级阶段。“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②因此，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那么认识怎样才能完成这次飞跃呢？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③这就是说必须要求感性认识有一个量的准备。但是光有这种量的准备还不够，感性认识还不能自动地变成理性认识。因此他又提出了第二个条件，他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7页。

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①所谓“去粗取精”,就是要舍掉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保留确凿无误的东西。所谓“去伪存真”,就是要去掉虚假性,加强真实性。所谓“由此及彼”,就是要用发展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所谓“由表及里”,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同志的这“十六字”思维原则,精辟而具体地阐明了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思维方法和辩证途径,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辩证法的具体化和发展。

（二）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

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②为什么说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呢？第一，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上看，两次飞跃有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同志称第一次飞跃是认识的真正任务，他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而称第二次飞跃是认识的目的。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③这就是说，第一次飞跃只是认识世界，第二次飞跃才是改造世界。这个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区别。第二，就认识的正确性来看，两次飞跃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认识的第

①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

一次飞跃，只是建立了理性认识，但是它是否合于客观实际，还没有得到证明，因而也就不能断定它是否是真理。只有经过第二次飞跃，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它是否是真理。总起来说，第二次飞跃既是运用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又是检验理性认识的过程。因此，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毛泽东同志对认识过程的分析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他不仅一般地坚持了实践标准，而且还把实践标准纳入认识的过程之中，把它作为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正如他说：“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①

那么，认识怎样才能完成这次飞跃呢？

首先，必须摆正理性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理性认识能动地向实践飞跃，是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不是强迫实践无条件地服从理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②但是王明等人却摆不正二者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理论和实践相比，理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践不过是理论的奴隶，只能听命于书本。根据这种理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制定并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因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其次，必须坚持一般指导和具体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任何理论都是对事物一般性质的反映，因此，在运用于个别事物的时候，只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个别事物除了具有一般的性质之外，具有其特殊的性质。因此，在理论向实践飞跃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理论的一般指导，而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

时候，就是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但是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既不懂得只有认识了特殊，才能达到对一般的认识；又不懂得在认识了一般之后，还必须继续认识那些尚未深入研究过或者新的特殊情况。他们把一般原理千篇一律地到处生搬硬套。毛泽东同志批评说：“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原则视若无睹。”^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过程两次飞跃的理论，集中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内容，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是能动地认识世界；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是能动地改造世界。在第一次飞跃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教条主义否定感觉经验在认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而导致类似哲学史上“唯理论”的错误；经验主义片面夸大感觉经验的重要性，而导致类似哲学史上“经验论”的错误。在第二次飞跃中，教条主义由于不懂得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而否定了理论向实践飞跃的必要性；经验主义则因囿于局部经验，而否定理论向实践飞跃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过程两次飞跃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从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角度，进一步揭露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阐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必要性，阐明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1页。

结合的认识论依据，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过程辩证法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认为，认识经过两次飞跃之后，作为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来说是完成了，但对于人类整个认识过程来说，又是没有完成的。人类的认识运动是个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

（三）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关于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过程，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提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①从而揭示了认识发展的曲折性和无限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把认识的无限性形象地比喻为“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②，比喻为螺旋的曲线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继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思想，并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了具体的展开和丰富：

第一，具体地论述了认识无限性的客观依据。客观世界和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无限性，就决定了以客观世界为对象、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人类认识运动是无限的。毛泽东同志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③

第二，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一的思想。由于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①这就决定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个过程，它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人的认识必须随着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以求得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超越于客观实际，而导致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分裂。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②

第三，明确概括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③这就把列宁关于认识发展的圆圈运动和螺旋曲线运动的观点，具体化为认识和实践之间的无限循环，而每一次循环在内容上都较上一循环前进一步，这说明了人类认识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从而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过程。

第四，把人类认识无限性的理论运用到党的思想建设上，提出了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0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3页。

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因为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决定人们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类认识总规律的概括，既突出了实践在认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揭示了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同时还说明了认识发展的无限性和前进的曲折性，无论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作中，对认识的总规律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②《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总规律是就整个人类认识运动而讲的，这里是就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来讲的。这是对认识总规律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五 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 相斗争而发展

毛泽东同志提出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学说的新贡献，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273页。

^②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3页。

（一）真理是不可穷尽的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批判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和教条化的错误倾向时，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辩证关系的原理，指出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是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它又必须同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和发展。

教条主义在真理问题上的特点，是夸大真理的绝对性，否定真理的相对性，否定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个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而把真理性的认识看成可以到处乱搬乱套的万能公式。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教条主义割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把马列主义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①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针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杜林夸大真理的绝对性，到处玩弄永恒真理的恶劣行径，提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问题。列宁在二十世纪初，针对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人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鼓吹相对主义真理观的错误，提出“绝对真理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① 它们是人类认识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类的认识运动就是一个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运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思想，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②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说明了真理不可穷尽的理论根据，从而论证了马列主义没有穷尽各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方面，不可能给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把马列主义同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二）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是真理的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两次成功和两次失败之后，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看到了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概括说：“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③ 这就初步提出了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是真理的发展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的思想。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3、135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①他指出，百花齐放不仅是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也不仅是发展科学的方法，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使真理向前发展。

为什么说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呢？这是因为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歪曲的反映，二者有原则的界限，不能混淆，这是它们的对立面。同时真理和谬误又有统一性方面，这种统一性表现为两点：一是二者互相依赖，互为存在前提，没有真理作比较，就无所谓谬误，没有谬误作比较，也就无所谓真理，二者总是相比较而存在；二是它们互相贯通，因而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斗争中向前发展。

真理所以能向谬误转化，这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对物质世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正确反映，因而它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和条件，就会如列宁所说：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②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真理的适用范围，把适合一定条件和范围的真理，绝对化为普遍真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57页。

理，而使真理转化为谬误。

谬误所以能够转化为真理，这是因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部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①人们在错误或失败中，找出原因，吸取教训，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就会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使错误转化为真理。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同教条主义者的斗争过程中，更加认清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更加认识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所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人类的认识运动就是在不断地克服各种错误中前进的，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规律。

真理在批判各种谬误当中发展，这也是谬误向真理转化的一种形式。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②认识坏事，总结经验，批评错误，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坏事就可以转化为好事，人们的认识就向前发展一步。在贯彻“双百”方针上，毛泽东同志说，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要允许人家发表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当然这并非说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

对各种错误意见可以泰然处之，置若罔闻，而是通过各种意见的互相批评，互相辩论，来发展真理。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自然科学是在同宗教迷信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同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在阶级社会里，当着客观真理同剥削阶级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理，扼杀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坚持真理，就不能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甚至要抛头颅、洒鲜血，光明才能战胜黑暗，为真理的发展开辟道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先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真理的光芒是扑不灭的，光明终究要战胜黑暗，正义终究要战胜恶魔，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真理的发展仍然要通过斗争来实现，不过斗争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所以，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对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置若罔闻，泰然处之，而要理直气壮地进行批评和斗争。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怕打击，不怕报复，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这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

由于受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缺点和错误总是难免的。毛泽东同志说：“一般地说

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①因此，我们对前进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既不能大惊小怪，互相埋怨，也不能悲观失望，失去信心。而应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立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0页。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

关于矛盾的学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时，对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有过初步论述。列宁科学地考察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内部联系，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著名论断。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曾对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列宁提出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原则。

《矛盾论》继承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结合极其复杂、曲折的中国革命斗争，详细地说明和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从各个方面把矛盾学说系统化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丰富内容的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学说，讲的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同时也讲的是认识的辩证法，它为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提

供了一种考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的科学方法。

一 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在阐明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时，曾经指出事物矛盾运动法则的重大意义。恩格斯说：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①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了对立统一的学说，明确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把矛盾观点作为辩证法的根本观点，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多方面，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作了系统的发挥和深刻的论述，建立了对立统一规律的科学体系，为阐发唯物辩证法理论开辟了道路。他在《矛盾论》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如果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89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一）是否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是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

毛泽东同志发挥了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所阐明的关于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法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发展观的原理，强调指出这两种发展观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前者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实在的内容，而后者则肯定这一点。这两种发展观的其他一切分歧都是在这一点上产生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①形而上学论者之所以如此观察事物乃是因为他们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而否认这一点也就否认事物固有的内部的发展动力，从而否认事物的自我运动以及事物由一种质态向着另外一种质态的变化。“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中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②自然界的变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5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6页。

化,主要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那么,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因的作用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唯物辩证法并不否认外部的原因或外部的矛盾对于事物发展的一定作用。他指出:“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③如果中国社会内部没有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革命的需要,即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中国,也会因为没有生长的土壤而不起作用,或者因为不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革命遭到失败。

(二) 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呈现为量变、质变的外部形态和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趋势。而量变质变的产生、不断交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4页。

替,否定肯定过程的不断出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都只有承认矛盾是它的发展动力,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说明。

毛泽东同志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①这就是说,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事物性质暂时没有变化,该事物处于量变阶段。矛盾双方不断斗争,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时,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也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时,事物就发生质变。这就说明,事物内部矛盾是量变和质变相互转化的根本内容和根本动力,而量变质变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和它的外部表现形态。可见,不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就无法理解量变质变规律。

毛泽东同志又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②这就是说,任何事物内部和发展过程都有自己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肯定方面是保存事物存在的方面,而且决定事物的性质。否定方面是促使事物灭亡的方面。在通常情况下,肯定方面代表旧事物的因素,否定方面代表新事物的因素。事物发展过程就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的过程。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根本原因在于肯定方面和否定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6—3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7—298页。

面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斗争的结果，必然使事物曲折地向前发展。所以，哲学上的直线论和循环论的错误就在于它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因而导致否认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及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唯物辩证法的诸范畴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补充。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实质和核心，也是唯物辩证法诸范畴的实质和核心。诸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形态，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事物的矛盾关系。例如：可能和现实是揭示客观事物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辩证过程的一对范畴，二者是互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可能，是没有成为现实的东西；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二者的界限是分明的。但可能和现实又是互相统一的，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一个客观事物都是可能和现实的辩证统一体，它既是过去的可能转化而来的现实，又是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新的可能。从事物发展的过程来看，可能和现实总是处于不断地相互转化之中。本质和现象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对立统一关系的一对范畴；偶然性和必然性是揭示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对立统一关系的一对范畴，等等。

由此可见，对立统一规律贯穿唯物辩证法的全部内容，是理解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

（三）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根本的方法论

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

遍存在的。”^①作为认识方法，只有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才能反映出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才能使我们正确理解和概括客观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谓认识世界，就是认识客观事物怎样既对立又统一地向前发展。所谓改造世界，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矛盾，推动世界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②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不仅在于如实地说明事物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正确地解决矛盾，有效地改造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指出了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科学基础。列宁正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各种矛盾运动，规定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从而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的运动，正确地指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分析了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矛盾的运动，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一化三改”，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2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9页。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把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这正是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在理论上概括的成果之一。

二 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事物发展动力问题，是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心内容。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动力，对于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运动规律，促进事物的前进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实在过程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所谓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基本属性概括为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就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它反映出矛盾双方相互肯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①矛盾双方所以具有同一性是因为矛盾双方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规定和互为前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4页。

提的，矛盾双方的内容特点只有在同对方的联系中才能存在。例如：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假如没有集中作为民主对立的一方，民主的含义就不存在了，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反之，假如没有民主作为集中对立的一方，集中的含义也就不存在了，变成了专制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①。民主和集中具有同一性，这是就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来说的。离开了党的组织原则这个条件，两者既不能对立，也不能相互依存。

只讲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还是不够的。“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②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就是说矛盾双方只能向着自己的相反的方面转化，而不能向自己无关的方面转化。所谓“地位转化”，就是主要方面转化为次要方面，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当着矛盾双方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事物就发生质变。由此看来，转化比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更为重要，通过转化，事物才能向前发展。

所谓斗争性，就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性质，它反映矛盾双方互相否定的关系。在这里，“斗争”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范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斗争性是作为矛盾双方基本属性而讲的。凡是构成矛盾的客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2—303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页。

观事物，其内部都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其中包括（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方面和阻碍事物向前发展的方面。矛盾一方总是要限制和否定对方，同时又总是力争打破对方对自己的限制和否定。因此，矛盾双方斗争是必然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对立面。毛泽东同志说的“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①，就是这个意思。反之，矛盾双方不通过斗争，积极方面就不能克服消极方面，矛盾就不能解决，事物就不能向前发展。

总之，任何事物的矛盾双方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and 变化。”^②发展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矛盾双方不断斗争，双方力量总是此消彼长不断的变化，一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便引起矛盾双方地位相互转化，于是新矛盾取代旧矛盾，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在一般的情况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实际过程。

（二）相对的同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 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所谓动力，是指推动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力量。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成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归根到底，是由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决定的。

首先，从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矛盾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2—30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2页。

地位来看：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同一性所以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是因为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无一定条件，矛盾双方不能相互依存，不能共居，更不能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①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依存，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条件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依存是以哲学基本问题为条件的。“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②。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用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不用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呢？就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决定的。这些条件就是中国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马列主义已在中国广泛传播；代表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并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条件变了，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也要随之发生变化。一九二四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从而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但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条件变了，国共合作的统一体也遭到了破坏。一九三七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在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情况下，由于逼蒋抗日方针的正确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6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7页。

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实现了第二次的国共两党的合作。但是，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性的内战，条件又发生了变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矛盾统一体又遭到了破坏。

由此可见，矛盾的同一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斗争性所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是因为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不受条件限制，在任何情况下，矛盾双方的斗争都将存在下去。无论是在它们共居的时候，还是在它们相互转化的时候，都存在着斗争，特别是矛盾双方的转化，更需要斗争的推动。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①

毛泽东同志的论证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在《矛盾论》中引证了列宁的话：“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②接着，他说：“列宁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③按照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也深刻地表明了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一有条件和无条件、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变动的状态。相对静止状态，亦即量变状态，是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状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7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6页。

态，它体现出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显著变动状态，亦即质变状态，是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状态，旧的统一体让位于新的统一体。由于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方面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相对静止状态总是不断地向显著变动状态转化，所以，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引起这两种状态不断交替的矛盾双方的斗争，始终存在于这两种状态中。所以，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表明了它们在矛盾运动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这种不同作用的相结合构成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不能认为斗争性是绝对的，因而就是重要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因而就是次要的。而要具体分析它们在事物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不论对任何矛盾的认识和处理，都不要只讲同一，放弃斗争，也不要只讲斗争，反对同一，要自觉地把同一和斗争结合起来。

其次，从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联结来看：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相反的两种属性，但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一切矛盾双方都是一方面相互依存，一方面又同时相互排斥，既对立又统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对立是同一的对立，同一是包含着对立的同一。具体来说：

第一，同一性不能离开斗争性而独立存在。斗争性是同一性的基础；同一性是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的，是包含差别和对立的同一。因此，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是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所以，没有斗争，事物就没有发展。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个旧统一体就

不会破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统一体也就不会产生。所以，斗争性制约着同一性，没有斗争性也就没有同一性。那种认为没有差别的同一，没有斗争的同一，绝对等同的形而上学观点，必然把事物看成是死板的、僵化的，因而也是永远不能发展的东西。

第二，斗争性也不能离开同一性而单独存在。同一性是斗争性的前提条件，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因为没有同一性，矛盾双方的斗争也就“构不成矛盾。矛盾双方只有具备了“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才能发生矛盾双方的斗争。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会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可见，矛盾双方的斗争，总是在一定的统一体中进行的。所以，同一性制约着斗争性，没有同一性，也就没有斗争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既说明了同一性离不开斗争性，也说明了斗争性离不开同一性。所以，同一是对立的同一，对立是同一中的对立。我们在认识各种事物矛盾运动时，就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切勿偏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总之，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向前发展。只强调斗争性是事物发展动力，或者只强调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都是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割裂开来，都是违反辩证法的。而“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①，才科学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7页。

（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自觉地掌握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理论

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重要理论基础。革命的历史发展和斗争实践，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的成败与能否正确地、全面地认识事物发展的动力有很大关系。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动力问题，可以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反之，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动力问题，则必然实行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导致革命事业的挫折乃至失败。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都不懂得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他们在处理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时，不是只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同一性，而不了解二者之间的斗争性，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是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冒险主义路线，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毛泽东同志坚持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在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时，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结合起来，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使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全国解放后，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又具体分析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制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实践证明，只有在斗争中把握同一，在统一中把握斗争，恰当地处理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我们的事业才能胜利前进。

三 要特别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矛盾学说中最精彩、最有独创性的内容。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同党内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完整的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丰富和发展为列宁关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思想。

（一）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作为成对的范畴提出来加以考察，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一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也就是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整个世界都是由矛盾构成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不论是自然界或社会，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都普遍地存在着矛盾，而且每一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串着矛盾。否认了矛盾，也就否认了一切。所谓矛盾的特殊性是指矛盾的个性。每一个事物的矛盾都有着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点，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不但各种事物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本身的特殊性，就是同一事物运动的不同发展过程、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的阶段以及矛盾的每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0页。

一个侧面，也各有特点。而任何客观事物的矛盾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当着我们分析和解决事物的矛盾时，必须注意掌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就使我们有一个总的正确的方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正视事物的矛盾，认真地揭露矛盾，决不可以否认矛盾、回避矛盾和掩盖矛盾。但是，我们要真正认识 and 解决矛盾，只了解矛盾的普遍性还是不够的，尤其重要的还是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首先，只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了解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和特殊的发展规律。

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世界上的事物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即每个事物都是具体的，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本质和特殊的发展规律。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有质的差别的。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包含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所决定的；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是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决定的。因此，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要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才能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本质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

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①

其次，只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识事物发展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

分析矛盾当然不能只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分析矛盾的普遍性。但问题在于，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并不能脱离个别而单独存在。例如，革命战争无非是对中国、苏联等各个国家各次具体革命战争的概括，这并不是说在各个国家的具体的革命战争之外，另外存在着一个一般的革命战争；生产也无非是对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等各种具体生产的概括，并不是在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等具体的生产之外，另外存在一种一般的生产。既然一般总是存在于个别之中，因此也就只有分析个别才能认识一般，才能从个别之中概括出一般。

就人的实际认识过程来说，也总是先认识许多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从中概括出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而当认识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之后，又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作指导，继续向着还不曾研究过的、或者不曾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认识它的特殊本质。例如，马克思和列宁总结了巴黎公社和苏联革命的经验，揭示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共同规律。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即武装夺取政权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说：“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3页。

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可见，只有认真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一般原理才不能变成僵死的东西，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如果不认真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不会有认识的发展，反而会发生思想僵化。

第三，只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把普遍性的东西正确地应用于具体的实际情况。

不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概括不出矛盾的普遍性。掌握了矛盾的普遍性，是不是就无需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可以把这些普遍性认识当成现成的公式，毫不费力地套用在各个具体事物上呢？不是的。书本上的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共同规律的一般原理，只能是给人们一个指导思想。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只能从认真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中得来。不论解决什么矛盾，都必须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情况活用一般原理。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误以为认识了共同本质、普遍规律之后，就可以把这种认识随心所欲地套用在各个具体事物上，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二）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毛泽东同志不仅深刻地论述了为什么要特别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而且还详细地阐述了如何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首先，要分析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5页。

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①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都无不如此。不分析不同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

其次，要研究每一运动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的矛盾及其特殊的本质。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②就是说，即使是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中，矛盾的具体情况也是不同的。例如中国革命不仅是具有不同于别的国家的革命的特殊的矛盾性和特殊的本质，而且它所包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过程，又各有其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我们不能用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作法去搞民主革命，也不能用搞民主革命的作法去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区分不同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也同样是不能正确地辨别事物。

第三，要了解不同过程的矛盾特殊性，就必须分析不同过程中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分析矛盾各个方面的特殊性，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的形式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以及在依存条件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同对方作斗争。只有这样分析矛盾各个方面的特点，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各个过程的矛盾特殊性。

第四，不仅要分析不同过程的矛盾特殊性，还要分析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例如，在民主革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3—2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5页。

命的过程中，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各有其特点。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有些矛盾激化了，有些矛盾缓和或解决了，有些新的矛盾发生了。在此不研究不同阶段的矛盾特点，就不能正确地认识 and 解决矛盾。

第五，要了解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还必须研究在不同阶段中矛盾各个方面的特点。不了解不同阶段中矛盾各个方面的特点，也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十分透彻地说明了什么是具体分析，为什么必须作具体分析，怎样作具体分析等问题，为我们树立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光辉典范。这就教给我们一个科学的具体分析方法，就是要从矛盾运动的空间和时间两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并不是让我们无论分析任何问题都去硬套这五种情形。

（三）具体分析是具有普遍 指导意义的科学方法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能不能坚持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是关系到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大问题，是一个坚持何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这不仅对我国民主革命至关重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我们在政治和经济工作指导上所以一再发生“左”的错误，从思想方法上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特别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例如，由于我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转化，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时间上

推迟了。在农业上，不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论山区、平原，一律都种粮食；不管是否具备过渡条件，一律都搞过渡。这些不注意分析矛盾特殊性的“左”的错误，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根据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矛盾的特殊性的科学分析做出的。要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搞现代化，既不能照抄书本，也不能照搬国外经验，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闯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各个地区来说，究竟怎样实现现代化、怎样富起来，也不能照搬“本本”，照搬外地区的经验，而必须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

总之，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做好各项工作，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 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矛盾特殊性问题时，还特别强调要分析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两种情况。他指出，如果不研究这两种情况，“那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①对于这两种情况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1页。

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①

（一）要着重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只存在着一种矛盾，而是同时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都在相互影响着，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作用。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或绝对均衡的东西。这些矛盾在事物发展变化中所起作用总是有差别的，而绝不会是平衡的。“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②“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就叫主要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的矛盾，则叫次要矛盾或非主要矛盾。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是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如人民大众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等，都是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非主要矛盾。又如，我们国家现在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健全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系列必要改革，需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需要开展经济领域里的反腐蚀斗争，需要解决城市部分人的住房和就业问题，等等，但是，在这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则是规定、影响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矛盾。

既然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有主要矛盾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1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6—297页。

和非主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影响着其他非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制定战略策略的一个重要方法。只有抓住一定时期的主要矛盾，才能正确规定这个时期的主攻方向或主要目标，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在同一时间内，兵力的主要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因此，他坚决主张“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拳头打人”，坚决反对“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和“全线抵御”的军事平均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就是根据当前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

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不仅是党在制定战略策略时要采用，在进行任何具体工作时也都要采用。我们常说的工作要抓重点，抓关键，抓中心，实际上也就是要抓主要矛盾，把工作分开主次、先后、轻重、缓急，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总之，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乃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科学方法。无论做任何工作，处理任何问题，它都是适用的，行之有效的。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要领，事半功倍；不采用这种方法，就会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茫无头绪，束手无策。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无论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其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力量也是不均等的，因而不能平均看待。有时矛盾双方表现出某种势均力敌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7页。

的状态，那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在矛盾两个方面的斗争中，很快就会被打破，为不平衡所代替。在不平衡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处于被支配地位，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或非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化了，事物的性质也随之而起变化。因此，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可以了解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异，就能找到促进事物性质改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例如，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时，它们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那时我国社会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被统治阶级转变为统治阶级，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了。

既然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为了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性质，正确地分析和解决矛盾，就不仅要看到事物所包含的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且还要分清两个方面谁是主要的，谁是次要的。如果不分主次，或者把主次弄颠倒了，就会把事物的性质看错了，就会导致处理上的根本错误。例如，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本来损失是主要的，可是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一直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结果“左”了不纠“左”，反而进一步反“右”，犯了严重错误。同样道理，我们建国后的三十年，尽管有过严重失误，但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还是基本的、主要的。如果对伟大成就视而不见，把失误看成是主要的，那也是一种严重错误。

要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换个说法，就是不仅要坚持两点论，还要坚持重点论。坚持两点论是说，

对于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必须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如必须既看到成绩，又看到问题；既看到优点，又看到缺点；既看到有利条件，又看到不利条件，等等。但在坚持两点论的同时还必须坚持重点论，分清成绩和问题、优点和缺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矛盾的两个方面，哪一方是主要的，哪一方是次要的。我们只有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主流，才能辨风向、识大局。因此，我们无论看形势、看工作、看人、看事，还是从事任何实际工作，都必须牢牢掌握这条重要的科学方法。

（二）要把握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

无论主要矛盾还是主要矛盾方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发生转化。

主要矛盾转化，就是由于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主要矛盾变成了次要矛盾，而原来的次要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善于用发展的观点去把握主要矛盾。在我国革命实践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之间相互转化的复杂的情形。例如，我国民主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转化了，民族矛盾（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这时，国内各阶级、各党派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矛盾关系，都为这一主要矛盾所规定，所影响。因此，组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党处理国内各阶级矛盾的方针政策，也都服从和适应这一主要矛盾的要求。例如，对国民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地主的土地由“没收”政策变为采用“减租减息”的政策。

既然主要矛盾不是固定不变的，是转化的，我们就必须

把握住主要矛盾的转化。主要矛盾转化了，党的工作中心、革命的战略策略等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改变。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把握住了各革命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根据这种转化为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中国革命才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把握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上，我们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是基本的，但也有失误的教训。建国后，我们抓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因此，正如党的八大所指出的：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可是，在“左”的错误干扰下，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八大的正确路线，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着重点才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是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原来的主要矛盾方面变成了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原来的非主要矛盾方面变成了主要的矛盾方面。而一旦发生了这种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例如，我们国家现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并不是所有一切方面都落后，只是比较地说，落后方面是主要方面，先进方面是次要方面。一旦先进方面成为主要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0页。

方面，落后方面成为次要方面，我们国家就算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

在把握矛盾两个方面的转化时，还应当特别注意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这就是：在矛盾双方转化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总体和部分交错的情形，即当旧事物从整体上说来居主要地位时，在局部范围内，新事物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反之，当新事物在整体上说来居主导地位时，旧事物也可能暂时在局部范围内居主导地位。因此，在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因时、因地、因条件不同，采取极其灵活多样的战略策略和工作方法。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①这个规律说的就是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新旧两个方面，在发展中新的方面逐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旧的方面逐步由大到小、由强到弱。而当新的方面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旧的方面成为居于被支配的非主要方面时，事物也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即由旧事物变成了新事物。我们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转化，其目的就是要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工作去促进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

（三）要处理好抓主要矛盾和抓次要矛盾的关系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处理好抓主要矛盾和抓次要矛盾的关系，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强调抓主要矛盾，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忽视次要矛盾了呢？不是的。事物所包含的各种矛盾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这是首先必须肯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7页。

定的；但次要矛盾也制约、影响着主要矛盾，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主要矛盾解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只是说其他矛盾也就好解决了，并不是说其他矛盾也就不去解决了。所以，必须明确：强调要集中力量抓住主要矛盾，并不能理解为只抓主要矛盾，不抓别的矛盾。在实际工作中，不分主次、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只抓重点，不顾其他，搞“单打一”，也同样是不对的。正确的作法应是既抓中心环节，又注意抓非中心环节；既抓重点，又照顾一般。一句话，就是在狠抓中心工作的同时，又围绕中心工作安排好全盘工作。

多年来，我们由于对抓主要矛盾作了片面的理解，没有处理好抓主要矛盾和抓次要矛盾的关系，在一些工作中搞“单打一”，吃了很大的苦头。我们总结记取搞“单打一”的教训，就是要懂得在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要注意解决其他非主要矛盾，处理好抓主要矛盾和抓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如果因过去搞“单打一”吃了苦头，以后就不讲抓主要矛盾了，不强调抓中心工作了，不区分主次、轻重、缓急了，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背离了《矛盾论》。

五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深刻地论述了不同事物和事物的不同发展过程都有“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之后，进一步明确指出：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①就是说，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认识矛盾的性质，找到解决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6页。

矛盾的有效方法，正确地解决矛盾。

（一）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由矛盾的性质决定的

这里讲的矛盾的性质，包括一矛盾区别于他矛盾的质的规定性和同一性质的矛盾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的特点。这里讲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包括矛盾的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指导方针，即路线、政策、策略、措施，等等。

矛盾特殊性的原理说明，由于矛盾各个特殊，决定了事物千差万别，决定了各个事物有特殊的本质和规律，决定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同志十分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这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弄不清矛盾性质的“左”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同志还一再强调要具体地分析各种矛盾的不同的质，依此来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具体地分析了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及各种矛盾的性质和情形，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政策。为着正确地理解和执行这个基本政策，他又作了深入的具体分析，规定了解决不同矛盾的具体方法。他把中间势力具体地分为三部分人，即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指出了他们既有和工人、农民、进步势力相矛盾的方面，又有抗日的方面，所以要采用争取的政策，但是这种争取是不同于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他又把顽固势力作了深入的具体分析，指出：“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

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①他还一再强调，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等等。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同王明等人不具体地分析矛盾特点，把中间势力定为主要打击对象，不会利用敌人矛盾、打倒一切的“左”倾政策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同志还明确地指出，矛盾的主要的或基本的特点也是规定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根据。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时候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决定的。他在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时候，指出：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不仅善于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点，而且善于根据矛盾的特点制定出正确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的原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同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划清了界限。

总之，人们只有根据矛盾的性质和主要特点去制定路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21—722页。

线、方针、政策、策略、措施，即解决矛盾的方法，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取得革命的胜利。

（二）随着矛盾的变化解决矛盾的方法也要改变

毛泽东同志指出：“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①所以，我们在分析某种矛盾究竟应采取什么方法去解决时，还必须考虑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考虑到时间、地点和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寻找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时，就注意考察战争发生的时间、地域和性质等全面情况。他十分深刻地说明：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因此战争指导规律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这个原则对于做任何工作，处理任何问题，都是适用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则已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我们党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了反对富农的政策，规定了对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没收的政策；对地主阶级由没收土地改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这就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随后，又纠正了右倾错误，坚持了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广大中国人民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个时局变化的历史关头，党中央及时分析了形势，确定了新时期的斗争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6页。

方针。先是针对蒋介石向人民抢夺胜利果实的反动方针，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政策；又针对美蒋的和平阴谋，采取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边谈边打，和平斗争与局部战争交错进行；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巩固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坚决支持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把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剥夺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们党制定和坚持了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战略决策，夺取了全国胜利。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发展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也都体现了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的这个原则。

（三）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是马列主义者 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①。当然，经验主义者虽然不照搬书本，但却把自己的狭隘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同样是违背用不同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6页。

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的原则，结果也会给革命和建设造成危害。

显然，能否坚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的原则，是关系到能否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列主义者，关系到革命和建设胜败的大问题。建国后，我们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没有坚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个原则，吃了不少苦头。比如沿用过去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之后的阶级斗争问题；沿用过去革命战争中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开展今天的经济建设；搬用军事化的办法，组织农民搞“大跃进”。所有这些“左”的错误作法，都离开了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个原则。

六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 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这个概括在理论上深化了矛盾学说，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方法论意义，提供了理解和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全部丰富内容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核心，揭示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才能从本质上理解唯物辩证法，那么可以说，只有懂得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才能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从而也才能从根本上懂得整个唯物辩证法。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5页。

（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 是理解和掌握矛盾学说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的结论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①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关系问题，贯穿于对立统一规律及其学说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中，是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着的一种本质的关系。

特殊的事物和普遍的事物是相互联结的，任何事物矛盾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的一面，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

由于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通过特殊性而存在；特殊性中存在普遍性，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具体表现。因此，要认识矛盾的普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0—311页。

遍性,必须从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着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则必须以普遍性为指导。如果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就发现不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①如果只了解矛盾的普遍性,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认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不同特殊性,无从认识各个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不能找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规律,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如果只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认识事物之间的共性,无从认识各个事物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也不能正确认识事物。而且,离开矛盾的特殊性也不可能了解矛盾的普遍性;离开了矛盾的普遍性也不可能了解矛盾的规律性。如果离开矛盾的特殊性去找矛盾的普遍性,就要否认矛盾的客观性,就是唯心论。如果离开矛盾的普遍性来谈矛盾的特殊性,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由此可见,研究事物的矛盾,认识事物的矛盾,解决事物的矛盾,关键在于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忽视了任何一个方面,既不能正确地认识矛盾,更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 关系是理解认识辩证运动的根据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不仅是矛盾存在的规律,也是认识辩证运动的根本原则和一般规律,是理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3页。

解认识辩证运动的客观根据。

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和联结，一般和个别的区分和联结，决定了我们认识运动有这样两个方面：个别的认识和一般的认识，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

由于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包含在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一般包含在个别之中，因此在实践中，人们首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了解许多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对这些事物的特殊本质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这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又以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指导实践，继续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认识它的特殊的本质。这样就可以使共同的本质的认识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使之不致变成枯萎的和僵死的东西。这又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人类的认识运动总是在实践过程中由特殊上升到一般，又由一般指导特殊，再由特殊补充、丰富、发展一般，如此循环往复地前进。只要人们不脱离实践，严格遵守科学方法，那么每一次循环，都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化，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是人们认识真理所必须遵守的辩证规律。这种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是以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互联结为客观根据的。只有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认识的辩证过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个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结的关系。

由此可见，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道理，不仅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也是理解认识辩证运动的关键和根据，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

原理是革命胜利的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为根据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共同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对人类社会发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但是，各个国家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革命所处的具体条件。这种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共性和个性的互相联结决定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自己国家的民族特点和革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不是实行这种结合，坚持不坚持这种结合，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本国的现状、历史和本国革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具体地运用了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联结的原理，才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政策、战略、策略，把我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而陈独秀、王明则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割裂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的关系，使中国革命一

度陷于绝境。这个血的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四）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

原理是科学的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

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是我们党制定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原理创造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诸如：

“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抓好三分之一”、“点面结合”、“种试验田”、“解剖麻雀”等等。如果我们不懂得它的理论基础，就不能深入领会这套科学方法的精神实质，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能自觉地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即使使用了，也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

可见，我们要真正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必须懂得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学习和掌握这个原理，对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七 要学会客观地、全面地 和本质地看问题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学说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深刻地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①教导我们要学会客观地、全面地和本质地看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7页。

（一）要客观地看问题，反对主观性

“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①这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或从书本出发，它的根本出发点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离开了唯物论讲辩证法，也就是说，离开了客观实在的物质，去讲联系、变化，就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第一条讲“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②这就指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出发点和原则。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分析事物的矛盾，不要抓住个别实例，不要任意抓住一个枝节，不要随意用主观幻想的联系去代替客观现实的联系，而要客观地观察事物的矛盾，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观察事物的矛盾，要从客观事物内部固有的内部联系去观察事物的矛盾，这样就把辩证法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即唯物主义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根本的特点。因此，要掌握唯物辩证法，只有在实践中，对自然和社会各领域客观存在的矛盾（不是主观臆想的矛盾）进行观察，从客观的辩证法中导出概念的辩证法，才是科学的彻底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导中国共产党人要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不附加任何主观成分；要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按主观随意性去办事。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各次“左”倾错误，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对比，采取与此相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估量，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方面，由于没有客观地考察我国的国情，“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历史的经验说明，主观性是一切工作中失误的总根子，要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必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清除主观主义，要用唯物主义去反对主观主义，千万不能用主观主义去反对主观主义。比如，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了，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资产阶级自由化，熟视无睹。解决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问题，决不能认为我们过去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什么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应当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些认识都是没有认真研究我国的国情，以自己的—孔之见去判断全局，从“左”的极端跳到右的极端。

（二）要全面地看问题，反对片面性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①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普遍联系着的，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都是一个千变万化的矛盾运动过程。所以，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不能从单方面去看，也不能只看事物发展的某个阶段，必须研究和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及其相互关系，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是全面地看问题。反之，只看到矛盾关系的一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7页。

一个方面，把它当作整体；或只看到矛盾运动的一个小阶段，把它当作全过程，就是片面性。唯物辩证法之所以是全面的、深刻的、毫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就因为它是从事物的多种多样的相互联系中，诸如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主要联系和次要联系的全部总和中，抓住了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了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所以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应该记住列宁的话：“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①

形而上学与此相反，他们是把事物的现象从总体联系中割裂开来，孤立地片面地进行观察，所以他们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就找不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次“左”倾路线，就是因为不会全面地看问题，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之所以走了一段曲折道路，从认识根源来说，也都是因为我们思想方法的主观片面性造成的。诸如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规律性；强调阶级斗争，忽视生产建设；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强调积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8页。

累，忽视消费，强调经济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等等。从哲学上来分析，这就是只讲普遍性，不讲特殊性；只讲质的变化，不讲量的积累；只讲否定，不讲肯定；只讲绝对，不讲相对；或者相反。可见，认真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反对片面性，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的经验表明，我们犯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常常是把真理夸大了，弄过了头，是由片面性导致了主观性。比如，看到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激化，党和国家有变质的危险这是对的，但认为资产阶级变到党内来了，立刻就要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就错了；号召鼓足干劲是对的，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就错了；等等。我们要力求用全面性去克服片面性，要用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观点，对片面性错误作具体分析，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比如，批判“句句是真理”是对的，但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某些正确的观点当作“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去批判，就错了；纠正统得过死，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对的，但误解为可以不执行统一政策，不要统一计划，就错了；等等。对待把真理夸大了的片面性错误，只能把夸大了的部分纠正过来，使之归于正确，决不要把真理本身也给否定掉了。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片面性，而且要善于用全面性克服片面性，防止新的片面性。

（三）要本质地看问题，反对表面性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

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①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构成的，是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东西。事物的现象是比较活动、易变、丰富多样的东西。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多层次的无限深化的过程。“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②

在事物的现象中，往往包含着一些假象。假象歪曲地反映着事物的本质，给人们一种与事物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因此，看问题不要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懂得这个道理，对于端正思想方法也很重要。如现在有的青年人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所迷惑，划不清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其实，资产阶级民主制，仅仅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民主，正如列宁说的：“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③

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多年来，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因为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对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知识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8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630页。

准备不足，不善于开动脑筋分析问题。所以，工作做对了，不知道对在什么地方；工作做错了，也找不出错误的原因。特别是当着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出来时，产生迷惘、犹豫、左右摇摆。在错误思想袭击面前处于无防卫的地位，常常被假象所迷惑，要克服表面性，学会本质地看问题，必须懂得事物的本质往往隐藏在复杂多变的现象背后，事物的规律性存在于多种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地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①

片面性和表面性也是主观性。老百姓犯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固然不好。而领导干部、说话算数的人，要是犯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就会出乱子，领导职务越高，出的乱子越大。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最大敌，是工人阶级的最大敌，是人民的最大敌，是民族的最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②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必须时时事事都要做到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6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页。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 革命战争中的运用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宏伟，环境之艰难，胜利之辉煌，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不仅积累了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而且有着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著述，这在中外历史上是少有的。

毛泽东同志军事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不是单纯从思辨中引出关于战争规律的结论，而是深植于战争实践土壤上的理论升华。它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并经过战争实践的反复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真理。它是包括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极为丰富内容的、完备的军事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的贡献，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独树一帜、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

毛泽东同志从来都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总结战争经验的。如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充分体现了他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一样，毛泽东军事著作也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的范例”。

一 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

指挥员对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于战争的客观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精髓。

（一）战争的指导规律一定要和战争的客观规律相符合

指导战争必须研究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同志说：“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战争现象虽然较之任何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然而，“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②它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它本身固有的规律。战争规律就是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和发展总趋势，是贯穿于战争全过程的东西。因此，要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争取战争的胜利，就必须研究和把握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指导战争必须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使战争的主观指导符合不断变动的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谁不按“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办事，谁就会立即受到血的惩罚。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打败仗的原因，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8页。

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这里讲的多打胜仗的“关键”，决不限于战术，也不限于军事，而是党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具体体现。

（二）研究战争规律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

为了达到战争指导上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毛泽东同志同教条主义者作了坚决斗争。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拒绝对中国的国情作调查研究，只知道生搬硬套苏联革命战争的经验，照抄中国的或外国的军事条令，致使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丧失了除陕北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同一切教条主义者相反，强调研究战争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他指出：我们指导战争“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③。因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7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5页。

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与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①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②。从战争的性质上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例如，革命战争具有依靠人民群众的特点，因而能够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而反革命战争则不能。从地域条件上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战争的规律也会各有其特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从政治、经济上，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上，全面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并由此规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如由于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又经过土地革命，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并胜利；由于敌强我弱，又规定战争的持久。中国红军反对游击主义，却承认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却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大后方主义，承认小后方主义；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等等。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③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同一战争的不同阶段也有其不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5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7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7—158页。

同的特点。例如，在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红军力量十分弱小，红军只能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和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而到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扩大了，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把游击战发展到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这就使中国革命战争发生了第一次战略转变。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人占地甚广却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毛泽东同志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又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朱德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通俗地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并说“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用兵新法”。

（三）从战争的实践中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不仅提出了研究战争规律的基本方法，而且明确地揭示了取得符合战争发展客观规律的战争指导思想的正确途径。

第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毛泽东同志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战争规律，都不是单凭天才头脑所能获得的，要想认识战争的规律，重要的问题是善于学习。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①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一个真正能干的军事指挥员，决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到。

第二，主观符合客观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同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5页。

志对军事指挥员认识的深化运动作了完整的分析，系统地提出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思想。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制定军事计划的阶段，也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首先是要做周密的调查工作。“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①。侦察应该占有第一手材料，材料必须真实而丰富。其次是将侦察得来的敌方各种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第一次飞跃。

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是执行军事计划的阶段，也就是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②这就是说，实行军事计划的过程，既是用军事计划指导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是用战争来检验军事计划的过程。经过检验，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例如，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在实施第一个作战方案的时候，不巧被敌人发觉，因此不得不全盘改变计划，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教条主义者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军事计划一旦制定出来，就不得更改。毛泽东同志批评他们说：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4页。

“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昧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①

由此可见，战争实践产生战争经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反过来，战争经验指导战争实践又是一个能动过程。

二 充分发扬符合战争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提出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贡献。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的结果

中国自一八四〇年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中国人民就展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许多先进的人们，为振兴中华，寻找真理。这就产生了一种重视人的能动性的思想。重视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人民革命中产生的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在十月革命之前有很大的盲动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不畏艰难险阻，最后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

无疑，伟大的中国革命首先是由于中国具备了革命成熟的条件，而不能解释为某个伟大人物的天才。但是，谁也不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4页。

能否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高度的自觉能动性取得的。同样是面对强大的敌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下，却遭到了失败。长征在王明教条主义指挥下，是逃跑主义；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则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战略转移。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条件下，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交了枪；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既顶住了“不准革命”的压力，又不听“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的吓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终于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创立了新中国。所有这些，都是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的结果。

（二）自觉的能动性在认识和改造 世界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人的能动性给予了科学的说明。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唯心论、机械论的批判，提出“自觉的能动性”这一新的、科学的概念，并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论证。他明确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6页。

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自觉的能动性所作的科学的定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能动性所包含的三层意思：

第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是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界限。人类的意识不仅是特殊物质——大脑的机能，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而主要的是社会运动形式的作用引起人的思维运动。人的这种思维运动不仅有感性认识能力，而且有抽象的理性认识能力，不仅可以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进而通晓和把握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并且能够在正确思维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改造客观事物，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的这种自觉能动性使人类永远地与动物区别开来。

第二，自觉的能动性的内涵是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人的活动能力。一方面，仅仅知道去做、去干，而没有正确的理论、思想的指导，这是蛮干，是必须反对的。另一方面，自觉的能动性也不能停留在认识的正确性上，而是要具体地表现在积极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人类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到底都来源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不去实践，就不会得到任何关于客观世界的科学知识。而有了科学知识，束之高阁，不去实行，也不会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常有这种情形，在同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页。

样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客观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人们付出的劳动不同，努力程度不同，改造事物的成效也很不相同。随着科学的发展，实践的活动也将日新月异，但永远不会不经过实践就能改造世界。

第三，自觉的能动性是与盲目的能动性即盲动性相对立的。人类长期的实践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发挥任何能动性，都会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的。唯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才能取得成功。为了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就要求人们去认识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正确的思想和行动，防止不顾条件的盲目蛮干。在战争中，人们可以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扬自觉的能动性，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夺取战争的胜利；如果一味蛮干，就会失败。所以，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主观要符合客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鲁莽军事家的盲动。中国革命中的几次严重错误，特别是王明的错误，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发挥能动性，而是没有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因此，自觉的能动性是一个具有特定科学含义的、与盲目能动性相区别的 科学概念。

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自觉的能动性的概念和对自觉的能动性作了科学的概括和说明，而且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觉的能动性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①因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446页。

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

（三）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运用

毛泽东同志把自觉的能动性运用于战争中，指出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表现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指导战争主要是指如何运用指挥员的自觉的能动性问题。实行战争主要是指如何运用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问题。整个战争过程，就是指挥员的自觉的能动性和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相统一的运用过程。

指挥员的自觉的能动性，主要地是表现在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上。

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而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是主动和被动的客观基础，但不是主动和被动的现实。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能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劣势而被动的军队，可以依靠主观指导的正确，人为地造成自己的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逐渐转变为全局的优势和主动。因此，在战争中全军指挥员都要力求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为最后战胜敌人创造条件。

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战争中的东西。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4—455页。

势,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

计划性就是战前的准备和部署,也就是预见性,它是争得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条件。由于战争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实现计划于战争中,较之实现计划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但战争也有某种相对的固定性和确定性,这就是制定战争计划和指导方针的客观基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的计划性之所以必需,就是有计划地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以适应战争的情况。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通过发扬指挥员的自觉能动性改变敌我之间的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争得战争的主动权,以至最后的胜利。

实行战争,必须把指挥员的自觉的能动性和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①“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②综观战争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群众缺乏正确的领导和指挥,群众的努力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就会受到压抑和挫伤。因此没有领导者的自觉能动性,事情是决不会办好的;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有了领导人员的自觉能动性,若不善于调动和发扬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只是少数人忙碌一顿,也是无法把事情办好的。战争的全过程,就是这种指挥员的自觉的能动性和人民群众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8页。

的自觉的能动性相统一的过程。

三 正确处理战争中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

任何一级指挥员要把握战争规律，指导战争取得胜利，都必须认真研究战争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他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最善于把握战争全局，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做出一系列英明的战略决策，他对战争中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光辉的辩证法思想。

（一）战争中全局与局部是辩证的统一

战争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有全局和局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①全局是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②全局不仅是事物的整体，而且是包括事物各个发展阶段在内的全部发展过程；局部不仅是事物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全局和局部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场合为全局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却变为局部的东西。反之，在一定场合为局部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却变为全局的东西，也就是说，全局与局部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9页。

着涉及到的问题的范围大小而变化。不但战略与战役的关系如此，战役与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是全局，团营的动作便是局部；连的动作是全局，排班的动作便是局部。这生动地说明了全局与局部关系的相对性和变动性。

全局是由局部组成的。但是，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的总和，而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局部不能脱离全局而独立存在；反之，没有各个局部，全局也不能存在。全局和局部是矛盾的统一。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中，全局处于决定的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局高于局部，统率局部，局部必须隶属全局、服从全局。因为归根到底全局的命运决定着局部的命运，全局的利益决定着局部的利益。在战争中，战役或战斗的部署必须服从于整个战略的部署。只有在正确战略原则指导下的战役和战斗的不断胜利，才能促使战争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质变到根本质变，根本改变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形势，使整个战争取得胜利。而战役或战斗只是隶属于整个战略的各个局部，它所能解决的只是同整个战略有关的局部问题，如果局部的部署和整个战争的战略部署发生冲突，则这局部的作战即使胜利，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相反，有时还会影响整个战局，造成失败。因此，局部作战的部署必须服从全局的战略部署。

强调全局起决定作用，决不意味着忽视局部，只有组成全局的各个局部取得胜利，全局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的科学论断，深刻地反映了全局和局部的这种辩证关系。只有在全局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局部上、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才既不致于迷失方向，为敌人暂时的强大所吓倒，又能谨慎从事，一步一步地战胜敌人。

（二）指挥员要有全局观点和战略头脑

在战争指导上，指挥员只有在全局上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才能驾驭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

“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①因此，战争指挥员要有战略头脑，要时刻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到照顾战争全局上。“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②他总是强调从战略全局出发来权衡利弊，要求任何一级指挥员都要胸怀全局，从全局出发，不能不顾全局盲目乱干；要考虑各个方面，考虑左邻右舍，还要考虑这一阶段和下一阶段，打第一仗前就要考虑打第二仗和第三仗。从局部看可以打的仗，从全局考虑不能打，则坚决不打。从局部看不能打的仗，全局需要打，就要坚决打。有时还要牺牲局部，保护全局，赢得时间，争取全局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③这里说的“用心思去想”，就是指在通晓局部的基础上，靠理性思维来把握全局。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运用“全局性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观点批驳了当时种种“好象革命的‘左’倾意见”，深刻地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9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1页。

中央苏区，红军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但那些患“革命急躁病”的人，看见“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看见“丧失土地”等等局部的、暂时的“失败”，便反对战略退却，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全线出击”。这些人眼睛看见的是局部、暂时的现象，却以偏概全，提出全局性的主张。针对这种幼稚病，毛泽东同志指出：“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把住一局部一时的东西死也不放。”^①为了救治这种“小生产者的近视”，毛泽东同志形象生动地指出了一条重要的认识论原则：“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②

各个局部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的，而是有先后、主次、轻重、缓急之分。有的局部无关大局，有的局部对全局会产生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比如，有的时候，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立即起变化。这就象下棋“一着不慎”，可以导致“全盘皆输”。这里说的，一、二个战役或“一着”就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因此，指挥员必须把自己注意力的重点放到能够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上，也就是说要抓住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③在战争中，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胜主要战役，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96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0页。

才能解决敌我两方谁胜谁负的问题。比如，在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就是全战役的决定性的一着。毛泽东同志指示东北战场上的我军，必须把注意力放在锦州作战方面，务求迅速地攻克该城，只要攻克了锦州，切断了东北蒋军回到关内的退路，我军就有了主动权。事实上，锦州攻克，便迅速解决了东北战场的问题。东北解放，又大大推动了全国战局。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同志决定对华北傅作义兵力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针，体现了他全局在胸，对敌人实行有计划地歼灭的方针。

（三）要正确处理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的辩证关系

把战争中的全局与局部辩证关系的一般原理具体运用到指挥关系上，就出现了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精辟地阐明了什么是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挥等等。凡关于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达协同动作之效。至于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各个游击队可以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去做。这就是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根据这个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因为越是地区广大，越是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越远，越是要扩大地方或下级的自主权，使其更切合地方实际

情况的要求，因地制宜地解决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下级指挥人员的独立作战能力，应付复杂多变的情况，夺取战争的胜利。

无论实行集中指挥或分散指挥，都必须从客观出发，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①所有这些都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尤其是在战争的指挥关系上，应当特别予以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辩证关系的光辉论述，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且它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四 根据矛盾的转化适时 转变党的军事战略

所谓战略，是对事情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是指政党和国家规定的有关全局的一定时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军事战略，是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照顾战争全局的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规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最重要的是规定主要的打击方向和基本的作战形式。正确的军事战略根据敌我双方全局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因此会经常出现作战形式的战略转变问题。及时抓住战略转变，这是战争指导者的最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战略转变问题，特别强调必须随着矛盾的转化适时转变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05—406页。

党的军事战略。这一重要思想为党的战略方针的变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

（一）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游击战 转变为正规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主要敌人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战争的特点是敌强我弱，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但是，在不同的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又有所不同，从而决定了主要作战形式的变化。在前期，由于革命处于低潮和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决定了主要作战形式只能是游击战；在后期，由于我军发展壮大，建立了较巩固的根据地，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为了反击敌人的“围剿”，决定了主要作战形式是带游击性的正规战。而这种正规战争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因此这种正规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这个转变，曾经遇到过很大的困难。一部分干部认识落后于形势，主观脱离客观，对已经变动了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不愿将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这是一种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党进行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与此相反，王明等人的思想，超越客观的可能性，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否定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完全否定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能正确处理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只是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

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相互转化决定

国内正规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

历史证明，由国内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是完全正确的，保证了长征的胜利，打通了革命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形势下，党内又出现了“左”右两种倾向：一种是轻敌的倾向，另一种是王明等人从“左”的极端跳到右的极端，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军”上，反对我军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提出“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主张跟着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打大仗。他们根本不认识只有实行重大的军事战略转变，我军将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敌后的游击队和游击战，才能牵制敌人的兵力，骚扰敌人的后方，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有力地拖住敌人，使敌人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被迫与我进行持久战；我军才可以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王明教条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对中日民族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战争特点、国内外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①在抗日战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5—516页。

争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这时的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我军当时只有三万多人，装备很差；国民党虽然同我们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节节败退。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和日军打正规战是要吃大亏的，在战略上必须把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只有到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动游击战争，和敌战区的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缩小敌军的占领地，扩大我军的根据地，迅速地壮大人民力量，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基于这种正确的分析，党中央决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时地转变了我们党的军事战略，将正规军、运动战转变为游击队、游击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壮大了人民力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又发展到战略反攻。直到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上述三个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是由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转化引起的；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是由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转化决定的；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是由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转化造成的。

（三）矛盾的特点决定游击战争成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把抗日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①本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74页。

日以来才有的，也不是只存在于中国。在古代、在外国都发生过游击战争，但都视其为战术范围里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它的战略地位问题。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和国内外的形势，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个战略问题。他明确地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象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①

由于中国是个大国，日本是个小国，就发生了敌人占地甚广，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给我们开展游击战争造成了有利条件。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从而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

由于中国是进步的，日本是反动的，就是说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全民族奋起抗战，对付兵力不足而又是反动的日本侵略者，不仅可以在外线开展游击战争，而且可以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于是，游击战争就不只是战术问题了，而是发生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整套的东西。

由于中国是个弱国，日本是个强国，大而弱的中国不能很快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小而强的日本决不能很快占领全中国，更不能灭亡中国，这就决定了战争必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于是抗日游击战争就必须担负起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和向运动战发展等战略任务。

总之，由于上述三个基本特点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的结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74页。

果，就造成了又广大又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但是，为什么大而弱的中国过去没有发生具有重大作用的游击战争，而今天却发生了呢？为什么历史上有大的大而弱的国家被小而强的国家灭亡了呢？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由于时代不同了，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旧的中国了，出现了共产党和红军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游击战争就具有彻底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方向，并能够得到国际正义力量的援助。因此，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不会失败，而且会发挥其巨大的威力，起到战略作用，必须把游击战争放到战略的地位上加以研究。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能不能适时地把国内正规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关系极大。抗日战争的历史的发展，完全实现了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早在抗战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清醒地预见到抗战的胜利应该是人民的胜利，要积蓄力量准备在抗战胜利之后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实践上指导党和民族争得了光明的前途。

五 善于化劣势为优势 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是一部由劣势变为优势、以弱胜强的历史。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总结了我军以弱胜强的丰富经验，揭示了劣势与优势、弱与强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从而引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 如实地承认敌强我弱，强弱可以互相转化是制定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出发点

中国革命战争同一切革命战争一样，开始的时候，革命力量总是处于弱者和劣势的地位，而敌人则处于强者和优势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时，总是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分析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着重分析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点时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是两个显著的特点。当时国民党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与红军比较起来都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和僻地的政权。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抗日战争也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拥有八百万军队，有美国大量的军事财政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一百二十万人。

但是任何强弱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强者不是一切皆强，弱者也不是一切皆弱；而是强中有弱，弱中有强；强者不是永远强，弱者也不是永远弱，强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虽然弱小，但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土地革命使农民感到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抗日战争中，日本侵华战争本质的反动性和野蛮性，日军人力物力不足，国际上寡助，就是它的弱点。而反侵略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国大兵员多，国际上多助，又是我军的长处。

至于说到武器装备,优势劣势也是相对的。例如游击队,就人力和装备来说,比敌之正规军是弱小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①这就是辩证法。我们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实行这一方针的一系列作战原则,就是建立在敌强我弱及其可以互相转化的基础上的。只要我们扬己所长,避己之短,击敌之短,避敌所长,最后就能够由弱到强,战而胜之。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既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又不懂强与弱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顺利时搞冒险主义,遇到挫折时,又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②

(二) 积极防御是化劣势为优势的唯一 正确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同志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集中地体现了以弱胜强的辩证法。

首先,积极防御体现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法。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进攻与防御。这是战争的基本矛盾,它组成了战争的总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它巧妙地把进攻与防御结合起来,赋予防御这种消极形式以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80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90页。

积极的内容。

这种攻防的辩证统一，首先表现为战略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中的进攻的相互依存，然后又表现为战略上的防御和战略上的进攻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讲的有名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三大原则和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原则，都是为了把战略上的防御转化为战略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战略和战术上的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是互相对立的矛盾关系，毛泽东同志善于把这些对立面统一起来。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许多对立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又是能够统一起来，而统一和联系又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战争中的敌我双方，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进攻与防御等等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是对立的统一。如日本侵略中国，“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①敌人依仗其优势的军力、经济力，企图一举灭亡中国，而我不与他硬拼硬顶，利用地广这个空间与他周旋。敌人经过许多战斗与战役的失败，其战略速决，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毛泽东同志把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2—453页。

在对待进攻与防御的关系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把进攻与防御机械地对立起来。他们的公式是：哪里有进攻，哪里便不能有防御；哪里有防御，哪里便不能进攻。攻就是攻，防就是防，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同一性。他们根本不懂得进攻与防御之间的辩证法，不懂得防中有攻，以攻为防。他们极力主张并推行的那种消极防御，如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是一种假防御。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实行阵地战，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首先是实行进攻中有进无退的冒险主义，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有退无进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变成了逃跑主义。

其次，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还体现了进与退、得与失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处于劣势的红军为粉碎处于优势之敌的“围剿”，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即诱敌深入，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结果五次反“围剿”，前四次都因此取得了胜利。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我红一方面军提出“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后歼灭”的战略方针。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下，活捉了蒋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共歼敌一个半师，缴枪万条。只有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反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80页。

的方针，结果几乎葬送了革命。

当然，诱敌深入要暂时让敌人占去一些地方，“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懂得得与失的辩证法，坚决反对诱敌深入，理由是这样做会“打烂坛坛罐罐”，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毛泽东同志指出：“关于丧失土地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第五次反“围剿”“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持这种看起来好象革命的“左”倾观点的人“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①

毛泽东同志这种得与失、进与退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到了解放战争又发展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以二十三万兵力向我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面对十倍于我之敌，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只用半年时间，歼敌三万余人，扭转了西北战局，收复了延安。

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同“左”倾教条主义者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论战，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军事领域的斗争。毛泽东军事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运用于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科学地分析和解决了进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外线和内线、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95—196页。

优势和劣势等许多矛盾，揭示了辩证法的极其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为我们树立了运用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光辉典范。

（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积量变为质变，促使敌强我弱的形势转化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劣势军队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战法。因为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战斗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即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分解为我军的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被动中的主动。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①这一正确指导，最主要的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他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②又说：“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7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09页。

具有主动的内容的”。为达此目的，“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作战原则和方法，解决了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这一最困难的课题。中国工农红军运用上述的战略战术，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组织和实施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达到了更加完善的地步。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就是打歼灭战。毛泽东同志说：“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②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③

集中兵力与各个歼灭，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只有集中兵力，才有可能实现各个歼灭敌人；同时，只有采取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才容易形成和保持兵力的优势。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使我军由弱到强，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一敌我力量转化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饭要一口一口吃，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消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06—207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1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0页。

灭，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又必须从小口小口吃做起，逐步发展为大口大口吃。这种从小到大，逐次歼敌的方法，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消灭敌人的一个客观发展过程。

六 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同志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于全部战争的指导和他的军事著作中，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实践证明，这个思想是我们党取得武装夺取政权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 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我们党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建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性。直到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党才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没有革命的一切。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党的“八七”会议揭露、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领导了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来，毛泽东同志在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地明确指出：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

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①因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②尤其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要推翻握有强大军队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是非有自己的军队不可。

要不要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经过党内的尖锐斗争和得到了血的教训之后才解决的。怎样建设人民的军队，也是有两种历史观、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由于红军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中，红军成分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还有很多是从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反映到军队中来。这些错误思想，是与革命军队的本质不一致的，对红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原理，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在这条正确的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人民的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8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2页。

(二) 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要走什么道路？是否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起义的道路？当时这是全党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实际上已经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但全党对此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党内，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问题，在一个长时期内是有严重分歧的。

党内犯有“左”倾错误的同志，生搬硬套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有的同志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有的同志提出：“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口号，制定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王明认为“可以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的胜利”。他们长期坚持以城市为中心，怀疑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是否代表了无产阶级利益。他们不了解农村工作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农民力量超过工人力量将不利于革命。在他们看来，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和“左”倾错误思想作了坚决的反复的斗争，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国情，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经验，逐步地从理论上解决了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道路问题。

首先，从理论上解决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问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的同志

在敌人“围剿”到来的时候，或在困难和危急的情况下，曾经怀疑红色政权有长期存在的可能。在红军中，也有少数同志主张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因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明确地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并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中国的农村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生存。因此，红色政权就可以利用农村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而存在。又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必然会产生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从而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所以，红色政权就可以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产生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革命有基础有影响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有政治的经济的斗争经验，他们必然支持红军，拥护红色政权。第三，国民党的统治，必然会加深中国社会各方面矛盾的发展，不可能有长期的稳定，因而红色政权不仅可以长期存在，而且能够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第四，有了坚强的红军，红色政权的存在就获得了可靠的保证。第五，共产党的政策正确和组织的坚强有力，是保证红色政权得以坚持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革命暂时在城市中无法取得胜利的条件下，革命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在农村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根据。

其次，从理论上解决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怎样才能长期

坚持和发展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認為，為了使農村根據地能夠長期堅持和發展，必須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三者正確地結合起來。武裝鬥爭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離開了武裝鬥爭，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土地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如果武裝鬥爭不和土地革命結合，就不能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有了武裝也會陷於失敗。農村根據地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战略基地，如果沒有根據地，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堅持和發展，武裝鬥爭就會失去依靠，有被敵人擊敗的危險。武裝鬥爭、土地革命、農村根據地建設，這三者的結合，就是“工農武裝割據”的基本思想。

再次，從理論上解決了“工農武裝割據”和奪取全國勝利的關係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評了林彪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的右傾悲觀思想，和忽視建立紅色政權的錯誤。進一步闡明了建立紅色政權和奪取全國勝利的關係。他指出：“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线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① 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巨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促進其內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使其成為奪取全國政權的主要工具；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指明了中國革命在城市中被強大敵人擊敗，暫時無法在城市取勝的條件下正確發展的規律，即建設農村革命根據地，以

^①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95頁。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三) 依靠和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是 革命胜利的一个法宝

有了人民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怎么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把作战方针放在什么基点上，党内又展开了两种思想、两条方针的斗争。

有些人看不到或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片面夸大军力、经济力，特别是武器技术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③毛泽东同志总是从相信人民群众力量出发，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人心向背和人民群众力量的基点上，对革命战争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只看到日寇武器比我们精良和敌强我弱的一面，得出了亡国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明确地指出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的方面的，敌我的优劣形势肯定会在战争中发生变化，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几百万军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并扬言三至六个月消灭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6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8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7页。

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都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性质和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解放军占优势，我们的革命战争是**为着解放全中国人民的**，必然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相信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胜利之本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又总是从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出发，制定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他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在他看来，民众是军队的补充和发展的源泉，民众是革命战争的财政来源，民众拥护是建立根据地的最重要的条件，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便无敌于天下。因此，他坚决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并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即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外交战线、文化战线等各方面的斗争密切配合。结果，形成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蔚然奇观的人民战争的雄伟局面和势不可挡的力量。这就是，由于广泛发动群众，我军力量便能迅猛地发展壮大，如抗战初期我军大约六万人，放手发动群众后，到抗日战争末期，便发展到九十五万人，还有一千万自卫军作为后备力量。由于广泛发动群众，我军在战争中便能得到群众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如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等三大战役，我军参战人员有二百三十五万人，而支前民工就有五百三十九万人，还支援大批粮食等物品，为我军战胜敌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物质力量。由于广泛发动群众，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2页。

我军得到群众各方面帮助，能够随时掌握敌情，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总之，正由于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才造成了弥补我军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胜了在数量上、武器技术装备上都占优势的敌人，赶走了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得了全国胜利。

为了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又把政治动员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看成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他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①“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②。并且明确指出，政治动员不仅要把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而且要给群众以物质利益，如实行土地改革或减租减息等，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士兵和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保证人民战争的胜利。

总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军事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的重大发展。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阐述和实践经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更加自觉地坚持群众路线，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和方针建立在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力量的基础之上。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80页。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总结中国革命一系列的独创性的经验，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解决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这些科学著作，构成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贯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政治理论相统一的光辉文献。

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使我们具体地领会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怎样在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确立正确的战略、策略原则的，从而加深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

一 正确分析国情是党创立革命理论， 制定纲领、路线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国情，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际，理论和纲领、路线、政策，则是对国情的集中反映。我们党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和政策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国情的结果。反之，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都是由于认识不符合中国国情。

（一）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只包括该国的国土、人口、历史情况和自然资源情况，而且是指该国的经济状况、阶级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等，简言之，即该国的经济政治制度，该国的社会性质。其中，具有直接决定作用的东西，是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①由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生产地位、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同，决定各阶级间的经济利益不同，对生产关系所抱的态度不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然，生产关系不可能脱离生产力而单独存在，它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当我们谈到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性质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就意味着包括生产力在内，尽管它不直接决定社会的性质。

中国国情是中国革命所以产生的依据。离开中国国情，就谈不上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而王明等人以为只有马列的“本本”和共产国际的“本本”，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据，以“钦差大臣”自居，从不研究中国国情，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损失。

（二）从实际出发，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中国国情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国情作了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分析，为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首先，从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入手，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确立革命的性质。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都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什么是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②毛泽东同志具体地分析了旧中国的经济状况，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因素也逐渐生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6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8页。

长，但封建半封建制度仍占优势，所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①。

其次，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分清敌我友。毛泽东同志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城市中的买办生产关系；代表并维护这些旧生产关系的，就是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说：“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多难，从其经济地位出发，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同时，又具有对反动势力的妥协性。它不能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到胜利。无产阶级身受三重压迫，是个最有觉悟、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剥削，迫切要求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据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③。

再次，分析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属的范畴及其前途。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我们不仅要从事物的内部，而且要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6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35页。

物的发展。“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②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③其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

最后，毛泽东同志在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据此，“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④“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⑤

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①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8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8—629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7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7页。

义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的革命纲领和路线，都是完全正确的。其中贯串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的。

二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与历史唯心主义认为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这一基本原理，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决定作用。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这一原理在无产阶级政党活动中的系统运用，它告诉我们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但是，在任何时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的主体。正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基础。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不但创造物质财富，还不断改善生产工具，积累生产经验，使生产力不停顿地提高、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推动着社会前进。

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①。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是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文化活动为基础的，是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8页。

对人民群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文化活动的经验的概括、总结和提高。任何重大技术发明，它不仅是由生产进程所准备的，而且通常也是由生产需要所引起的，更不用说它的推广与使用全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了。

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中，他们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人民群众起来摧毁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在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历史阶段，有的剥削阶级或集团虽然也能参加这种斗争，有时甚至还是这种斗争的领导者，但是，人民群众终究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推进者。

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由于经济利益所系，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愿意变革不符合本阶级利益的生产关系，到一定时期又极力阻挠变革符合本阶级利益、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生产关系。因此，为使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只有通过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翻保护旧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推翻维护旧制度的剥削阶级，才能达到目的。这个过程就是社会革命的过程，亦即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战胜反动的剥削阶级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②他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2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5页。

等名著中,通过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战争,生动而具体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阶级斗争的主力军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的观点。他说:“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①为什么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下,毫无外援,却巍然屹立,而国民党统治区却民生凋敝,屡屡战败?就因为“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而国民党统治集团“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②为什么国民党反共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喜欢‘反’。”^③。

(二) 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④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坚持群众创造历史,反对英雄创造历史;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反对群众自发论,这是统一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共产党这样的先锋队,才能彻底解放,否则,人民群众失去革命的领导,革命事业将遭到失败。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3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47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2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8—999页。

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党的领导如何作科学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之所以是先锋队，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仅仅因为，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它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它正确反映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这就是我们关于党的领导的观念。根据这个观念，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因为，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党坚持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三）革命领袖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公仆

关于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党的杰出领袖在革命和建设起着重大作用。但是，领袖是个集体而不是个人，领袖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公仆。毛泽东同志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

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①

革命领袖不是天才，而是产生于群众斗争中，他们最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就在于：“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②后来，他又进一步从认识论上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与人民群众去考验。”^③

因此，我们既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又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相互转化、互易其位时，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5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3页。

③《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辩证法。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①这一科学论断，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发挥。

（一）必须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生产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东西。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形式和发展方向。由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情况不同，因而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就不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其内容，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当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某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0页。

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的统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任何社会的经济基础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也必然是那个剥削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经济基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必然发生变化。一种旧的经济基础让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后，旧的上层建筑必然或早或迟地被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然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它自身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稳定性。所以，它们并不总是和经济基础一同变化。但是，经济基础若发生了根本变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发生根本变革，引起整个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这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实践活动中，坚持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生产力的状况当作观察和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①毛泽东同志制定并阐述的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就是从中国社会生产力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0页。

发展状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的。它明确地规定了束缚或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必须打倒；能够促进和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必须依靠。检验一条路线是否正确，区分谁是革命派，谁是反动派，不是哪个人主观随意想出来的，归根到底是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何等的影响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

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全国的生产力状况，指出现代化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①我们党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充分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化三改”不搞不行，搞得太快，要求太高也不行。“一化三改”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制定党的路线的光辉范例。

（二）必须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 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构成生产方式这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在其相互作用中，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否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当着生产力发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0页。

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①在旧中国，尽管封建土地制度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却长期延续着，并不能自动变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起来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生产力才得到迅猛的发展。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辩证法，就是机械唯物主义。

至于我们党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所犯的“左”的错误，那决不是由于毛泽东同志论述的上述原理错了，而是由于对这一原理作了歪曲的运用。由于在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方面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滋长了骄傲情绪而陷入了盲目性。把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忘记了，把生产关系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一定条件，夸大成无条件的；撇开了生产力的状况，抽象地看待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似乎改变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不是客观的生产力而是人们的思想状况和主观努力程度；在任何条件下，只要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都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正是这种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反作用原理的错误观点，导致了轻率地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犯了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

同样，经济基础一般地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但是，上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它一经产生就为经济基础服务，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上层建筑这个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般来说，当它为先进的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0页。

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力量，当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力量。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对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比较，充分证明了这个原理。无论是作为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权力量，都分别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新民主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作用，这本身也是经济基础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环节。所谓“一定条件”，是指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客观条件，而不是主观愿望的东西；所谓“决定作用”，是指上层建筑本身的矛盾地位转化以后所起的决定作用，而不能代替经济基础的那种“决定作用”。

懂得这一道理，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在上层建筑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左”的错误。一是把毛泽东同志阐述的关于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决定作用的科学原理绝对化了，片面夸大上层建筑、政治、精神的作用，以致不是受“一定条件”严格限制，而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不是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是离开经济基础一味搞政治运动。二是忘记了毛泽东同志阐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固然仍有矛盾，但它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调节得到解决。因此，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历史的教训说明，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变革生产关系，去搞经济

基础、上层建筑革命，不但不能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地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四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战略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由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它不仅是我们处理国家之间、政党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守的一条根本的政治原则，而且是我们从事一切工作，完成任何事业必须遵循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略方针的制定是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

首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国情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承认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运动、发展、变化。所以，人们要想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如实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要靠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寻找、创造和决定，要在领导中国人民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既不能靠现成的本本，也不能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6页。

盲目听从别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单纯地依靠别的国家帮助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把自己的基点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因为中国解放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不同，有自己许许多多的特点，所以，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就不能照搬苏联等国家的经验，而必须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问题。

其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具备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但是内因与外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往往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制定与实行，就是这一原理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当然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外援，要想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首先需要我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努力把本国的事情做好。

再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实际运用所得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须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②列宁也指出：“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③“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④“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1页。

③《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8页。

④《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6页。

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①这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条重要原理。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提出和实行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一原理的必然产物。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所，我们党都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它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坚持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极端艰难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毫无外援，许多人曾经对革命悲观起来。这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②

由此可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它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一个方面，又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经验结晶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方针的确定来之不易，是全党付出了血的代价、经过曲折的道路才深刻认识到的真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陈独秀不懂得独立自主，一方面盲目地迷信“本本”，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会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党的路线和政策；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和依靠工农群众，而是相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信蒋介石，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5页。

误，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是正如周恩来同志总结的，起义以后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而是远走汕头，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搞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的独立性，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身上。又是毛泽东同志制定并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制定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领导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际上有人要求我们不要和蒋介石打仗，应当交出枪支和军队，说如果打仗，中华民族要毁灭一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听这种意见，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①“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②号召全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结果我们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国民党赶到了长江以南。接着我们又抵制了“以长江为界，平分天下”的国际舆论，采取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战略决策，很快就取得了解放全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59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4页。

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建国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对新中国实行严密封锁，毛泽东同志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①我们不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了生产，而且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九六〇年，我们又顶住了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的强大压力，还清了苏联的全部贷款。我们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战胜了暂时的困难，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

事实证明，什么时候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胜利；反之，就受挫折就失败。由此可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必然得出的一条科学结论。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正确反映。

（三）必须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党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战略方针。对于这点，我们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方针。

第一、必须认真研究中国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信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5页。

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①我们并不讳言，我们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还曾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有的同志因此断言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切都是外国的好，用外国的某些先进的东西来贬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党历来提倡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有益于我国的东西。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妄自菲薄。

第三，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我们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机会争取外援，包括引进各种先进技术设备，加强和一切友好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科学的利用外资等。这些都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如果外国的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不学，偏要自己一点一点地摸索，我们急需的外国的先进机器设备一点也不引进，偏要自己从头一点一滴地搞创造，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所以，我们要肃清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错误思想，明确争取外援和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搞建设这样一个辩证关系。

五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是一切革命人民克敌制胜的一个根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页。

本原则。它既体现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又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的科学性，是对马列主义战略、策略理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思想，武装和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它不但适用于军事斗争，而且适用于政治斗争；不仅适用于打倒国内外敌人，而且适用于做好一切工作，战胜一切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 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个命题中的战略和战术，虽然源于军事学，但在这里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它指的是革命者在各种斗争中应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教给我们在同强大敌人、严重困难作斗争时，从战略和战术结合上应当遵守的正确原则。

毛泽东同志这一科学战略思想有其发展过程。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①“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原则之一。”②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11、209页。

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①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的讲话，全面地完整地对待真老虎到纸老虎的转化，从战略到战术，进行了哲学论证。

毛泽东同志这一战略思想，是建立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的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早在我们党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断言农民运动将势如暴风骤雨，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这种群众观点是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这一战略思想以对立统一规律的发展观，估计敌我力量，看到进步的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反动的腐朽的力量是垂死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战略思想是战略和战术的辩证统一，是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的自觉能动作用的辩证统一，是革命胆略和斗争艺术的辩证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是从整体上、本质上、发展上看问题的思想方法

这里所说的“战略上”，指的是要用对立统一观点，分析敌我双方这个矛盾统一体，从双方的整体上、本质上、发展上观察他们的变化和前途。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9页。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战略，我们的长远计划，“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观点，出发的。”^①这是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依据这个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②

历史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发展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立的双方在相互斗争中发展变化，原先强大的变为腐朽的，原先弱小的新生的则变成强大的。转弱为强，化强为弱，新生事物成长起来，腐朽事物衰亡下去。在自然界里，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遏止的自然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起作用，认识并运用社会发展规律，逐步地使真老虎变为纸老虎，使革命人民由弱者变为强者，变为胜利者。历史就是这样在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中，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规律前进的。因此，我们要从对立双方的相互联结的整体上估计敌我力量及其前途、命运。在整个社会中，人民总是大多数，反动派是极少数。从本质上

①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第3页。

②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第1—2页。

看，反动派是腐朽的衰亡着的势力，而革命人民是新生的成长中的力量；从发展上看，反动派不合乎历史潮流，矛盾重重，失道寡助，分崩离析，一天天烂下去，而革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符合历史趋向，得道多助，团结一致，一天天好起来。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①

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分析问题，从而在战略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革命人民。如在井冈山时期，林彪右倾悲观，提出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同志却指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②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决不只是豪情诗意，更不是算命卜语，而是对革命形势包括敌我双方本质的、发展的观察和分析。他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现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③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教给我们一种透过现象看到实质的、学的分析方法。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62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页。

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成了国际宪兵，恐美几乎是世界范围的流行病，不少地方的革命力量因为怕美帝、怕原子弹、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在这股似乎强大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逆流面前，在美帝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企图一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同志从本质上、发展上分析了美帝国主义，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①有人不是怕原子弹吗？毛泽东同志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②有人害怕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③美帝的战争宣传固然表明其野心和梦想，但是，它“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④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科学分析，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50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0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0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9页。

毛泽东同志作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①的英明论断，鼓舞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从而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就是在斗争策略上、具体事件上，要有科学态度

这里所说的“战术上”，指的是在斗争策略上，在每个局部上，在每个具体事件上，必须采取慎重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

“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②我们战胜敌人，战胜困难，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敌人也好，困难也好，都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必须与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1页。

^②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第2—3页。

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①“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②积小胜为大胜，积局部的胜利，为全局的胜利，由量的积累，部分质变，最后引起全局的质变，达到战略上胜利的目的。

在战术上重视的根本方法，就是要重视对于矛盾特殊性的研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所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充分体现了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策略思想。例如：先打孤立、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力求全歼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之下有胜利把握，等等。正因为战术上如此重视敌人，我们才能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而胜之。

（四）把握战略与战术的辩证关系，做到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统一

战略与战术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不能正确地掌握战略与战术两者的辩证关系，以片面性、表面性即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革命斗争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是不乏其例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就其战略思想而论，就是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00页。

力量，为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结果走了叛变革命的道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则过低地估计了敌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采取反科学的主观主义态度，结果使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抗日战争中，“亡国论者”不懂得战略上藐视敌人，“速胜论者”不懂得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指出抗日必胜，提高了我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又论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暂时优势，制定持久战的方针，采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等一系列战胜敌人的具体措施，使战略和战术得到完美的统一。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统一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基础上的。缺乏革命精神，既谈不上战略上藐视敌人的信念，也谈不上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毅力。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①

要做好转化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考察事物的转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要学会应用对立统一规律，去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所固有的两重性。既要看到实现四

①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第3—4页。

化的可能性，又要看到我们完成任务的艰巨性；既要看到有利条件、顺利的方面，又要看到不利条件，困难的方面，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统一起来，正确地处理战略与战术二者的辩证关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六 统一战线是革命和建设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问题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完整的理论与策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此做了深刻的论述和概括。

（一）依据中国革命客观规律，阐明统一战线基本原理

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②

什么是统一战线呢？革命统一战线是各革命阶级、阶层、派别或集团为了反对共同敌人所组成的政治联盟，是无产阶级正确处理自己与同盟军之间关系，团结对敌，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路线的理论和策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9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8页。

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提出支持民主革命运动和与民主政党争取团结的要求。列宁又把争取同盟军的问题提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为了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

首先，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为解决同盟军问题而组成的革命联盟。

无产阶级在各国尤其在我国人口中居少数，必须有广大的同盟军，才能孤立和战胜敌人。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指出，救中国的根本道路是组织民众的大联合。为了纠正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要做好群众的向导，必须“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这篇著作作为我们党划清阶级阵线，建设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依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分析，在统一战线内部，有两种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所组成的劳动人民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和基础；另一个是全体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其次，坚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哪一个阶级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决定统一战线性质、作用和革命发展的方向、道路以及国家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

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①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对同盟军而言的。如果没有同盟军，就没有统一战线。既然没有被领导的对象，也就无所谓领导权的问题。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

再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共同奋斗，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②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解决统一战线的各种问题获得巨大的成功。第一，从社会基本矛盾上，分清敌友，壮大革命力量，孤立敌人，在对立斗争中使革命力量由弱变强；第二，在处理统战内部矛盾上，解决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坚定地立于统一战线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支配、规定、领导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保证统一战线的革命性质和作用；最后，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解决马克思主义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矛盾，批判和反对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坚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持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同盟者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统一战线实行正确的领导。

（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提出 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他特别对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作了深刻分析。

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张国焘则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毛泽东同志则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①，“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②，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③党内“左”右倾错误者都由于不懂得从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政治特点入手，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从而不能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点之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7页。

一就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①毛泽东同志说：“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于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②他还指出：“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③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70页。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为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各种复杂矛盾以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树立了典范。

（三）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同志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分析了统一战线策略和关门主义策略的原则区别。他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可能变动一样。……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而“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①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确定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陈独秀和王明都不懂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陈独秀搞的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王明则先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后又“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②“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1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35页。

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①“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及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②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活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而教条主义者却搬用苏联的经验，认为基本的打击方向是使中间的社会政治力量陷于孤立的公式，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毛泽东同志是在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基础上提出上述方针的。他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③他详细地分析了中间势力，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各自既同工农群众和进步势力有矛盾，又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有矛盾。尽管他们容易动摇，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但是他们中有些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抗日，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或勉强的中立，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同时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71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3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6页。

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策略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从而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使革命遭致失败相反，我们党胜利地打退了蒋介石顽固派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三年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制止了他们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阴谋。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实现领导权的两个条件。他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①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②“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③我们既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又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是错误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结果。

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是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68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62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5页。

化的。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新时期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担负着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担负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

第五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最富于开创性和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部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些思想。这些著作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土壤，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不仅是毛泽东矛盾论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出的新贡献，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它必将发挥出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中，依据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表述的思想，首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他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情况、特点和性质，指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和途径，从而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一）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的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对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刻的考察，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经济必然性所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说：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①这个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的基本思想做了精辟而完整的表述。首先，他从社会的各种矛盾中，抽象出社会内部的两种基本的矛盾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其次，说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最后，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规律，阐明了社会变革、发展、前进的根本原因和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这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的结果”。他所概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范畴及其辩证运动规律，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于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经典表述，为后人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石。

列宁在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他指出：“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原始关系。”^③“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④在马克思具体分析社会状况时，他总是“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⑤。可见，列宁也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两对范畴为依据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基础理论的。

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④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义改造，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必须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同志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分析和说明、解决我国社会矛盾问题。并且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写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

第一、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实际表现，批判了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①他针对“无矛盾论”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说：我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想法”^②。

第二、毛泽东同志从总体上系统地分析研究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呈现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正是这些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但是，各种各样的矛盾对推动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等的，有的起主要作用，有的起次要作用，有的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经常地发生作用，有的只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起作用，有的占支配地位，规定、制约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有的则处于被支配地位。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社会矛盾范畴，概括为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基本矛盾与其他社会矛盾相对比，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它贯穿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所谓基本矛盾，就是“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①；二是它规定、制约、决定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性质与状况，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三是它规定着社会生活的本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科学概念，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因素。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范畴之间的必然联系，集中地标志出社会发展辩证运动规律的实际内容，提高了人们掌握这一规律的自觉的能动性。

第三、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并揭示了它们的相互关系之后指出，不论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经济、政治、思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同过去其他社会一样，都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所制约。据此，他作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的科学论断。并且指出，这些“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③，这样，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实际内容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提供了理论武器。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9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第375页

（二）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毛泽东同志不仅原则地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而且对这些矛盾在我国社会中的实际情况、特点和性质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和途径，进行了理论考察，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第一、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况及其特点作了科学论证。

毛泽东同志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内容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之后，当即说明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这样，就从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上，清楚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现实情况和性质、特点。

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情况来看，它表现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和特点。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①这里所说“相适应”的主要表现就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全体劳动者成为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主人，使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展；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并且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密切的结合起来，这就使全体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所有这一切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它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从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这里所说“相矛盾”的表现，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它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不可避免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有待于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消除。正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新建立起来的，所以它自身需要有一个在建设实践中巩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现在由于人们对它的客观规律认识尚不深刻，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自然地还存在着许多很不完善的方面。例如，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上，如何才能适应我国生产力状况，需要采取何种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形式，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原则、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与交换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这些复杂的问题，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需要在实践中寻找、创造比较适当的形式，克服相矛盾的环节，以解决不完善的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旧的相矛盾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相矛盾的问题又会产生，只有不断地解决相矛盾的环节，即消除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完善化，才能达到相适应的局面。

其次，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①其“相适应”的表现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组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保证。其“相矛盾”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还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在初建阶段，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国家工作人员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存在，它们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这些相矛盾的方面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日臻完善，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

再次，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它们之间相适应的方面是主导的、基本的；相矛盾的方面则是非主导的、次要的。这些矛盾经常产生，又在自我完善中不断解决，推动社会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特点。

最后，毛泽东同志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他说，同旧社会相比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矛盾的产生基础和旧社会不同。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某些环节上的局部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用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的生产力性质之间的矛盾。从而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状态，它是在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某些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基本适应其经济基础，具有自觉调节、自我完善的机制。就是说，矛盾自身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使这种非对抗性质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373页。

矛盾，发展到对抗形式的地步。这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毛泽东同志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这就决定了解决矛盾必须采取自我完善的方式，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需要，使它们协调起来，推进社会前进。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②又说：“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③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科学著作，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各个领域的社会矛盾提出了指导原则，他在实践上也创造和总结了一些宝贵经验。这是值得我们很好继承和发扬的。

（三）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原理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另一重大发展，就是他在《矛盾论》中，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对立面双方主次地位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观点，阐明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原理。

他在《矛盾论》中提出，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375页。

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①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②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思想和论述的基础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在其自身辩证运动过程中对立面双方所处的矛盾地位和作用，主次之间相互转化的情形，作出的透彻分析和精辟的论证。这就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理论内容，作出了全面性的深化和发展，它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彻底地和历史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科学论断，从三个方面深化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内容：

第一、用矛盾同一性的转化原理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中的地位互相转化，批判了机械唯物论所坚持的对立双方互不转化的形而上学观点。这样，就揭示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原因。

第二、用矛盾的重点论说明了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所起的反作用不是一般情况下经常所起的那种反作用，而是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就使人们认清并重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及其巨大反作用的意义。

第三、指出了转化的“一定条件”。这就是“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0页。

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①，“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②。阐明了转化的时机和内容，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依据他阐明的上述原理，在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作出了许多科学论断。他精辟地指在，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以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推翻旧中国反动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建设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创立了完整的政权建设学说，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他还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并且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工作方法。

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人类创建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的实践经验，批判了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思潮，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新的带根本性的课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系统论证社会主义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0页。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政策和方法的伟大著作。它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残存着不平等，还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这是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存在的经济根源。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失，矛盾还会存在。”^①并且具体指出了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单个部分与工人国家也可能发生磨擦和冲突；工农之间也存在协调的问题，必须从经济科学的观点来审查小农经济的要求；而资产阶级思潮则更是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等等。但列宁研究的还只能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情况。斯大林对此继续进行了探索并试图作理论的概括。一九二五年，他曾提出“两种矛盾”的概念，即苏联内部矛盾和同外国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内部矛盾指的是无产阶级和作为私有制的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一九三〇年，他就工农结合问题，区分了“结合内部的矛盾”和“结合范围以外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之间的矛盾同无产阶级和富农之间的矛盾”，并认为前者“随着工业化的增长”，“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②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农民已成为完全新型的农民，同时宣布各社会集团之

①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12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页。

间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都在缩小和消失。从此，斯大林一再强调的是苏联“没有阶级冲突”，“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①。直到斯大林逝世前一年，他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是没有任何矛盾。但是，他还是没有把它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从实践上看，斯大林刚刚宣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已经消失之后，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了肃反扩大化。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颠倒了敌我。随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激化到对抗的程度。这时候，我国刚刚经历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次大变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广大群众既欢迎新制度又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也缺少经验，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就要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敏锐性，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批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②讲话列举的十种关系，其中九种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年，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从全社会范围内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重要思想^③。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同志作

①《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3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③《毛泽东书信集》，第514页。

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在这前后，他发表多次讲话，主要论题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反复重申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不仅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还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①。社会主义的团结统一，并不否认矛盾，只有在不断地正确处理 and 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他告诫我们说，不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处理问题，不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就会在社会矛盾面前处于被动，甚至在政治上犯错误^②。

（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已居于主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首先，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况，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同时又相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③在原始社会以后，以往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都是阶级的对抗。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再是阶级的对抗。但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3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种不同的公有制，同时在一定范围还存在其他所有制形式。公有制内部也有不同经济部门、单位间的关系问题，存在国家、集体、个人间的矛盾，这些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局部性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制度要经历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同生产力的发展有矛盾；上层建筑也有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方面。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实践的内容和方法，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

其次，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社会关系的现状，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①他在一篇亲笔写的讲课提纲中明确提出，现在处于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同志又说，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他还说，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会有，但是内容变了。这就是说，政治是有具体历史内容的，随着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政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由主要是由阶级斗争变成主要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已经强调国家职能的民主方面，即从处理敌我矛盾为主转变为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提出“把正确处

^① 《毛泽东书信集》，第514页。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同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指出:“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既不复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使全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新的社会形势获得自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规律获得自觉。”

再次,毛泽东同志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了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指出: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这段话事实上已经说明,在现阶段我国已不存在完整的敌对阶级,而人民已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广泛得多的概念。

毛泽东同志深入细致地考察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现在条件下复杂纷繁的表现。“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共性。但它们还有各自的个性,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有少数民族问题,也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③。

二是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的一面。”^①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状况得出的科学结论。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科学论断，用和平的方法成功地使这对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同爱国统一战线中某些爱国者的矛盾，大体也是这种情况。

三是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②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的上下级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也属于这一类型的非对抗性矛盾。

四是党内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③这就是说，党内矛盾是客观存在，否认这种矛盾以及解决这种矛盾的思想斗争，是错误的；同时，党内矛盾是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把它一概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就是阶级斗争，采用不属于思想斗争的方法，甚至武力的方法，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讲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时，曾经指出：“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1页。

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①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矛盾。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差别的，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人类空前伟大的事业中，谁也难免犯错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分清“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②。一个党员即使不具备无产阶级先锋队条件，被清除出党，仍然可以是普通群众，而不是敌人。他同党的矛盾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除敌我矛盾以外大量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概括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重大贡献。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③这是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原则。但是，他也指出，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实践证明，混淆两类矛盾，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

其次，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根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3—2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4页。

本的利害冲突，是对抗性矛盾，解决这类矛盾，必须用专政的方法，强制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解决这类矛盾，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①所谓民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概括，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②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党内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把它扩展运用到整个人民内部矛盾领域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的基本方法。这个在思想上、政治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公式，体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辩证运动。团结和批评是辩证的统一。团结是目的，批评是手段，是矛盾的斗争形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解决矛盾的手段取代矛盾本身，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对的。把批评同团结绝对地对立起来，要么一味斗斗斗，否认团结，要么以为团结不需要斗争，从而软弱涣散，都是形而上学，都是违背这一公式的。

用民主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不否认或忽视政策、法律等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为了确立人民内部的正常关系，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国家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人民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提供共同的行为规范，并

^①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红旗》杂志，1978年第7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页。

且对侵犯公共利益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给予必要的约束和处罚。这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可缺少的补充手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①

第三，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原则，总方法。而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它的存在并不都是由于政治和认识上的原因，更多的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在现阶段，由于多层次的经济关系，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完全是一致的，甚至还经常发生摩擦。解决这些矛盾，仅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不够了，还必须运用经济协调和经济立法的方法。归根到底，还需要用发展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解决。

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要解决这些不同领域的具体矛盾，就必须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原则，制定出各种具体方针。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原则、总方法，而且还为解决不同领域的具体矛盾，制定了各种具体方针。

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团结与合作。

在科学文化工作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六条标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允许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的自由争鸣。通过讨论和实践解决科学艺术上的是非，反对用少数服从多数和行政命令的手段强制推行一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页。

风格、一种学派。

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①

毛泽东同志还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他说，我们要经常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好这方面的矛盾。为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同个人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原则②，要求“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③。“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④

第四，“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⑤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388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0页。

转化。矛盾的斗争形式分为对抗和非对抗，这两种斗争形式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非对抗性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可能激化，发生对抗。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变成敌我矛盾，矛盾性质变了；更多的情况是暂时采取了对抗的形式，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怎么激化的呢？毛泽东同志指出：“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①他分析了几种情况：或者是政策上犯了错误，或者是工作方法不对，或者是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或者是失去警觉。所谓失去警觉，也不是限于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更多的是指对人民内部可能激化的因素没有防患于未然。

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而是过去人类历史上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留物。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还很不完善，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助长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曾把体制改革看作是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措施。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有共同的思想、信念、道德、纪律和行为准则。由于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少数人违背了这些准则。既然失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人民内部的种种矛盾也就没有正确处理共同思想基础，于是矛盾激化，形成对抗。因此，毛泽东同志说：“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②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应当指出，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人民内部矛盾开始跃居突出地位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概括和分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独创性贡献。但是，当时许多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全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还很不深刻，很不具体。我们对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被消灭的社会政治生活，还不习惯；相反，还保留着许多过去在长期激烈阶级斗争中形成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习惯。因此，在实践中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犯了错误。

三 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胜利实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而且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个提出者和开拓者。虽然他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有过失误和挫折，但是，他毕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敢于披荆斩棘去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榜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辩证法问题的探讨。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客观上成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首先，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解决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鉴于建国初期我们照抄苏联的经验而走过一段弯路的教训，鉴于那时人们对于苏联的迷信已经成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障碍，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根本原则。他指出：“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①他还指出，“经济建设我们缺乏经验”，“需要积累经验”^②，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③，要在实践中去解决客观规律与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苏联已经暴露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重走他们的弯路，没有任何理由再度陷入教条主义的盲目性，唯一正确的出路只能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性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思想原则。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之后，他进一步觉察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①，再次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他倡导并身体力行，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一系列著作，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

为了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对待苏联经验和一切外国经验应取的科学态度。解放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几乎一切都照抄苏联模式。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多好的经验，我们学习这些经验，如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国民经济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文化等，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了照抄苏联所带来的弊病，例如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忽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汲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②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那种离开中国具体经济特点，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指出：

^①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402页。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①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挫折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都说明，采取这种有分析的科学态度，有利于我们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其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早在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后来，他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步经验的《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分析研究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概括起来主要讲了这样几点：

（1）我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它还刚刚建立，还不完善。（2）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但也有困难。（3）我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民的情况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极大。（4）我国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我国的这些基本国情，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出发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点。正是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同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方针政策。

(二) 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诸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摆脱苏联的经济模式，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①他在认真总结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具体地分析了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关系到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根本问题。他认真总结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验，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②“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会更加稳固。”^③这是因为，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和城市、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来源，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主要市场，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如果我们的农业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①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并要求计划部门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实践证明，这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二，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的工业过去百分之七十集中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他指出：“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② 而要发展内地工业，“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③ 这是因为，大力发展内地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机器设备、技术力量，对我国来说，要靠自力更生，主要是靠原有工业基础即原有的沿海工业。所以，沿海工业是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基础，“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④ 而且他认为，除了对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进行扩建和改建以外，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甚至可以是大型的厂矿。这与把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渐平衡是不矛盾的。只有这样，内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页。

地工业才能真正得到迅速的发展。

第三，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①。但是，他又指出：为了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②这是因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军队才能要粮有粮，要人有人；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有钢铁、机械、原材料和先进的技术装备建设国防；只有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了，才能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输送足够的技术人材，保证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必须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而“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③

第四，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利益关系的“三兼顾”原则，即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强调贯彻“三兼顾”的原则，必须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当它们之间发生矛盾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眼前的局部利益应该自觉地服从国家长远的整体利益。他明确地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鉴于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的不正确作法，毛泽东同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志特别强调要承认和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对农民的劳动产品不能搞平调，而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严格按照商品交换原则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要向农民征购和派购农副产品，但不能过多；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缩小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尽量使农民不吃亏。总之，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正确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十分强调处理好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合理地规定好合作社的积累和社会消费之间比例关系，想方设法减轻农民的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①

第五，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②毛泽东同志对此很重视，认为国民经济建设必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积极性，并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他一方面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③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6页。

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①“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②我们必须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适当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巩固中央的领导，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是我们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除了以上五点以外，毛泽东同志还科学地论述了积累和消费、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平衡和不平衡等关系，提出了要根据生产力状况即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以及经济的可能有计划地合理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要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者要力求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专家以及培养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等光辉思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熟练而成功地运用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观点、矛盾转化论思想以及事物发展平衡不平衡规律，为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贯穿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

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核心。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①这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②在文章的结尾又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具体化了。同时，他又深刻地指出：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④这是我们处理对抗性和非对抗的社会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首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实际状况出发的。这个实际状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的的是非对抗性的，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客观条件。非对抗性社会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的是解决非对抗性社会矛盾。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双方，没有根本的利害的冲突。这种矛盾的出现，或是由于局部的利害的对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

立,或是对共同的利益缺乏一致的认识,等等。因此,解决这类矛盾时,必须兼顾矛盾各方,使各方都得到适当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重要意义就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存在少量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对这类矛盾的解决,也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对抗性社会矛盾的一方,或者是破坏性的因素,或者是消极的因素,其中虽有坚持到底的顽固分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转变的可能性。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不是僵死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因此,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毛泽东同志还认为,解决矛盾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是相辅相成的。解决矛盾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并实行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这样才能取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效果。同样,如果一切积极因素得到调动,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得以充分发挥,那么,对顺利解决社会主义社会诸矛盾,也是十分有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①即使是解决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以及敌我矛盾,同样需要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其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主要的方面是相适应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根本要求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4页。

基础。只有当“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①，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说：“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的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②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天上的空气，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③只有正确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安定团结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人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才能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再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也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求主要依靠自己国内的人力和物力，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进行。而这一事业本身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它又从本质上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必然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加。这就要求解决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会主义社会里妨碍人民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的各种矛盾。只有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

第六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独创性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把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科学方法。他深刻论述了方法和方针政策的关系，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①他号召“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毛泽东同志论述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是实现革命和建设任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它从根本上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能力和工作能力，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实际运用开拓了新的领域。

一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7页。

的具体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一贯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①毛泽东同志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工矿企业、农村、城镇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及其相互关系，逐步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指引着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共产党人党性的高度，总结了他自己和我们党关于调查研究的经验，创立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正确地研究和解决四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开创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是无产阶级 世界观的具体体现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必须根据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划、依据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人们不能随意创造、改变或者废止任何客观规律，但是，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这些规

^①《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110页。

律,并且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谋福利。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科学的认识事物的工具,是正确地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调查研究乃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我们的基本功。党总是要求领导干部,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在这三者中,“情况明”是前提,是基础。只有“情况明”,才能做到“决心大”,也才能做到“方法对”。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②这里所说的“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就是指周密的调查,“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就是精心的研究。切实搞好调查研究,方能形成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最后作出正确的部署。指挥战争是如此,领导其他一切实际工作也是如此。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决没有也不可能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供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国情,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指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页。

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中国革命成功的因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国际条件，进行了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而正确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恰当地规定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全党和全体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斗争的方法。

（二）调查研究是一门科学

毛泽东同志关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是在同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王明教条主义只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言片语，对中国国情不甚了了，却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诬蔑毛泽东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是“狭隘经验论”。毛泽东同志同这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二九年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强调“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认为对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没有调查，不知底里，瞎说一顿，“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这些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思想获得一大解放。此后，毛泽东同志反复阐述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基本方法，从而使调查研究成为一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0页。

门科学。

调查和研究是两项互相区别而又紧密联系的工作。调查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是调查的升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是认识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理性认识。调查得来的感性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是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条件。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要解决问题，必须作系统的周密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坐在房子里想当然固然不行；只看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或者说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都危险；而大略的调查和研究，也仅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调查要亲自动手，掌握第一手材料，要选择二、三个单位，解剖麻雀。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

研究则是调查的继续和合乎逻辑的发展。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它表现为概念的形成和运用概念进行推理的过程，也就是经过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也是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同志强调：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调查和研究都要经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要把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应成为全党思想和行动的准则

有的同志认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他们了解情况，只要认真听取下面的口头和书面的汇报就可以了，不必亲自去作调查研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听取下面的各种汇报固然是了解情况的一种办法，但这不是主要的办法。下面送来的材料，即使是第一手的東西，是否真实，需要考察。只有亲自作一些调查和研究，才能得到对于实际情况的基础知识；才能判断下面反映情况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判断哪些情况是主要的，是经常起作用的东西，哪些情况是次要的，是一时起作用的东西；才能正确地综合下面的材料，消化并变成自己的东西，使自己的思想丰富起来，活跃起来。事实上，有些领导者之所以工作忙乱被动，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因而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打不准主意，拿不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愈是下不去，工作就愈是忙乱被动；工作愈是忙乱被动，又愈是下不去，如此恶性循环，工作显然是做不好的。

还有的同志认为，调查研究只是对于决策机构是必要的，执行机关，只要按照上级决定的方针政策办事就行了。这种看法同样是不对的。第一，制定方针政策，固然首先是决策机关的事情，但同时也是各级组织的事情。各级组织一直到基层，都有责任将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的情况，及时地如实地报告上级机关。第二，任何一项方针政策，不管事先经过多么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它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修正。这实际上是制订这一政策的过程的继续。所以，调查研究不但应当进行

于制定政策之前,而且应当进行于执行政策的过程之中;不但是决策机关的事情,而且同时也是执行机关的事情。第三,党的方针政策的原则精神,在它所涉及的地方都是适用的,任何地方都不得借口情况特殊而拒不执行。但是即使是最正确最完备的政策,也不可能把各个地方千差万别的情况都包罗进去。因此,每个地方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都应当通过调查研究,把党的方针政策的原则精神同当时当地的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出在当时当地执行的最恰当的方式方法。否则,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有时甚至还会遭到歪曲。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批评的那样,“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义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①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调查研究的过程,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学习态度如何,决定着调查研究成果的大小。有的同志下去作调查,往往爱跑下级机关,却很少和普通群众接触。从上面看,他是下去了,从下面看,他还是呆在上面没下来。还有的同志带着框框作调查,带着观点找例子,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这样作调查,收效自然不可能大。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②

①《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3—4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48页。

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其中之一就是“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总结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工作方法。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的具体体现。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领导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②。对此，他作了具体的精辟的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

所谓“从群众中来”，有三方面意思：一是“一切从人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4—995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5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4页。

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①二是“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②有些事情,群众客观上需要,但主观上还未觉悟,还不愿意,就要耐心等待。三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③,要善于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到群众中去”也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④任何领导意见都要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二是党的政策,不仅要领导人知道,而且要群众知道,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凡事靠大家办,反对少数人发号施令,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在我们党历史上,无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都根本不懂得,也不愿意实行这种领导方法。他们不从群众中来,而是从书本上来,从自己头脑里来;也不到群众中去,老子天下第一,结果无不受到历史的惩罚。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这一领导方法。它的科学著作的形成过程,无不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自己就说过:“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5—996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13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48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3页。

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这就是说，这些论文，只有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次反复之后，才能以完整的科学形态出现。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②我们党中央的文件，往往先以草案下发，经过试行，然后才修改成正式文件，也是为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二）唯物史观、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的统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统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领导方法上的具体运用。它坚信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必须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相结合，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公式是统一的。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也就是到实践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无限循环，也就是实践——认识——实践的无限循环，是把认识规律化为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讲了两个“化”，表示认识的辩证过程。比

^①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31—1332页。

如第一个“化”，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这个“化”，即加工，也就是“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①“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②这是毛泽东同志反复讲过的，指的是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同民主集中制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毛泽东同志说：“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③

（三）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同官僚主义根本对立的，是同它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体现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②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05页。

行动的最高标准。”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身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无论从群众中来，或到群众中去，主要地是依靠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是靠行政命令。要把领导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并见之于行动，其中包括宣传解释、说明教育、示范指导等一系列细致的工作，绝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所能做到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②他特别指出：“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③所以，把从群众中来误解成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是不对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④

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注意整顿党的作风，建设高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9—350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6、997页。

④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和完善国家管理制度，这将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制度上保证我们的干部不脱离群众，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三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科学工作方法正确地处理了领导和群众、实践和认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

（一）必须普遍提倡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同志强调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②他对这一方法进行了精辟的阐述，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它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③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2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3、852页。

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可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過程。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所谓个别指导，就是根据一般号召的内容，从自己所属的单位中选出一个或几个单位进行试点。试点的方法，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领导工作方法上的一项重要创造。试点的根本任务是通过试点单位的实践来检验业已形成的方针、政策或方案是否正确，使之丰富和补充，并取得进一步推广或贯彻执行的经验，用点上的经验去指导面上的工作。试点的过程基本上属于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从认识到实践的阶段。所谓“突破一点，取得经验”，虽然有反馈到认识主体，以补充、修改和丰富主体认识的作用，但重点还是在于解决如何具体贯彻落实，取得指导面上工作的经验，以便全面推开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提出了“蹲点”、“种试验田”、“一切要经过试验”等实行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具体原则和形式。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对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而且在领导工作中坚持实行这一科学方法。领导战争如此，领导建设也如此。比如毛泽东同志指导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5页。

全国农民发出了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号召。号召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①同时进行个别指导，搞了典型示范，作了调查研究，总结了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互助合作的典型经验。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亲自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方法正确，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调动了全国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取得，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取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正确领导方法是分不开的。

（二）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而就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开始，而后逐步地认识一般的事物。首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着人们认识了共同的本质以后，还要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各种具体的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补充、丰富和发展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这就是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把这一认识路线应用于领导工作，就产生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一般号召属于共同认识，它的产生离不开个别指导。通过若干个个别指导而形成一般号召，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发出一般号召之后，还需要再进行个别指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9页。

导，这就是由一般到特殊。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即个性、个别；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一般；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即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所以在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认识客观世界必须从认识个别事物开始，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逐一地考察了所有的事物之后，才能认识客观事物的全貌和本质。事实上，这样做无必要，也不大可能。我们只要选择恰当的典型加以深入的考察，通过试点，是可以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和规律性的。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这个意思。

试验和调查研究都属于个别指导，都是了解情况的手段，它们的差别在于，试验是领导者亲自实践的过程，是一个直接取得经验的过程，它比一般的调查研究更具有实践性的特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只有社会实践能够把人的思想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成为沟通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纽带和桥梁，验证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否和客观事物相一致。个别指导强调一切经过试验，目的在于使领导人员直接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密切同群众的联系，从而检验自己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是否合于客观实际，加以补充、丰富或修改。毛泽东同志指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指导。”^①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3页。

（三）一切要经过试验

一切要经过试验，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的具体运用。如果说上级机关制定指示的过程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那么下级机关贯彻这些指示就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从个别到一般需要经过试验，从一般到个别也需要经过试验。上级机关的任何指导，不论其如何正确，都不可能把一切情况、一切具体问题、一切工作细节，都作出详尽的规定。这就要求下级机关通过试验取得直接经验，拿出贯彻上级指示的具体措施、意见、办法或细则来。现在不少的单位工作一般化，原因固然各种各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满足于照抄照搬，当“收发室”、“中转站”，缺乏必要的调查、试验。

先进典型是一种榜样，常常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但是，先进典型也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其中有带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有特殊性的东西。它是别人试验的结果，对于本地、本单位来说，仍然是一种间接经验。所以，我们学习和推广典型经验，不仅要研究典型经验的特点和产生的具体条件，还要经过调查、试点，研究在本地区或本单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取得直接经验。如果不经试验，“照葫芦画瓢”，那么，结果只能是走形式，甚至适得其反。我们不能把尚属于试验阶段的東西当成定型的东西，不能把只有在将来才可以推广的东西勉强放到现时去推广。试验、总结、推广，再试验、再总结、再推广，如此循环往复，人们的认识才会一次比一次更丰富，更深刻，才能推动实际工作既有声有色、又扎扎实实地前进。

毛泽东同志曾一再强调：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是

彻底粉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他批评“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①这段话对现在仍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现在，党中央已经为我们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但这条道路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为此，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要提倡试点的方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有机内容，用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邓小平同志说，在体制改革中，要做到方法细密，步骤稳妥，就要先进行试点，“最好先搞一两个部门，有些什么典型经验，有些什么反应，有些什么问题，跟大家见面，这样别的部门进行起来就心中有数，事情好办。”^②陈云同志也指出，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只有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坚持一切通过试验，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才能避免折腾，使工作稳步的有秩序的前进。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54页。

四 抓住中心带动一般

抓住中心带动一般，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而提出的一条重要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这个命题，既包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理，又包含着我们党生动的实际工作经验。今天，我们的四化建设，比革命战争更复杂，学习和掌握这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主要矛盾的理论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都特别注意矛盾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要人们“经常记住主要的东西”，“抓住主要环节”。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原理，并把它应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概括为：抓住中心带动一般。按照这个方法，领导者对一个时期的各方面工作，必须进行综合分析，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即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相区别，集中主要力量抓好那些影响全局的中心工作，带动其他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

的方法。”^①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把上述原理化为领导方法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②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出色地掌握和运用这种领导艺术，正确地提出我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同时，向全党进行抓住中心、带动一般的领导原则的教育，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二）抓住中心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我们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

其次，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局部对于全局是有决定意义的。“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③。所谓中心，在全局中占居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抓住了中心，即抓住了全局和本质。

再次，中心同一般是互相依存的。在实际生活中，中心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6—297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6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0页。

工作由于它反映着全局的本质的要求，因而它总是同时代表着一般工作的要求；中心工作的实现和完成，总要或多或少地为一般工作的开展和进行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任何领导者，由于精力有限，总是不可能同时用相同的力量把各种工作都抓起来。因此在工作的安排上，必然要分出轻重缓急；在力量的投放上，必须分出主次。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领导者只能集中主要的力量把关系全局的中心工作抓好。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抓出成效，才能使工作有层次有节奏地向前发展。

什么时候，以什么为中心，既不凭主观愿望，也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①待到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地指出：生产建设是城市工作的中心，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②，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在同一个大的阶段中，由于矛盾的发展变化，具体的中心任务也在发展变化。比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抗日，但在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的不同阶段，具体的中心任务又有不同。这都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毛泽东同志善于从纷纭复杂的诸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的例证。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2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8页。

（三）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中心和一般的辩证关系

抓住中心带动一般这个领导原则，从理论上说，早已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所接受；然而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看，当前必须切实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从实际出发，忌带主观性。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中心工作即是起着重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工作，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中心应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在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三是对于事物和过程的性质以及发展前途，起着决定的作用。判别什么是中心，必须从实际出发，严格尊重客观事实，切忌主观性。我国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党没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相反却把已经不具有决定意义的矛盾——阶级斗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结果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五十年代后期，我国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实行了“以钢为纲”的方针，即把发展钢铁工业作为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中心。经验表明，这不符合我国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并不是中心和一般、主要和次要、纲和目的关系，坚持钢铁工业“一马当先”，并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工业生产“万马奔腾”的局面。坚持抓住中心带动一般这个领导原则的关键在于把中心抓准。中心抓错了，抓得越紧，对矛盾诸方面的关系造成的混乱就越大，真正的中心所受到的冲击和损害就越大。

第二，集中主要力量于中心，反对平均主义。毛泽东同

志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曾经批评军事平均主义者，所谓“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入”，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没有取得可能取得的重大胜利。在总结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他又指出：“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①对于中心任务，必须集中力量加以解决，绝不能分散地、平均地使用力量。也就是说，工作的中心必须成为力量的重心，这两者的恰当的结合，就是主观能动性与事物矛盾的客观性的正确结合。在实际生活中，有两种抓不住中心的情况。一种是对中心的认识发生了错误，误把次要矛盾当成主要矛盾，把一般工作当成中心工作，因此把力量使错了地方，没有抓住中心。另一种是，虽然对主要矛盾已经有了正确认识，中心已经明确了，但是，力量还没有集中到中心上来，这实际上也是没有真正抓住中心。发生这种情况往往与存在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有关。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心在于调整。但是在一个时期里，调整的步伐不够快，原因就在于有些部门和企业，没有真正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利益出发，没有把力量集中到调整这个中心环节上来。

第三，充分发挥中心对一般的带动作用。这是在坚持抓住中心带动一般的领导原则中不可忽视的课题。我们说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对于次要矛盾、一般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具有推进和带动的作用，只是从可能的意义上讲的。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带动可以不要任何条件就自然地变为现实。实际上为了实现以中心带动一般，领导者必须有意地做许多工作，其中包括深刻认识中心任务和一般工作间的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2页。

内在联系；实现中心任务的过程中，积极为解决其他任务扫清障碍，创造条件；认真总结抓中心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为其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借鉴、指明方向等等。如就一个企业来说，在一般情况下，生产是中心任务，其他如体制改革、挖潜革新、企业改造、科学研究、职工教育、生活福利等任务，都处于服从的地位。要想通过抓好生产这个中心任务，把其他方面的任务带起来，就必须在抓生产的过程中，注意发现企业在供、产、销各个环节上所存在的问题，为体制改革和挖、革、改指出方向；必须在抓生产的过程中，经常注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和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为革新和科研提出课题；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企业积累，有计划地增加教育基金和福利基金。从这些工作中可以看出，带动一般决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自发的实现过程，抓住了中心并不等于就是带动了一般。抓住中心为带动一般提供了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则还需要领导者进行一系列深入的思考和艰苦的工作。

第四，学会“弹钢琴”，反对单打一。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互为前提的。中心与一般的关系亦是如此。中心是对一般而言，没有一般也就无所谓中心。强调要抓住中心，决不是要忽视一般，更不是要取消一般。把中心同一般对立起来，以为抓一般就必须妨碍中心，或者抓中心就完全抛开一般，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时期，曾深刻分析和正确处理革命战争同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离开革命

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或者“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都是错误的^①。他还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②他总结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一就是“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③

我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四化建设，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去冲击一切。但是，对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也必须及时地、正确地加以解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里的重要表现，是今后长期内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把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要么否定经济建设是中心，要么否定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都是不对的。

经验说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是发展变化的，只有在抓住中心的前提下，适当地抓好一般，才能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使非主要矛盾得到及时的正确的解决，不致发展到影响和干扰主要矛盾的地步，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解决主要矛盾创造有利条件。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9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5、123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32页。

五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发展的需要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定的。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的奋斗目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总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到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实事求是，敢于公开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消极因素。建党六十多年来，党在长期斗争中经历种种严峻考验，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也出现过不少失误，然而还是在不断前进，并且变得越来越成熟、坚强，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统风格。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开始，就注意到党内的矛盾和斗争问题。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7页。

的。”①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②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当拿起这个武器。”③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到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高度号召全党认真实行之。他说：“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④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1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0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7页。

批评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把“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由党内扩大到全体人民中间去，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基本方法。

（二）开展批评要有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同志不仅阐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重要公式。这个公式说得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首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否则，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不应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善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当前和今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适用的。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认为党内的不同意见都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使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完全走向了反面，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任何

人违背了它，都要犯极大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拨乱反正，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上述的一贯思想，在一些方面还有所发展。比如，“不可采取一哄而起的围攻，不让本人辩解，也不让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的‘斗争会’方式”；“党内不准用超越党的纪律或违犯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要绝对禁止采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手段解决党内问题”；“严禁所谓揪斗，严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严禁诱供逼供”，等等。《准则》明确指出：

“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这样，就把开展正确的批评与“打棍子”的界限划得更加清楚了。我们反对借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去整人，实行“打棍子”；同样，我们也反对借口防止“打棍子”，而取消甚至反对正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光明磊落，对任何重大原则问题都不回避掩饰，体现了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又处处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体现了振奋革命精神、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要求。在批评错误时，把全面性的错误同局部性的错误加以区别，把党的指导方针的错误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加以区别，不再提路线错误，不硬找阶级根源，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为我们树立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辉典范。

(三) 全党都必须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增强团结，改进工作

当前，党内存在的思想领导上的软弱涣散，一个重要的表现即不能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人甚至不赞成批评、反对批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的“斗、斗、斗”当然是错误的，但完全否认党内斗争也是不对的；把党内斗争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就是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但也不能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就认为党内不再有阶级斗争的反映。要纠正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破坏腐蚀，对于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任何时候都必须批评和斗争。在四化建设中，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判明是非优劣，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是党委会的重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总结了十二条，许多都同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关，比如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在背后议论；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错误意见也要听，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等等。所以，我们不能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局限于犯了错误以后开批评会、写检讨书，而应该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个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的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必不可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273页。

少的武器。现在的问题是，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我们许多革命者，首先是一些领导者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明明是自己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相脱离，自己的设想、主张、意见、著作同革命实践、同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意志不合拍，甚至相抵触，而不愿意改正。明明是情况变化了，历史前进了，却仍坚持过去的主张、作法和经验。这就是所谓思想僵化，僵化到似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要服从他的设想、愿望和意志。从这个角度说，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又是相通的。因此，我们在提倡解放思想的同时，必须运用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的武器，实行自我思想改造。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对这两个方面都要当作一门学问，细心研究。对一个单位或一个同志的发展、进步来说，别人的批评是外因，自我批评是内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的愿望，再讲究政策和方法，也难以使批评发挥效力。但是，当被批评者缺乏自我批评的觉悟，需要通过批评去促进这种觉悟的时候，正确的批评就成为主要环节。所谓正确的批评，不仅指的内容正确，而且包括态度、政策和方法。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并且强调指出：“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是为解决党内矛盾创造必要的条件，而正确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不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党的一切目的都达不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要贯穿整党的全过程。既不能重复过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也不能把正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打棍

子”、“整人”等同起来。要克服“多栽花，少摘刺”的“老好人主义”，对于危害党的利益的行为和言论，都要进行斗争。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达到既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为此，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评要注意政治，注意原则问题，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只要全党同志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经过这次伟大的整党，我们党一定能大大前进一步，领导全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六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精辟地论证了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时，指出了五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①。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他及时提醒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页。

取得胜利。”^①他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②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定地认为，正确的认识只不过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自觉能动性只能建立在正确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因此，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为依据。判定政策之正确与否，不是依人们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政策只有在执行的过程中，在党和群众的实践中，才能证明其是否合用，才能确定其正确或错误的程度，才能得以补充、丰富或修正。毛泽东同志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③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之所以错误，从认识论上说，就是因为其政策不适合中国国情。与此相反，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历史已经证明，这些都是适合中国国情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81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03页。

的，是完全正确的。

他说：“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①

党的政策和策略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②这里所说的“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其中就包括着各种政策问题。比如我们的土地政策，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都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所调整。他批评那些不从实际出发，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同志说：“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

①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1页。

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①

（二）克服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

毛泽东同志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充满活生生的辩证法。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防止和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毛泽东同志说过：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②

克服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这就是说，要把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党的具体路线具体政策作全面的统一的理解，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管全局的，它决定着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应当很好地体现总路线和总政策，并且为它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③

克服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这就是说，要把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纯洁性和执行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策，作全面的统一的理解，既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又不

①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23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1页。

能把它们混为一谈。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既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党内的腐化思想作坚决斗争，又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①

克服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这就是说，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比如，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们从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他们又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尖锐化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时的反帝国主义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如此，党在当时利用欧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利用他们主子之间的矛盾，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生动地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克服策略问题上的片面性，这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②。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要算富裕中农；什么是资本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32页。

家，什么不是资本家，只是小业主；经济建设中什么是冒进，什么是保守，积累率多少才合适，都有其数量界限，必须有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克服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这就是说，要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和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偏向。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①反对党内“左”右两种倾向，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就是说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另一种倾向。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下 篇

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第七章 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 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 想的科学体系

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邓小平同志最早向全党提出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大政治意义的理论课题，是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大搞迷信、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恶果提出来的，是针对华国锋同志坚持推行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提出来的。它是一项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是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关键。在政治上，这是个举世瞩目的十分敏感的问题；在思想上，它又具有广泛群众性，十分复杂。在当时新旧个人崇拜如黑云压城的条件下，这个课题的提出，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同志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政治眼光。而这个问题解决得如此稳妥和成功，更体现了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卓越才能，为全党在新时期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树立了典范，开辟了道路。

一 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正确认识领袖同党、领袖同群众的关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党自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在这方面形成了优良

的传统。刘少奇同志曾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下，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对个人歌功颂德。全国胜利前夕，他提出不以党的领导者的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八大”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但是，我们党毕竟没有能阻止个人崇拜的严重发展，终于酿成十年内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坚持下，我们党才冲破了个人崇拜的严重禁锢，同时顶住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思潮，重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打碎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很大的政治问题，又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正是从理论原则上着手拨乱反正的。这充分表明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态度，表明党中央运用唯物史观于党的领袖、党的政治生活的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解决领袖同党、同群众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列宁专

^① 《邓小平文选》，第40页。

门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但是，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领袖同党的关系成了突出问题，却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解决。在我们党内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形成了崇高威望，正确的爱戴领袖与不正确的突出个人混淆起来了，理论上的偏差被掩盖了。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毛泽东同志逐渐骄傲起来。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毛泽东同志捧为神，搞迷信，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什么“天才”、“一句顶一万句”、“三忠于四无限”，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仍推行“两个凡是”，不仅旧的个人崇拜继续盛行，新的个人崇拜又在发展。邓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精神，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同马恩列斯一样，也有失误，全党应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这才打破禁区，导出思想解放的洪流，使党恢复了生机。此后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全党终于把认识统一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上来。

首先，个人崇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明察秋毫、大救星等讲法，是封建愚味的表现。突出个人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把个人崇拜分成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实际是把崇拜真理和崇拜个人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了。

其次，历史发展规律，人心所向，是第一位的。个人，包括领袖人物，只有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才能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置于历史规律之外。

再次，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我们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①个人的作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69页。

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革命理论的形成，革命事业的胜利，都是集体的智慧和功绩。邓小平同志说：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①

还有，“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②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领袖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说领袖就没有缺点错误，这是违反我们党的根本学说的一种错误看法。领袖同党同阶级应该是一致的，但是领袖犯了错误，也会与党发生矛盾。

此外，要划清对领袖的尊敬和迷信的界限。邓小平同志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③

所有这些理论原则，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列宁早已提出的，但是我们党结合中国的实际，把唯物史观具体化了，而且经过曲折和反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化为全党的深刻认识。这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我们党过去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不尽科学。在批判个人崇拜之后，社会上又出现了夸大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甚至否定他的伟大历史功绩的错误倾向。党中央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

^{①③}《邓小平文选》，第15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39页。

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对于毛泽东同志，“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①

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呢？首先，必须从全局出发，不感情用事。邓小平同志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②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③他郑重告诫全党，感情用事地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④

其次，要进行历史的比较，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来判断历史的功绩。历史证明，“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总战略，他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国革命，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里没有哪一个人的贡献超过他。

①《邓小平文选》，第29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6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4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25页。

“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①

要对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全面考察，不只看一时一事。

“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②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绝对地肯定或否定一切，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问题的原则。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写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切实遵循这个原则对毛泽东同志做了全面的评价，分清主流和支流，既看现象也看本质，既看效果也看动机；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逐个阶段地进行了全面的具体的分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基本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有过曲折，犯过“左”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当时对错误是认真纠正的，错误也不只是毛泽东同志，由中央集体负责。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面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主要责任。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悲剧所在。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不那么一贯了，就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他也制止和纠正了一些具体错误，同时，他还做出了一些重大贡献。如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所以说，毛泽东同

①《邓小平文选》，第138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25页。

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最后，要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不割断历史。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对我们以后的发展很有关系。不弄清，总会有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思想干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三) 坚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分析任何社会历史问题，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自延安整风以来，我党处理历史问题的传统就强调弄清思想，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是按照这些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分析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他批评有人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归结为个人品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领袖人物本身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同他们的功绩必须具备时代和环境的条件一样，他们的缺点错误，也不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的偶然现象。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深刻思考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成为全党的宝贵财富，对于新时期起

^① 《邓小平文选》，第158、325页。

着重要指导作用。

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无论国际或国内，都历史不长，总的说来，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都有待继续探索。即使杰出领袖的认识也不能违背认识规律，不受历史局限。党中央正是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认识和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清除教条化的误解，摆脱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看，列宁在当时没有来得及从制度上解决领袖同党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则使领袖同党的关系的不正常状况明显地发展了，鼓励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这方面理论和实践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党产生了消极影响。党中央正是总结了这一教训，才得出“制度是决定因素”^①的新结论，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课题。

从我们国家的历史看，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以后，我们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致从领导制度到社会关系，都存在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弊端，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提供了条件。党中央正是根据这一新的认识，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把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我们党的经验既有长远适用的，也有已经不适用的。可是我们在伟大胜利面前，把过去一定条件下的成功经验绝对化了，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现在已

^① 《邓小平文选》，第273页。

不能照搬的旧经验，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同主观主义作过长期斗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把端正思想路线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教育全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提出“两个凡是”，认为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否则就是“砍旗”。另一些人又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究竟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是一场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的尖锐的斗争。从理论上说，它涉及毛泽东思想是科学还是“经书”，是否已穷尽真理，辩证法是否要崇拜任何最后的神圣的东西这样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党中央科学地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一）“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产生的，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党内个人崇拜逐渐发展。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同志神化，把毛泽东著作捧为“圣经”，严重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的事业。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华国锋同志却错误地提出了“两个凡是”，即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同志早就同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作过坚决斗争。一九七五年，他刚刚恢复工作，就同“四人帮”针锋相对，指出“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不能割裂^①。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同志在还未出来工作的困难条件下，明确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严肃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②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再指出，“两个凡是”是“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它在政治上，“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组织上，反对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在理论上，“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③

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地、多方面地论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首先，“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6、3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23页。

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①其次，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毛泽东同志的话是针对一定时间、地点、条件讲的，有很多条件是变化的。

“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②他批评“两个凡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做什么事？不需要做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只能遵循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而不能死背和照搬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词句和个别公式。

总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同“两个凡是”是根本对立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它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两个凡是”是错误的方针，是一种形而上学否定毛泽东思想，也是违背历史，违背实事求是的，是又一种形而上学。我们党在同这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中，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39—4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22—1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62—263页。

指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错误。”^①

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首先，邓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②其次，“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③再次，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老一靠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④。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完备的阐述。

首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本质特征作了科学的规定。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255、263、2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6、15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58、32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59、304、325页。

形成和发展都做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就划清了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的界限，划清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篡改的界限。

其次，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指出：“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否认毛泽东思想，就是否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

再次，完整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贯穿在基本内容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深刻地阐明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总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对我们仍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基本精神、根本原则都是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

（三）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我们一定要坚定

地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有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善于针对错误倾向，正确地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我们长期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这段论述不仅向全党提出了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任务，而且科学地阐明了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关系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的正确途径。对待毛泽东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只有坚持，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坚持；坚持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发展是坚持的过程和途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关键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也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我们党之所以强调要在实践中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这是因为只有实践才是理论发展的源泉与动力，理论一旦和实践相脱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丧失了生命力。而只有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得出正确的新结论，从而给毛泽东思想增加新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邓小平同志一再向全党阐明这个道理。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

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决清理了“左”的错误，突破了固定的模式，从中国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确估量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指出科学、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出全面而有系统的改革的指导思想，要求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等等。这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由于条件的变化，实践的发展，经验的积累，认识的深化，党中央把毛泽东思想一些原则进一步完善了、丰富了、发展了；或者继续完成毛泽东同志开始的、但未能完成、或犯过错误的探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形成新的科学认识；或者用符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的科学结论代替某些过时的结论；或者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和《邓小平文选》，记载了我们党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成果。

^① 《邓小平文选》，第165页。

第八章 重新确立并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一项最重大的成果，是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首要标志，也是全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过尖锐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一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 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思想原则。“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从反面告诉我们，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我们这样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党，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会犯错误，甚至会犯严重的错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而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使各项工作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新概括和完善化

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实事求是还是主观主义，

在我们党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的复杂条件下，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同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形成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普及到全党。遵循这条思想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取得伟大的成功。建国以后，党和毛泽东同志继续遵循这条思想路线，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党的领导逐渐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对形势和国情的认识逐渐出现主观主义的偏差，终于导致十年内乱的发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面临严重的拨乱反正任务。邓小平同志率先公开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指出这是基本建设，意义很大。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亲自出面写文章宣传实事求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讨论，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象这样从中央到基层，全党、全国规模的哲学讨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艰巨的斗争，党中央不仅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使之在理论形态上更加臻于完善。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又作了新的、完整的、科学的概括。他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

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①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又明确地把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为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规定下来。

新党章规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统一，突出了实践观点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它是一个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统一的整体。其中的四个基本点各有侧重，又密切联系，互为补充，互相贯通，抽去哪一点，都会偏离党的思想路线，走向唯心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或本本出发，实事求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些年来我们所犯的各种错误，究其原因，都是由于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提出任务和决定工作方针造成的。党中央把一切从实际出发概括到思想路线的内容里面，包含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要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就需要有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从实际出发就可能成为从片面的、孤立的、表面的现象出发，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但是，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把理论当作教条而不当作行动的指南，也谈不上实事求是。因此，我们只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一切从实际

①《邓小平文选》，第242页。

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归根到底，都可以在实事求是中得到体现。所以，我们把党的思想路线简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人们由于受历史条件和个人认识能力的限制，认识难免有局限性，不能穷尽真理，而且常常会发生错误。这种错误和局限性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并在不断的实践中纠正和克服。即使已被实践证明的真理，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充实、丰富和发展。

党中央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是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进行批判的这场伟大政治思想斗争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胡耀邦同志作了更加具体的阐述：“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9页。

（二）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特别明显的表现在提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一个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陈伯达曾经鼓吹“不断革命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林彪宣扬“毛泽东思想就是阶级斗争思想。”粉碎“四人帮”后，有人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高度评价和科学地论证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①

第一，实事求是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这是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得出的基本结论。

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既是马列主义本身提出的理论要求，也是中国革命提出的实践要求。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开始就被人们所认识的。毛泽东同志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指出：幼年的党由于缺乏经验，犯了不少错误。其原因就是缺乏一个一贯的东西，这就是实事求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才找到了这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他深有感触地说，二十年了，才找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建国以后为什么我们能在短期内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在

^①《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路线和政策。而为什么我们会犯“左”的错误，以致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事实说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就发展；反之就受挫折，就失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

“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

第二，实事求是概括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理，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它既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又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对物质的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世界最根本的看法，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所以，**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毛泽东同志指出，“**是**”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又明确提出，**实事求是**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使自己的思想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所以，**实事求是**又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物质世界虽然存在着不依人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109、64页。

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为民造福。毛泽东同志说，“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所以，实事求是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实际出发，就是从社会存在出发，从国情出发，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实事求是还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就是从总体上揭示出实事求是是由上述诸多基本原理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三，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实现这个结合的关键，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经验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实事求是形成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赋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无限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使它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反过来又能能动地指导实践活动，发挥理论的巨大威力，使之万古长青，永葆生机勃勃的活力。

（三）实事求是正确制定和贯彻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

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①这就科学地论证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相互关系。

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根本的思想准则。党的十二大规定:“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试想,如果不实事求是,继续推行“两个凡是”,那就只能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任务。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③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组织路线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④又说:“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⑤这就进一步科学地阐明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三者关系,

①《邓小平文选》,第176页。

②③④⑤《邓小平文选》,第176、178页。

正确的组织路线要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为标准，同时，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如果不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大批革命老干部，甚至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不能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而没有这一系列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政治路线根本不可能确立。

总之，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①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同毛泽东同志当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样，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 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

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紧密结合起来，明确提了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使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变，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先导。

（一）解放思想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发表《反对本本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这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的决议以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人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解放。延安整风是全党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真理标准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表明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实事求是是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实现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揭示出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的内在联系，把二者统一起来。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①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列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和发展。所谓思想解放，不受过时的传统观点和偏见的束缚，无非是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获得自由，获得主动权。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认识客观规律和按客观规律办事，从而获得自由，这才是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离开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不是解放思想而只能是胡思乱想，其结果必然失去自由，受规律的惩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我们也曾提出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但因不尊重客观规律，在实际工作中干了不少蠢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

^①《邓小平文选》，第323页。

也曾出现过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客观规律的自由化思潮。党中央总结了这些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决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蛮干。决不要浮夸，决不要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照客观规律办事。”

（二）打破思想僵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早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方针，并把解放思想同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密切结合起来，作为推动各条战线进行改革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同志反复阐述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①的方针。他说：“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②“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③“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④。“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⑤

^{①②③④⑤}《邓小平文选》，第131、133、334、243页。

把思想解放仅仅理解为纠正“左”的错误，是一种片面性的认识。固守“左”的一套，拒绝新事物，是一种思想僵化或半僵化。搞右的一套，或对右的东西麻木不仁，也是一种思想僵化或半僵化。党中央指出，我们的思想还解放得不够。我们要从形形色色的违反实事求是的陈规旧见、传统的习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要纠正过时的老观念老框子老套子，敢于面对现实去探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闯出新路子，打开新局面。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坚定而有秩序、全面而有系统、有领导有步骤的社会改革。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同任何社会变革一样，也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从认识论上讲，客观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就要求我们的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认识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善于从过去的老框子中解放出来，探索新的知识，提出新的理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没有止境，认识的运动就没有完结。党中央虽然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但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中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因此，解放思想就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方针。只有冲破过时的老框框、老套套的束缚，坚持思想解放的方针，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才能做改革的促进派。

（三）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党中央总结了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根据思想解放的发展规律，提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思想解放排除了障碍，扫清了道路。

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

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①解放思想，只能尊重事实，只能服从真理，决不能迷信盲从，决不让任何反科学的、缺乏客观根据的或过时的条条框框禁锢我们的头脑，束缚人们的手脚。理论无顶峰，科学无禁区。解放思想同“一言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解放思想，必须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发扬民主，允许人们从不同方面探索真理。

解放思想是求得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不断探索真理的过程。在认识过程中，出现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观点，是难以避免的，多属于探索中的一种迷误。真理正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相比较、作斗争中丰富和发展的。把解放思想看作自由放纵，明明错了也批评不得，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这是不正之风，是自由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严格按照解决思想问题的规律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使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伟大历史文献，既是解放思想的伟大成果，又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伟大成果。党中央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批判、克服了“两个凡是”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自由化思潮，从而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达到了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又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集中了全党的意志和智慧。同以往我们党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地进行反右倾的历史教训比较，充分表明了党中央的成熟和善于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

^①《邓小平文选》，第134页。

三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实事求是的本意，就是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的规律性。毛泽东思想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成果。只是自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同志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规律。因此，要求人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是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

（一）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地指出：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和发展了从实际出发和按规律办事的思想。

首先，提出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说：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①这就深刻地说明了客观实际不仅是复杂多样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的，因此从实际出发，不仅要从认识对象存在的空间条件出发，而且要从认识对象变化的时间条件出发。

其次，提出了首先要把“实事”弄清楚，然后才能从中找出它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科学地总结了长时间违背实事求是犯“左”的错误的教训。陈云同志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③李先念同志也指出：“首先要把‘实事’弄清楚，然后才能从中找出它的规律。”^④这就进一步地阐明了“实事”和“求是”的相互关系。

第三，强调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地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⑥一再强调“要自觉地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⑦党

①《邓小平文选》，第122—123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7页。

③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4、122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

⑥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202页。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归根到底是由于根据和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客观规律。

（二）根据客观规律制定指导方针

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着力于探索客观规律，并据此制定路线、政策和方针。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任务，并进行了探索。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原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明确提出，要在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但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原则，忽视了经济规律。邓小平同志指出：由于“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①对于我们党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系统地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规律，正确地揭示了一系列客观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的：“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1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05页。

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党彻底纠正了忽视和违背价值规律的“左”的错误。陈云同志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①赵紫阳同志也强调指出：

“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②“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正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③这些都说明，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遵循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又要运用价值规律，不可片面地肯定一个规律，而否定另一个规律。

党中央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且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不仅搞农、工、商业要注意遵循自然规律，而且把改革干部制度，实行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提到自然规律上来认识，指出：“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大多数老同志毕竟身体弱了，精力差了。为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保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须从现在起，用极大的努力，选拔和培养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④叶剑英同志也指出：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⑤

党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当然不限于经济

①②③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9、1028、1187、872页。

⑤《十二大文件汇编》，第70页。

规律和自然规律，而是包括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根据我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生产和消费等关系的规律，提出了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时，首先要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但又要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原则；根据从不统一到统一，再到不统一，再到新的统一，从不明确到明确，再到明确，再到更明确，这个过程循环往复，逐渐使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思想发展规律，重申了思想文化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根据宗教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完善和丰富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等等。

总之，客观规律和党的指导方针的关系是，规律是客观的，指导方针（路线、方针、政策、决定、计划、措施等）是主观认识；规律是指导方针的基础，指导方针是规律的反映。根据和符合客观规律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同时，要注意规律也是发展变化的，指导方针也要跟着修改和完善，力求使指导方针和客观规律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三）努力做到主观认识和客观规律相符合

历史经验说明，要做到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个辩证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叶剑英同志明确指出：“不但要研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还要研究各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特殊规律；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①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普遍规律存在于特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0页。

殊规律之中，通过特殊规律来表现自己的作用；特殊规律又服从于普遍规律，并对普遍规律发生一定的影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尤其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来说，不论做什么工作，也都要既遵循普遍规律又遵循不同领域、不同时间的特殊规律。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单个规律和诸种规律的关系。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诸种规律的探索和论证说明，一个大事物的发展变化往往有几个规律同时在起作用，各个规律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因此，我们要按规律办事，就不能只认识某一条规律的作用，而要认识诸种规律的作用，正确利用各个规律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纲领的客观依据，就不仅是某一条经济规律，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存在、同时发生作用的多种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确立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自然也就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社会诸种规律的综合要求。因此，我们只有从诸种规律的关系上去理解党的指导方针，才能得到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做到自觉地按规律办事。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客观规律和诸种条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①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在一定条件的基础上才出现才发生作用的。从其结果和人们实践活动的联系上来说，规律的作用又分为有益和有害的两种。因此，我们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116页。

自觉地运用规律，趋利避害，就必须象革命导师那样重视研究历史条件，正确处理好规律和条件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运用规律和尊重规律的关系。多年来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常常是由于把利用规律误解为可以按主观意志办事造成的。为了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必须明确利用规律决不是主观随意地去办事，而是利用规律和规律、规律和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其有利于人们的作用，避免其有害于人们的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学习科学和运用规律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早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就指出：要尊重知识，一再强调干部队伍要知识化。因为科学知识是揭示客观规律的学问，既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规律。不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就不能深刻认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四 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求是的“求”字，就是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去探索事物的内部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素之一。“左”的错误在于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讲主观能动性，把发挥自觉能动性同客观规律对立起来。这是违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发挥人类自觉的能动性作

了科学概括，揭示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内部机制，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理论。

（一）对发挥人类自觉能动性的科学概括

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在敌人比较强大，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毛泽东同志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科学定义深刻地说明，人类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发展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正确的思想、意识，能够指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有效地改造自然和社会，对历史进程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错误的思想、意识，能够引导人们采取错误的行动，阻碍人们有效地改造自然和社会，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因此，人类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首先是能动地认识客观规律，人们对客观规律认识得越正确越深刻，人们的行动就自由，主动权就越大，自觉能动性也就越符合客观实际。中国革命的胜利，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发挥自觉能动性，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制定符合国情的路线和政策，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觉能动性的结果。

在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背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页。

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理论。林彪、“四人帮”则把我们的错误推向极端，提出了“精神因素第一”、“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精神可以代替物质”等谬论，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精神万能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但是，有的人却因此怀凝和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自觉能动性理论的科学价值，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理论是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根源”。有人甚至要批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从“精神万能论”转向了“精神无用论”。

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这个科学概括非常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这个科学概括又非常鲜明地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统一起来，既批判了离开实事求是，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片面性，又批判了把实事求是和发挥自觉能动性对立起来，否定主观能动作用的片面性，全面地论证了我们所要发扬的是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为前提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二）努力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还揭示了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内部机制，指出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能力，提高人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地发扬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人类自觉的能动性，包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动性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人类认识世界的活动，是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取得大量感性材料，经过头脑加工制造，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能动过程。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把理论变为现实，改变物质的存在形态，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动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和基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必须不断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胡耀邦同志指出，党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就是提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他说：

“提高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包括观察的能力，分析的能力，分辨的能力。”^②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就是“提高人们的革命觉悟，也就是坚定和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信念、革命热情、革命干劲、革命的坚韧性。”^③又说：“如果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只讲认识世界，不讲改造世界，不动员群众去实践这个改造，那么，它就是只讲空话了。”^④所谓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就是要我们科学地认识四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既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也要认识自然发展规律，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所谓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就是要我们发扬勇敢善战排除万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

^{②③④}胡耀邦：《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红旗》1983年第1期。

难的精神，善于运用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论述，在更深层次上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结合起来，为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四化建设中，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对人的因素必须作全面的理解。“它不仅包括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还包括人的智慧和才能，包括人对科学文化技术的掌握和运用。”^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有科学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要有人的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无疑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人的自觉能动性还必须包括人的知识构成。掌握现代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三）要大大地振奋革命精神

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除了要有较好的科学文化素质之外，还要有较好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素质，即要有共产主义的理想、革命的干劲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信仰、意志、决心和干劲是认识和运用规律的心理状态，是人的内部意识向行为转化的意识过程，它直接指导和控制着人们的行动。有了好的精神状态，才能认识规律，掌握技术，发挥改造世界的威力。如果思想颓废，精神不振，即使有了现代科学技术，也难以在改造世界中发挥巨大的威力。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必须振奋革命精神。邓小平同志曾重申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论断。他说，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批评精神，大公无

^①杨尚昆：《建设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红旗》1982年第15期。

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的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他号召我们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提高全党同志的信心，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量力而行，又要积极奋斗，既要反对急于求成，也要反对消极情绪，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中央这些论断，都是总结四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把振奋精神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振奋精神在四化建设中的能动作用。

党中央针对一些同志对精神和物质互相关系的错误理解，指出：“精神和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中，批判‘精神万能’的错误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精神对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大体相同的物质条件下，由于人们精神面貌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反对无视客观条件，制订超越实际可能的高指标，勉强去办那些经过努力还办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结合起来，鼓足干劲，知难而进，积极去办好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使各项经济建设事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①这段话全面地论述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科学地评价了振奋精神在实现四化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53页。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十分艰巨而又非常伟大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一项创造性工程。我们的四化建设，是在一个曾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经济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但这同时又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系列困难，遇到许多新的课题，也难免出现失误和挫折。因此，在四化建设中更要求我们把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更要重视革命精神的能动作用。只要我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革命精神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四化建设就一定能够实现。

五 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强调了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尽力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办事，成功地取得了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和反倾向斗争的理论。

（一）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可见，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思想在认识论上的根源。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反对错误倾向问题时，曾经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②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指导方针，也是对建国以来反倾向斗争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建国以后，我们党曾出现只反右不反“左”的偏向，明明“左”了，还不准反“左”，只能反右，结果越反越“左”，直到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长期以来，党内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革资产阶级的命，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就得“不断反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于是造成一种错误的心理状态，似乎越“左”越革命，宁“左”勿右。其实这种区分是不科学的。“左”和右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利于革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纠正了过去那种只准反右、不准反“左”的错误倾向，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两条战线的斗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34、335页。

争，而不是只有一条战线。正如胡乔木同志所指出的：“这两者都是客观存在，都危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对哪一方面采取不承认主义或不干涉政策都不行。而且，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①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存在两条战线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他指出：“在历史大转变的时刻，由于旧思想、旧习惯的严重影响，由于对新事物缺乏经验，加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统统套在“革资产阶级的命就得反右”这样单一的模式里的。

（二）防止在注意一种倾向时忽视另一种倾向

在反倾向斗争中，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倾向斗争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成功地坚持了这条原则。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主观主义地规定思想斗争的任务，抓住一个片面走向极端，就难于发现和反对事实上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大变动时期，在党内、在群众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倾向性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办事，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对“左”和右两种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把相当复杂的思想问题处理得很妥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期间，我们党集中主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08页。

要精力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清理了“左”的错误，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但是，总体上的解决，并不等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影响还没有肃清。因此，必须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和防止新的“左”的思潮。

在我们党批评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情况下，在思想政治领域又出现了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对新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视而不见，任其泛滥。一些同志过去宁“左”勿右，现在又宁右勿“左”。纠

“左”掩盖着右。针对右的倾向，邓小平同志适时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又发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批评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涣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但严肃地批评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指导思想，而且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说过：

“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①此后，邓小平同志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这样既抓住了主要倾向，又没有放过次要问题，有主有次，辩证地处理了两种倾向的关系，避免了主观性和片面性，充分地体现了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科学性和全面性要求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

^①《邓小平文选》，第334页。

反“左”，又反右，并不是折衷主义和不要重点。重点在哪里？要区别不同情况。这里有几种情况：从总体上看，主要倾向可能是“左”，同时也存在着右；从全局来看，可能表现为“左”的倾向，而局部可能表现为右的倾向；或者全局表现为右的倾向，局部表现为“左”的倾向；在一些人身上可能表现为“左”的倾向，在另一些人身上可能表现为右的倾向；在一个人身上，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也会表现出“左”或右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些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必须作出具体的分析，切不可公式化、“一刀切”。

“左”的思想是一种思想枷锁，右的思想也是一种思想枷锁。不论“左”的或右的，都要认真清理，实事求是地清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才能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做到实事求是。

（三）实事求是正确开展两条战线 思想斗争的基本原则

胡耀邦同志《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思想批评和思想斗争上，我们党有两种历史经验：第一，“我们有正确的历史经验，这就是我们树立了并且坚持了三大优良作风，搞理论联系实际，搞密切联系群众，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经验，错误的历史经验。建国以来，其代表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个典型，就是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乱打一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注意正确对待历史经验。不能因为有错误的历史经验，就不敢提出和坚持开展思想斗争，甚至加以抵制和反对；也不能因为提出开展思想斗争，就忘记历史

的教训，重犯历史的错误。

关于如何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毛泽东同志早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给我们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中，重申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讲到解决思想问题的具体方法时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最基本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依据具体情况确定斗争的方针。“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反倾向斗争的思想基础，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有则有，无则无，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有什么倾向，就批评什么倾向，既不能误“左”为右，也不能误右为“左”。中央在总结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教训时指出：“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②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8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97页。

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要判断准确，认清性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①应该把思想领域中不同性质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首先，应当把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思想政治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同反对社会上的敌对行为和破坏活动的斗争区别开来。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是敌我矛盾，不能重犯历史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其次，要把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同两条路线斗争严格区别开来。所谓路线是指党的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指导方针。这和通常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偏离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倾向，是两回事。再次，还应该把“左”右倾错误同一般性的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区别开来，不能把党内的任何错误思想都当作两条战线斗争。总之，对于不同性质的思想问题，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还分不清，要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率地定为敌我矛盾。这样，就既不会放纵危害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又不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

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坚持疏导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象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去做：“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②进行正确的批评教育，特别是开展自我批评，坚持原则性和科学性，乃是我们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唯一有效办法。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对于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对党内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36页。

错误倾向，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注意和讲究方法，要坚持实行疏导的方针。即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入情入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切忌简单粗暴，过火斗争，无限上纲，堵塞压制。同时还反复强调，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指出，对待思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采取激化的办法，要实行“冷处理”。只有遵循这些原则和方法，才能保证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解决思想倾向问题，做到实事求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九章 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又根据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有机的统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基本确立了这条道路的一系列原则。这是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是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辟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正确思想，正确地解决了毛泽东同志虽然提出了探索了但没有解决好的新的历史课题，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149、371—372页。

一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规定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依据

在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是从“本本”、外国的“模式”出发，还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种历史经验的时候，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我国的民主革命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党经过几次失败之后摸清了中国国情，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建国以后，我们党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尽管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走中国式的道路，但是由于并没有真正认清中国国情，犯了“左”的错误。正如赵紫阳同志所指出的：“全国解放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多次跌跤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我国基本的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了解要把我国这样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为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因此在指导方针上老是急于求成，老是犯‘左’的错误。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把指导方针搞端正，我们就能够较好地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就能够使我国的经济协调地、健康地稳步发展，避免再发生大的折腾。”^②“我们讲解放思想，就是要正视中国的国情，破除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③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6页。

②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11—612、624页。

（一）认识国情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出发点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了我国国情，对国情的认识更加客观和全面了。

认识国情首先要从联系上分析国情。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国情的内容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它包括国家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发展、文化源流、民族传统、社会性质和经济状况，等等。国情的各方面、各部分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只有从联系中全面地分析和把握国情，才能够认识国情的本质。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国情的论述是很多的，归纳起来，说明我国国情有如下一些主要的特点。在经济方面：第一，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社会经济负担重；第二，国土大，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可利用的土地少，许多资源开发利用差，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第三，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经济上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底子还很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缺欠和薄弱环节。在政治方面：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民族传统，但科学技术文化不发达。虽然确立了马列主义、毛

^①《邓小平文选》，第150页。

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广泛的影响。由于国际交往增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影响；今后还会增多。

上述分析说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过去由于对这种特殊的国情认识不够，照搬“本本”或外国的“模式”，照搬自己的老经验，老是想迅速取胜，因此，总是犯“左”倾错误。可见，能否认清国情，决定了能否根据国情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找到正确的道路。

我们在纠正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认识不足的时候，有的同志又对现实中国的国情，即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认识不清了。他们从“公式”出发，认为我国现阶段还不是也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党中央严肃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否认、不能修改的。可见，违背辩证法的发展学说，不把现实社会同历史联系起来，只拘泥于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的一般结论甚至加上空想的成分，也是不可能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

我国的历史发展向我们提出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深入研究我国的国情，即研究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我国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矛盾方面，才能从总体上、从相互联结上认识诸矛盾和矛盾诸方面的特点；认识存在于其间的特殊规律，并且进一步认识寓于特殊规律中的普

遍规律。仅仅从“本本”上了解各国搞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而不从我国国情出发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或者仅限于表面地了解我国的特殊情况，而不能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揭示其实质和规律，都不可能规定出顺乎历史潮流、又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这说明认清国情乃是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根本出发点。

（二）从发展上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化，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同时，认识国情还要从发展上分析国情。国情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变化发展的。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发展，明天的更加美好的中国又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国情也有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分析今天的中国国情，既不能割断历史，否认现实，也不能不预见将来。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的革命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而我们大家对昨天的中国，不是懂得太多，而是懂得太少了。我们尤其要研究今天的中国，因为要创造美好的明天，首先要求我们立足于对今天的中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而我们大家对现实中国的国情，对建设社会主义客观规律，不是已经懂得很多，而是懂得太少了。”①

历史的经验说明，从发展上研究国情当然要看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但最重要的是要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及时地确定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一九五六年底，在我国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67、839—840页。

改造的基本胜利，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工作重点应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的八大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今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之后不久便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如实地正确认识我国发展变化了的国情，即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情况，指出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革命变革。随着经济关系的变革，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①这个根据主要矛盾的转化确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根本利益，也完全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67、839—840页。

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现实的中国国情仍然存在着许多社会矛盾。其中经济技术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是决定我国社会其他矛盾存在和发展的，所以它是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都无法解决。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大大地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其他矛盾。因为生产发展了，物质基础雄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①

显然，只有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才能正确认识国情的过去和现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符合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制定出完成革命和建设任务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说，认清主要矛盾的转化乃是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根据。

（三）明确规定符合国情的总任务和基本原则

在确定了工作重点转移之后，接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走什么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②基于上述对国情的主要特点和变化的科学分析，党中央明确地规定了党在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8—1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15页。

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新时期总任务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②又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它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③我们抓住经济建设这项工作，也就抓住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

我们党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摆在首位，丝毫也没有忽视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纲领是包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同时还包括进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纲领。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④

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我们所要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

①《十二大文件汇编》，第14页。

②③《邓小平文选》，第204、21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50页。

条件的。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①

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障。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②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领导核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四化建设的过程就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四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总之，四项基本原则回答的是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实行何种国体、谁来领导、用什么作指导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建国、立国、治国的根本。正因此，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要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152—153、154—155、156—157页。

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①

为了进一步扫清在四化建设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为了进一步贯彻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政治保证。这就是系统地进行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的严重经济犯罪和其它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这四项保证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努力提高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能力，及时有效地清除阻碍和破坏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因素。

二 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心是经济建设。党中央在全面地分析我国多方面多层次有机联系的国民经济整体的基础上，确定了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确立了一条稳定地健康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努力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过几代人坚决的有领导、有计划的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一个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阶段、战略重点和主要原则的既宏伟又完备的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159页。

现代化建设的经济纲领。所有这些，是我们党全面清理和纠正过去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脱离国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左”的错误的产物，是端正思想路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历史和现实经验的结晶。

（一）如实承认我们的经济还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经济

长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指导思想上犯“左”的错误，首先表现在不是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而是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一般结论或外国的现成模式作为出发点，并且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把社会主义社会想象得纯粹又纯粹，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想象得笔直又笔直。这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所强调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学说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如实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基础。我们党的现行经济政策，都是依据的这个现实的基础。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正是根据这种认识，党中央提出，在所有制形式和管理体制上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实行主导与辅助相结合的原则。

在所有制上，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同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在管理体制上，把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既在全体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又在局部上保

证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多样性、灵活性；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总的来说是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要求，统一和多样、主要和次要、主导和辅助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正确体现。

首先，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加按劳分配。然而，面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又发展很不平衡、多层次的状况，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我国现在的多种经济形式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在城乡发展各种形式的公有程度不同的、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保护并积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补充的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此外，还有少数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一种不纯粹的、过渡的形态。同时，在全民和集体经济中，还实行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也是适应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过渡的形态。当然，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并不是主次不分各自发展，而是统一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建设的方向，是任何时候不能动摇的。

我们既反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纯粹又纯粹，也反对混淆事物的质的区别。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区别，不能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允许存在的一切一概说成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行政策允许的，总的说都是适合我国现实情况，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但不能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是我国农村的主要经济形式；在城镇手工业、工业、建筑、运输、商业、服务业等行业中也要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它们都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有的初级的合作式联合形式，基本是个体经济性质，也带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它以其小型多样，便于分散经营，适合小商品生产的特点，有着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增加社会财富，方便群众生活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客观必然性。但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生产仍将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苏联和我国长期计划工作中有一个缺点，就是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没有肯定还必须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而生产不能丰富多采。实践证明，不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管事物的差别性，一味求“统”的作法，结果往往影响了经济高速度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

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

计划为主；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既是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大计划，小自由，大权集中，小权分散，统而不死，活而不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有一个完善过程，有与不同发展程度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低级形态和高级形态的区别。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向前发展的。

（二）分两步走，循序前进，坚持过程和阶段的辩证统一

过去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我们习惯于只看国情的有利方面，从主观愿望出发，企图速胜。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高积累，牺牲比例和效益，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害。速胜既不成，有人又因此悲观，夸大国情的不利方面，怀疑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既彻底纠正了“速胜论”，也坚决批判了“悲观论”，反复指出，中国四个现代化，是必胜的，同时又是长期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拥有多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①

事物的变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一过程又因其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而划分为若干个阶段，阶段的联结构成过程的整体。也就是说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是辩证统一的。党的十二大作出在本世纪内，在经济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224页。

战略步骤上要分两步走的重要决策。两个十年，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后十年加快发展速度，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符合我国当前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的正确的战略步骤，是一个逐步加快发展速度、循序前进的规划，是一个符合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思想在经济建设上的运用和发展。

两个十年，前十年是后十年的准备。在前十年中前五年又是后五年的准备。在前五年中，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退一步才能进两步。”“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①这是经济建设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左”倾错误，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既是宏伟的，又是实事求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所谓“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就是说，生产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浮夸，没有水分。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轨道上来，是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确定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是我们党优良传统作风在经济建设中的发扬。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部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于各部门所处的地位及其本身的状况不同，它们在经济发展中轻重缓急的不同。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定的时期内把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和薄弱的部门作为重点，相对集中力量，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147页。

一种实事求是的有远见的战略，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经济建设中的正确运用。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什么都大办，结果谁也大办不了。党中央提出抓好战略重点，并正确地规定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学为今后二十年内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它既符合当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客观要求，又与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相协调。发展战略重点，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战略重点的突破，又会促进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以战略重点与非战略着点之间是辩证的统一。

（三）既要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又要 继续改善人民生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决定的。在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生产的目的和实现生产目的的手段是统一的。当然，两者也有矛盾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用于建设上多一些，用于直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就少一些，反之也是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寻求一个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的比例，妥善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实践证明，多年来，由于急于求成，对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辩证统一关系处理得不好。片面强调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在基本建设中，又片面强调扩大重工业的建设规模，忽视消费品工业的建设，忽视住宅和城市其他公用设施的建设。结果，经济效益差，人民群众得的实惠少。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城乡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改善。赵紫阳同志在阐述经济建设十条方针中指出：“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①同时，党中央指出：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民收入的分配用于消费方面过多，用于建设方面过少，势必影响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进行，从而使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失去物质基础。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无论如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而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居民购买力增加的幅度要同社会消费与供应增长的幅度相适应，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比重。所有这些，都是客观经济规律。如果违背这些规律，只顾当前生活，不顾生产和建设，在改善生活方面要求过高过急，必然会损害人民和国家的长远的根本利益。”^②

认真贯彻执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原则，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由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分清轻重缓急，进行重点建设，否则，国家的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全局就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展必然受到很大限制。为此，要改变资金过于分散的现象，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建设中的盲目性，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企业利润留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34—1035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35页。

成的比例，鼓励地方、部门、企业把资金用到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上来。借口自主权，搞分散主义，是错误的。

总之，我们正在建设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探索我国经济规律，认识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并没有结束，客观世界不断变化着，社会实践不断进行着，因而我们对于已经形成的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和认识就要不断地深化、丰富和发展。

三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明确地把它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一个创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一）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们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

所谓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是指人类摆脱蒙

昧、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过程，是人类社会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党以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含义：人们“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①这一解释体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历史的统一，既表现人们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连续性以及取得成果的历史继承性，又表明了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改造客观世界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发展水平，是我们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人类社会进步和社会生活发展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从思想建设看，“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②从文化建设看，它“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③这

^{①②③}《十二大文件汇编》，第28—29、33、32页。

两方面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从总体上说，我们对精神文明应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是也不能认为精神文明的每一项具体内容都具有阶级性。即使思想建设方面，也包括了一部分社会公共生活必备的某些思想和行为的准则。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所指出的：“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第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在文明社会里，人们在生产斗争中创造了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科学文化，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了人和人的各种关系，产生了政治、法律、道德等观念。生产实践是两个文明的共同基础。二者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发展，并统一起来。

第二，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原因有三：一是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必须有必要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才能进行生产。如果能有更多的先进的生活资料，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精神食粮的生产；二是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提高，还需要具备必要的物质资料或物质手段。没有一定的和先进的物质手段，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and 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精神生活的改善在人们的整个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显得重要。物质文明的水平多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施部分的水平也就多高。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

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用先进思想意识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会激发人们的社会主义的极大热忱，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但能提高生产率，又能促进生产手段的不断改革；先进的文化教育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的建设人才。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①他严厉批评某些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持异议的人，指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②强调“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③党的负责干部，如果不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④

总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割。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它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发展。为此，我们既要反对认为精神文明可以离开任何物质条件，不受物质条件制约的错误观点，又要反对认为只要物质文明搞好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错误观点。坚持辩证法，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

^{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326—327页。

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在这里，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全面概括，解决了经典作家没有全面回答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继承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正确思想，提出了上述科学论断，从而确立了我们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形成了我们党全面概括社会主义特征的理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

第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之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上层建筑既有政治的又有思想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内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告诉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征的时候，既要研究经济基础，又要研究上层建筑；既要研究政治上层建筑，又要研究思想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各种形式。

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除了表现在消灭了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按劳分配等以外，还表现在高度的精神文明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

^① 《十二大文件汇编》，第29—30页。

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道德标准和法纪观念。这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我国的教育、科学虽然不很发达，但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并且正在大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表现得越来越充分。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好，人们就会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纪律观念，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从而自觉地关心祖国，关心集体，关心政治，关心他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人们就会有较高的文化、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种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社会成员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就会变成改造世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前进的巨大物质力量。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这个进程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当然，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和其它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

广大群众。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解就会陷于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的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有一定基础和条件的。所谓“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超越历史阶段”等等论调是错误的。对此，十二大文件作了深刻的论证：第一，共产主义作为思想体系，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检验，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检验，完全证明了是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真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信仰。第二，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具有的共产主义因素主要表现是：（1）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本身又具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当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有着成熟程度不同的差别。（2）计划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摆脱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这方面，与共产主义阶段有共同的特征。（3）共产主义劳动。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自觉自愿地不讲价钱、不计报酬地劳动和工作的人们，这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共产主义因素。（4）新型的社会关系。雷锋、张海迪等先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自觉献身的精神等等，正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光辉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共产主义人与人关系的雏形。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普遍化、完善化。（5）经济和社会生活管理中的民主。我国社会正在发展起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管理方面的自治性民主，就是共产主义自治据此发展的基础。（6）三大差别的缩小和人的全面发展。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发展，三大差别将逐步缩小。人的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的成长，也完全符合共产主义前进的方向。中央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是为了说明共产主义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景，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共产主义因素的发展、壮大、成熟。总之，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都是为着实现共产主义。

为了正确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中央明确指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三个关系。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最终目标同现阶段的总任务的关系。党中央明确指出，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实现四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使人们既有远大理想，又有具体的

奋斗目标，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努力奋斗。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行动纲领同社会主义现行政策的关系。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穷过渡”错误作法时，强调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定任务、具体目标和符合阶段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都是在统一的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高级阶段的必要准备，高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阶段，才能完成后一个革命阶段。如果把二者混同起来，不从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出发，主观臆断、急于过渡，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行动纲领、政策拿到现在来实行，势必使革命和建设遭受破坏。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执行现阶段各项方针政策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党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现阶段的实践活动。这些政策既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又能把我们的社会继续引向前进；既能使劳动者通过看得见的切身利益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同时又引导他们始终不忘共产主义目标。从总体来说，现阶段在党的政策指导下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共产主义实践，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向共产主义制度发展准备条件所必需的。我们在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既反对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混淆起来，重犯“共产风”的错误，又反对把两个阶段割裂开来，把共产主义实践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丧失共产主义的信心。

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根

本要求是造就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同志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①“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②“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四个方面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革命的理想是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是决定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方面。革命道德是在革命理想支配下调节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革命的纪律既是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的表现，也是实现革命理想、讲究革命道德的保证。文化知识则是革命的理想、道德、纪律赖以形成和实现的重要条件。

四 逐步建设中国式的高度 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确立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使我国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发展到制度化、法律化的新阶段。

（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之一。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新的科学认识，是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220、363页。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彻底清除过去“左”的形而上学观点的结果。

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辩证关系。对于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根本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认识并不正确，片面强调政治统帅经济，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拨乱反正，党中央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是保证。社会主义是一种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的最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新型民主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①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决不能离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不能离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实践。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必备的特点。加强政治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这是我党对唯物史观和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其次，科学地认识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其一，是指我国的国体，即宪法规定的，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彭真同志在作宪法修改草案说明时指出：“草案序言指明，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具体形式。我国有八亿农民，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就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草案总纲现在的规定，确切地反映了我们的国情和阶级状况，也可以防止

^①《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和滥用。”^①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②。民主和专政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只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把民主说成是人道主义的，而把专政说成是非人道主义的，更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生活反复教育我们，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③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民主同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意思，党中央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表明我们党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的深化。

其二，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又是指的政体，指的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发展和完善。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④也就是说，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层建筑方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5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3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61—162页。

面的反映，是与反映阶级对立、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就民主集中制来说，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保障民主得以实现和发展的条件和必然形式，从民主到集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

第三，正确认识民主作为手段和目的的辩证关系。过去我们只讲民主是手段。其实，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它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并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保证，因此，它是一种手段。但它同时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不仅要有富裕文明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要有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既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受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尤其是我们的人民民主是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后创建的，必然遇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的抵制和影响。这就更加需要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明确列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这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

第四，正确处理民主和法制的辩证关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

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既是对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又是对十年内乱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正是根据这一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法制是保卫民主的手段，法制必须以民主为基础，民主有待于法制来保卫。没有社会主义法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而要使社会主义法制彻底生效，又要依靠人民民主的力量。民主对法制来说，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

（二）社会主义民主包含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胡耀邦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②，为我们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新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不应是只限于政治生活领域。只有把民主扩展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真正实现人民对这些领域的民主管理，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全面的实现。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6页。

^② 《十二大文件汇编》，第37页。

只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各项事业中去，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① 党的十二大提出：“民主应当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② 在人民内部运用民主的方法平等地开展讨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 and 相互之间的矛盾，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统一认识和行动，这是走向高度民主的条件与表现。

只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到各项事业中去，才能更好地建立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必然要求在人民内部按照民主的原则，建立各种平等的社会关系，如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一律平等；也必然要求建立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如公民必须履行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国家必须保证公民的正当自由和权利，公民在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以及他人的自由权利，并且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社会利益等等。

扩大民主生活领域，党中央强调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爱国统一战线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5页。

^② 《十二大文件汇编》，第37页。

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①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我们党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既发展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也发展基层组织的民主，即发展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使群众自治更加制度化，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把基层组织的民主看作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加以健全和发展。

（三）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而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又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但是，过去“左”的错误，只讲党领导一切，不讲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忽视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民主的统一。总结了这一历史教训，胡耀邦同志指出：“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③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73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65页。

们党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则。如新宪法作了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所有这些，从理论和实践上，把党的领导同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统一起来了，把党的主张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①上述原则正是这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具体运用。

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上，我们党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不认为党有超越宪法的权力，也反对借口民主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产生和建立起来的，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和处理民主问题。邓小平同志曾一再严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明确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②“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的状态……。”^③同时，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了我们民主建设的教训：“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作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作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④总之，“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

①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161、319、221页。

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①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这种结合，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和发展才有根本的保证。

五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胡耀邦同志进一步对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容作了全面解释。他说：“什么叫独立自主？在我看来，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向本国人民负责，就是要独立自主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选择自己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要独立自主地观察世界大事并决定自己的主张，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决定党内的一切事物，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判断党与党关系中的是非曲直。”^②

（一）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

^①《邓小平文选》，第162页。

^②胡耀邦同志在欢迎印共（马）中央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3年4月25日。

针。”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四化建设新的国际条件作出的重要决策，它反映了我们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新认识。

首先，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正如赵紫阳同志说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交换的扩大，而且已经从国内交换扩展到国际交换。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有这些都是以自己的长处，通过国际间平等互利的交换，补自己的短处，这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一切闭关自守、墨守陈规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一切单纯依赖外力、迷信外国的思想和行为也都是错误的。”^①

其次，当前的国际环境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不想扩大中外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②现在“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取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③所以，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④

但是，“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绝不能损害民族经

①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25页。

②③《邓小平文选》，第122页。

济。”^①这是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辩证关系的第一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必须以全面正确认识和估量我国国情国力为前提，量力而行。陈云同志说：“很明显，这种机器设备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很明显，我们的购买力有限。”^②我国底子薄，每年所增国民收入有限，再加上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十分缺乏，所有这些都制约着我们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制约着我们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的能力。胡耀邦同志曾说：“对外经济关系所包含的问题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无非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或者叫做一个出口，一个进口。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为条件的。”^③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具体地制定了如何善于吸收国外资金、正确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国际劳务合作、大力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正确掌握对外经济援助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第三条原则，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与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④“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⑤而且“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

①《十二大文件汇编》，第27页。

②③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01、1117—1118、60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①党的十二大报告强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决不会因为同我们进行经济技术交流，就改变他们的资本主义本性。”因此，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蚀与社会主义反腐败的斗争也将会长期存在。

（二）坚持爱国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邓小平同志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②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是统一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中

^①《邓小平文选》，第361页。

^②《十二大文件汇编》，第4页。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消灭了我国屈从外国侵略的社会根源，也消灭了我国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曾经饱受外国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决不愿再回到过去的屈辱地位，也决不会把任何其他民族置于我们过去那样的屈辱地位。我们党反复重申：我们永远不称霸！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写入了我们的新党章。

（三）按独立自主原则处理各国党的关系

党的十二大报告规定：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自己坚持独立自主，同时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①邓小平同志说，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独立自主原则在国际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阐述已经说明，独立自主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普遍真理。这是因为，首先，“一个国家革命成功，要靠这个国家本身条件的成熟，要靠这个国家共产党路线和政策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决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强制和包办代替。”^②其次，“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

“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

^① 《邓小平文选》，第279页。

^② 《十二大文件汇编》，第50—51页。

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①第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是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各国党都有长处和短处。”^②最后，实践证明，“强迫别国党的政策为本党本国的政策服务，甚至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那就只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破坏。”^③

总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运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以自力更生为主“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④

①《邓小平文选》，第278—279页。

②③《十二大文件汇编》，第391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61页。

第十章 科学地认识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阐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了出来，肯定这些基本矛盾在运动中不断地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他分析了这些基本矛盾在我国的情况、性质和特点，指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原则和途径。为我们探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问题，提出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但是，后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科学地分析，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政策，成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完成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重要保证。党中央在新时期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一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 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正确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科学地历史地分析了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生产关系的改革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因而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一）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改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理论，领导全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同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废墟上，逐步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巨大成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动体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清除了“左”的错误，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不断地提高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第一，彻底清算了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

生产力”^①。党中央明确指出：所谓批“唯生产力论”是“否认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也就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②劳动生产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动力，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停止了生产，人类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③

第二，坚决纠正了凭主观愿望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科学地认识我国生产力状况，确立了生产稳步发展的方针。

“大跃进”错就错在是根据政治推测和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对经济规律和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很不足，结果，欲速则不达，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党中央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生产力是多层次的，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说比较落后，企图速胜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④“树立长期建设的战略思想，实事求是，讲求实效，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努力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⑤

第三，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者。

①②③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223、1006、1041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23页。

我党逐步地纠正了在我国长期存在的轻视科学技术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①又说：“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么，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②

第四，重视劳动者在生产力中的决定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过去许多年，由于官僚主义的存在和民主制度不健全，以及不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等等弊病，损害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不断地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是提高生产力的根本性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我们党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解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切实加强在职职工的文化科技教育，实行全员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职工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工资、修建住房、扩大福利等等，切实改善广大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成为企业的主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83、86—87页。

人。这就不断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切实地提高了生产力。

第五，纠正只讲外延扩大再生产、忽视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片面性，把“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①列为经济建设十条方针之一。赵紫阳同志指出：“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②他还说：“中国这么大，光靠建设少数现代化的新厂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搞清楚。老厂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它们是汪洋大海。如果汪洋大海的面貌不改变，老是处在落后状态，整个技术经济指标就无法达到先进的水平。”^③

（二）根据生产力的状况改革生产关系

毛泽东同志运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这一原理，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时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应该切实地巩固和发展那些“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部分，适时地改革那些“和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部分。在进行生产关系改革时，既不能主观臆断、随心所欲，也不能无所作为、因循守旧。由于从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党离开生产力发展水

①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17页。

③赵紫阳：《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7日。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平，不停顿地改革生产关系，急于过渡，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绝对化，结果事与愿违，越改革，生产关系同现实生产力越矛盾，因此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了“左”的错误，从现实生产力水平出发，在生产关系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三个方面进行了必要的改革。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所有制上，彻底纠正了过去长期以来一味地追求“一大二公”的错误作法，同时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成果，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我国的生产力既然是多层次的落后的，那么，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是多种形式的，而决不应该是单一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第二，在管理体制上，坚决克服只强调集中统一的片面性观点，强调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积极推行各种形式

的经济责任制。邓小平同志说：“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①

第三，在分配原则上，反对平均主义，同时批评“向钱看”的错误倾向，认真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新宪法修改草案再次把它肯定下来。按劳分配是同各尽所能相联系的，实行按劳分配，应当从思想上要求劳动者并且从物质上鼓励劳动者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从社会方面来说，劳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既要使劳动者按照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应得的报酬，又要为劳动者发展他们的才能尽可能地创造条件。”②这样就把坚持思想和物质利益原则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为了全面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③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当一些人由于“左”的影响对党放宽政策表示疑虑

①③《邓小平文选》，第142页。

②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新华月报》1982年第12期，第24页。

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他又说：“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也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会巩固起来。”^①这段话非常深刻地说明只有根据生产力水平变革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三）自觉地做改革的促进派

我们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目的是要克服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和缺陷，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使它的各项具体制度日益健全和成熟起来，把生产力较快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创造出更多的新财富，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这种改革和以前脱离生产力状况的改革是不同的。应该深刻认识和积极拥护这种正确的改革。

为了提高人们对于生产关系改革的认识，根据实际情况，应该划清三条界限：一是前进与倒退的界限；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三是革命与保守的界限。

我们的改革是前进还是倒退，它的界限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0页。

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几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我们的生产关系的各项改革，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初步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使国家逐步兴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这怎么能说是倒退了呢？有些人一看到我们恢复了个体经济而不再追求“一大二公”了，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不再吃“大锅饭”了，引进了外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不再闭关自守了，等等，于是就大惊小怪，说什么“倒退”了。其实，恰恰是这些措施，才使我国的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因而才有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农业“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广大农民多年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过。”^①难道我们可以闭眼不看现实，还搞过去“左”的那一套吗？实在是不能了。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诚然，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标志的，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还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且任何一个社会的性质主要是看何种经济成分居于主导地位。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基本的、主要的经济形式，个体经济仅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而且仅占很小一部分。所以我国的社会性质当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我们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有人以反对“政策多变”为理由，否定当前的改革。我们过去的确变得太多了，违背了客观规律。这就造成了有些人现在一看到政策上的调整就反感，而不去具体分析某些政

^① 《十二大文件汇编》，第11页。

策的调整是否对发展生产有利。其实这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发展和变化着。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根本问题上没有变嘛。当然小的、个别的地方我们有变动。……我们的思想是随着新情况的发展而发展嘛，不加分析地说什么‘多变’是不对的。”^①所以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笼统地反对变，而应该具体分析应该不应该变和如何变。该变不变就是保守，不该变而硬变就是冒进。大量事实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是非改不可的，而且也是改得好的。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举起双手来欢迎改革，并做改革的促进派！

二 正确认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性的科学分析。在正确认识 and 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同时，也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实际情况。据此，提出了把改革作为我们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使改革贯穿于四化建设的全程，推动我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一）科学认识我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地指出：“……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82页。

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①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认真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二者之间的矛盾状况,得出了许多科学论断,为正确实行上层建筑的改革,提供了依据。邓小平同志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著述,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决策作用。

第一,解放思想,为实行全面改革奠定思想基础。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思想路线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又居于核心地位。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上层建筑其他形式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影响。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详细地分析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们干部思想上的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不符合我国经济基础要求的一大弊端,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尖锐的矛盾。邓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2—405页。

小平同志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①可见，解放思想是解决领导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一个关键。我们党正是抓住并解决了这个关键，才为开创大好局面，实行全面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揭露我国现行各种具体制度的弊端，指明了上层建筑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②他具体分析领导制度方面的种种弊端，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③邓小平同志的分析既是尖锐深刻的，又同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左”倾错误观点有原则区别。

邓小平同志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对制度和思想作风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

^①《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②③}《邓小平文选》，第287页。

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①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这就充分说明制度方面的上层建筑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它是我们党积几十年经验得出的新认识。

第三，对产生弊端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党中央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弊端，对这些弊端发生、存在的历史原因、社会条件等进行了全面剖析。一是旧社会的历史陈迹在新社会中的反映。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旧社会的历史基地上刚刚建立起来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和小生产的传统习惯，仍然残存着。由于思想、习惯具有相对独立性、保守性，它不但不可能随着旧制度被推翻而立即消失，而且不可避免地侵袭到新社会的各种制度中来。邓小平同志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③“我们进行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④二是在向外国学习社会主义经验时，不适当地搬用一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实践证明，我们的改革必须从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287、293、29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59页。

我国实际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各项制度。三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制度即使是正确的，也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而历史在前进，如果把过去的制度不加改革地沿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许多弊端。四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规律、原则的体制和制度。还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影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渗透和侵蚀等等原因，在我国上层建筑领域里，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改革实践，加以消除，为新思想、新习惯、新制度所取代。

（二）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实践

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任务，是十分繁重而复杂的。党中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规定了新时期改革的方向、道路和当前的重点。

第一，上层建筑改革的方向要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为此在改革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本国与外国的关系。学习外国经验，一定要从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吸收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经验，形成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绝对不要盲目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在管理体制、计划方法、机构设施、规章制度上接受了外国模式的影响。实践证明，它不适合我国国情，有害于我们事业的发展。这是我们必须记取历史教训而应加以改革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上的有益经验也要批判的吸收，至于资本主义那套腐朽的东西，必须坚决地抵制。二

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一定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前进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过时的结论，某些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要求的陈规旧律，老框框、老作风、老观点，都应当实行改革，敢于抛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发展新理论。三是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的关系。我们要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主要特色概括地说，经济上是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上是高度民主的，在社会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上是高度文明的。我们要按照这些特色的要求实行有特点的改革。四是群众与领导的关系。改革从来都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每一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事物、新体制、新经验都是由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因此，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领导者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改革潮流的发展。

党的十二大确定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纲领，同时也制定了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完备纲领。党的总任务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党的建设就是上层建筑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二，国家领导体制和机构的改革，是当前我国上层建筑改革的中心内容和重点。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了在当前改革中主要解决：（1）权力过分集中；（2）兼职、副职过多；（3）党政不分；（4）新老干部交替等四个问题。从而实现三项要求：（1）经济上，迅速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2）政治上，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组织上,解决现代化建设人才问题。他又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中,分析了目前党和政府机构中存在的“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的缺陷,指出不搞这场革命,“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可能要亡党亡国”。中央和许多省市经过改革之后,机构臃肿、领导班子老化和人浮于事的状况有很大改变,进一步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就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

第三,改革干部制度,实行新老干部合作交替,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社会主义国家极为关心寻求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定的科学回答。但在其晚年实践中有失误,未能把事情办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解决新老干部合作交替的问题,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策,提到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多次用自然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论证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意义,及时地提出了“新老干部合作交替”的方针,提出改革干部制度的迫切任务。既要发挥老干部传帮带的作用,又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的优秀干部;既要保持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生机,又要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有许多创见。邓小平同志说:“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①中央强调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党提出了干部标准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改革方针,要求各级领导班子选贤任能,组织结构、知识结构和

^①《邓小平文选》,第320页。

年龄结构合理,建立后备干部制度,形成梯形结构,从现在开始,就培养选拔第三梯队,实行退休、离休、职务任期制度,设立顾问委员会,依靠集体搞好交接班等。总之,改革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是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 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他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①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的第一项。胡耀邦同志说,这应该成为我们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党中央反复论证了这一指导思想。首先,论证了改革的理论观点:在我们的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注意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协调地向前发展,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协调地向前发展。这就需要改革。其次,指明了改革的社会性质:进行这种改革,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陈旧、过时、落后的环节,建立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相协调的新体制、新章法,使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先进。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来说,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破旧创新的深刻革命。但是,这种革命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与推翻剥削制度的革命不同,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不需要打碎现在的经

^① 《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济、政治制度，不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制造激烈的震荡，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基础上实行自我改进、自我完善的历史进程，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力量，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的。再次，明确了改革的目的：要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更多的新财富。最后，制定了改革的总方针：这就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经过试验，分期分批，循序渐进。社会主义不可能天生的完满无缺，它必须逐步成熟和完善。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社会矛盾发展观看待它。正确的改革活动，是保证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自身矛盾、走向完善、进步的基本手段和必然形式。赵紫阳同志指出：“这种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它当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不是要动摇、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①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和始终把握住改革的性质和目的。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异化”，并且用克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和指导我们的改革。这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它不仅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同旧社会残余进行斗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确认识和进行当前的改革，而只会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指导改革活动。

邓小平同志说，对“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应该抱有必胜的信心。”“第一条决心要

^①赵紫阳：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①这就要求我们敢于改革，善于改革。要把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三 正确认识和 处理 我国 社会现阶段的阶级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特点和规律，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现实阶级斗争状况的基础上，制定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关于现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方针，彻底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

（一）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

对于我国社会各阶级现状的科学认知，是正确对待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前提，也是制定党的战略、策略的客观依据。由于我们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曾经否定党的八大提出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关于我国阶级状况的估计，主观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肯定党的八大的正确认识，作出了更完整的科学论断。

在我国，阶级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土地改革的进行，到一九五二年，我国就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把土地分配给广大农民；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对农业、手

^① 《邓小平文选》，第352—353页。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基本完成。这个历史过程取得的革命成果，就是在我国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他们这些阶级的成员，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劳动改造，其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加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做出了新的历史贡献，不愧为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阶级，不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

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战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已经摆脱了阶级剥削和压迫，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从具有自发倾向的小私有者变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合作经济的劳动者。他们的命运已跟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命运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广大知识分子同亿万工人、农民一样，被组织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积极从事社会主义的劳动。他们除了劳动方式上与工人、农民有差别外，从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和为人民服务来说，同工人、农民是一样的。同时，我国现有知识分子队伍的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因此，党中央明确指出，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是不符合实际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

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

这就是我国现在的阶级关系的基本状况。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结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历史经验，纠正了错误的理论观点，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它标志我们党和国家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同时也说明我们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阶级是个经济范畴，从政治思想上划阶级，否认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事实是错误的。在我国现阶段，否认阶级差别，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也是错误的。

（二）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

首先，论证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内容和范围。党中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②

“现在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地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③敌对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1）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他们之中既有旧社会残存下来的，也有新生的或外部派遣来的；（2）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分子；（3）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他

^① 《邓小平文选》，第171—172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41页。

^③ 《十二大文件汇编》，第34页。

们是社会上刑事犯罪中的一小部分，其罪恶活动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反社会行为；而是以破坏我国社会政治的安定团结、生产和生活秩序为目的；（4）进行贪污盗窃、投机诈骗、走私贩私的新剥削分子。他们采取非法手段，侵占社会劳动成果，以特殊的形式进行剥削活动；（5）极少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旧剥削分子。他们之中有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动资本家。这些敌对分子利用国内外某些有利于他们的条件或机会，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各种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是敌我矛盾，仍然属于阶级斗争。

其次，论证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阶级斗争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其原因不仅在于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清除干净，而且因为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是就大陆而言；在我国的台湾和港澳地区，还有完整的剥削阶级存在。台湾等地区还向祖国大陆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另外，阶级斗争是一种国内外相联系的国际现象。我们国家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颠覆、侵蚀和渗透。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种阶级斗争就会存在。因为我国的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成员以及我们的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根本杜绝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

第三，论证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相比较，有着不同的特点。

它不是原来那种完整形态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搏斗，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① 这是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根本特点。因为在我国大陆上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敌对分子也就失去了以往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那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基础，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面前，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破坏行为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更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他们必将逐渐削弱。

这种阶级斗争的领域是广泛的，不要把“一定范围”的概念，误解为“一定领域”。因为阶级斗争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存在的，在这些领域中都有敌对分子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只是从总体上看，在各个领域里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不占主导地位罢了。

对于这种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必须作具体分析。比如在政治领域，一九七九年社会上有人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形成非法组织，煽动闹事，制造恶性案件。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这一切现象，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这种情况，有的属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有的属于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反扑，有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者的破坏，有的属于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故态复萌，有的是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② 当前，经济

^① 《邓小平文选》，第15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29页。

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进行这种犯罪活动的罪犯，除了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外，还有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极少数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腐化变质分子。他们在经济领域里严重地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扰乱社会安定，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①

当前，在一些地方，刑事犯罪活动猖獗。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新生的社会渣滓，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里的对敌斗争。

文化领域中也存在同类的破坏活动。资产阶级思潮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形成有组织的破坏力量。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必须依法取缔。我们党坚持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象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这是从思想上腐蚀我们，松懈我们的斗志，瓦解我们的信仰，搞乱我们的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我们不坚持同这些东西作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②

党的十二大报告在分析敌对分子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破坏活动时指出：“我们决不能把这些活动仅仅看成是一般的犯罪，一般的反社会行为，它们是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③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29、357—358、328页。

③《十二大文件汇编》，第46页。

（三）制定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基本方针

党的十二大报告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这就是党中央关于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方针。

第一，“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① 剥削阶级的消灭和阶级斗争的消亡不是一回事，两者在消亡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认为阶级斗争存在，就一定存在剥削阶级，必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为剥削阶级既不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必定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同时，也注意防止和纠正认为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有的同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了，企图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取代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②

第二，要坚持两手。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搞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只注意后一手而怀疑前一手是错误的，只强调前一手而忽视后一手是危险的，对这样的方针，全党同志必须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4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68页。

十分明确，不应当有丝毫含糊。”邓小平同志说：“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外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能保卫从而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①。

第三，今后打击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严格地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充分运用法律的武器同他们进行斗争。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处理的新课题。”^② 否认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认为我国的法律只有社会性没有阶级性，甚至主张绝对的言论自由，是错误的。

第四，正确认识和处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我国社会的诸种矛盾中，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这也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如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观察和处理。如否认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我们党明确指出，这是一股资产阶级思潮，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关于精神污染，我们党也明确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155、330—331页。

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黄色书也好，黑色书也好，都要坚决反对。认为在我国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也就不存在了，阶级观点就没有用了，是不对的。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它与敌我矛盾有原则区别。人民内部矛盾要靠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决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无限上纲。

第五，阶级斗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行。目的是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的胜利完成。

四 重新确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着重地全面地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题目。但是，毛泽东同志后来并没有在实践中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确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善并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

验，实事求是地考察了当前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分析了两类社会矛盾存在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作了科学的概括和表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与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在我国，随着阶级斗争由主要矛盾变为非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两类社会矛盾中也由过去的非主要地位变成主要地位。这一根本变化，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是符合我国剥削阶级已不存在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现象。“左”倾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硬是把阶级斗争当成了永恒的主题。结果，一方面人民内部矛盾成堆了、激化了，另一方面人为地制造敌我矛盾，国家混乱，人民受难。这是客观规律的惩罚，历史的教训。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

针，是错误的。”重新确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中央明确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坚决地真正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人民起来干革命，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不断改善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而这一根本目的，只有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可能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有具体历史内容的，随着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政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由主要是阶级斗争，变成主要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以，社会上的主要矛盾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是统一的。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奠定物质基础。

（二）运用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安定团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重新确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同时，并运用这个理论正确地解决了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两类矛盾的学说。

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既是拨乱反正的关键，又是安定团结的关键。党中央严格地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区别

开来，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般错误的干部同“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区别开来，既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还团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

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斗争，是在复杂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党内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有步骤地、全面而稳定地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解决了问题，既很快地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徘徊局面，坚决清理党内长时间的“左”倾错误，又团结教育了全党，是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光辉范例。

党中央以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等于是全党、全国范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再教育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众性实践。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明辨是非，消除积怨，密切了党群关系，又有利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中央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纠正了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看法和政策，实行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大大地密切了党与农民、知识分子的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如此等等，党中央把毛泽东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同新的历史时期的实践结合起来，同广大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邓小平同志说：“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①“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②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实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才能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制定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

首先，严格区分人民和敌人的界限。什么是人民？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新宪法规定，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广泛得多，不只是某一个或几个阶级，而是包括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什么是敌人？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以后，专政的对象已经不是完整的反动阶级，人数也大为减少。”“依照宪法和法律，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犯罪分子，都属于国家的专政职能。”新宪法规定：“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这就是说，一方面，国内还有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对他们必须实行专政，这是敌我矛盾。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次，要在迅速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220—221、215页。

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内部矛盾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不同观点的争论，很重要的是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还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需要，以及在经济方面还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所以，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根本的途径在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此，党中央纠正了“左”倾错误只顾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偏向，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包括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和各部分人民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不同的具体经济利益的矛盾。如两种公有制之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之间、集体所有制各单位之间、公有经济同其他经济形式之间的矛盾，还有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矛盾，生产和流通的矛盾，农、轻、重内部和它们之间的矛盾等等。对此，党中央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政策。

第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国家主人翁作用。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使民主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公式。这个方法也就是民主的方法。如果说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

途径，那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大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①要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战略意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靠政策，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的不同的经济利益。但是，因此就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只要有了正确的政策，一切矛盾就解决了，这是不对的。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从而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奠定思想基础。

在思想文化工作战线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②同时，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③把“双百”方针曲解为自由化方针，把批评曲解为干涉，是不对的。

第五，在民族、宗教、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制定正确的政策。中央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26、185、347页。

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①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意识、民族心理仍将长期起作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破坏固然必须警惕，但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宗教习俗的差别，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搞好民族工作，重点还是把经济搞上去。在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巩固各民族的团结统一。

中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灭”，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②因此，认为宗教很快就会消亡的想法，和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消灭宗教的想法，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③。

在我国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之后，统一战线内部的社会主义一致性空前增强，中国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④

第六，党内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基于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党中央指出党内必须经常地、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

^{①②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79、1220—1221、1222页。

^④邓颖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

我批评，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及时地清除危害党的分子和腐化变质分子，以保持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应当肯定，党内仍然有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斗争，但不能把党内一切斗争，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解决党内斗争问题上，严禁所谓揪斗，严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严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不让本人辩解，也不让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的“斗争会”方式，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今后原则上不再使用“路线斗争”、“路线错误”一类提法，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党内不同意见，包括正确与错误观点的分歧，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人们主观认识的差别性造成的，是认识过程中的矛盾，客观世界是多样性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人类空前伟大的事业中，谁也难免犯错误。不能一犯错误就无限上纲，全盘否定，一批评就打倒。

第十一章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新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战斗力，坚决实现以下三项要求：第一，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党中央在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解决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正确处理了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一 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同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阶级和政党相互关系的原理，一贯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正确而又坚强的领导，看作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①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4页。

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①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一些人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的严重时刻，一再重申在四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论述了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实际措施，坚持和改善了党的领导，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在四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在四化建设中，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一些人头脑中曾经产生过怀疑和动摇。邓小平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从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以及党的自身发展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

针对着一部分人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②这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自从中国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许多仁人志士和革命党派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可是都没有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与广大群众建立了血肉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43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30页。

相连的关系，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发自肺腑的赞语，也是全部中国近代史得出来的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用这个历史的结论，从根本上澄清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乱，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有少数青年缺乏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欣赏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指出，那种多党制并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也是人们没有共同理想的反映。“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①，从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多党制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我们国家废除了剥削制度，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的理想，所以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不需要也不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我们国家也有许多民主党派，但是，它们都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②

还有一些人看见我们党犯过错误，特别是犯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就对党的领导产生了怀疑，似乎觉得

①《邓小平文选》，第23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32页。

党就没有资格领导了。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批评了这种看法。他多次说过,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有错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世界上任何政党同任何个人一样,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在于对待错误的态度。尽管我们党犯过错误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是在党的六十多年的历史中,这些错误同党对人民的贡献相比终究是第二位的。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党变得更加成熟起来。这正是我们党有力量、有希望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是错误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不能容许的。

针对着“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多次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建国、立国、治国之本。他还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个有机整体,它犹如四根擎天大柱,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都会造成思想混乱、政局动荡,危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①在我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保证。

(二) 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辩证统一的

党中央在充分肯定四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还根据我们党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230页。

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①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三个方面。他从党的组织状况和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论述了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邓小平同志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对我们党的组织状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我们党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为恢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和斗争。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得到了初步整顿，党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健康力量在党内已占强大优势。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党的领导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也为改善党的领导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邓小平同志并不讳言我们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一再提出要整顿，要整风，要整党。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损害极大，他们一方面残酷打击、迫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另一方面又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使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新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有些老党员虽然在过去长期中很合格，但现在也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也不那么合格了。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但是派性高于党性的人还大有人在。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有些党员干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路线和政策还不够理解，有的阳奉阴违，有的顶着不办。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中，有的党员干部对资本主义腐

^①《邓小平文选》，第232页。

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及侵蚀失去了抵制能力，有些党员对违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熟视无睹，有的甚至公然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不信任情绪。如果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和发展，就会毁坏我们的党，毁坏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加强党的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整顿，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就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邓小平同志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论证了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的政党只有不断地改善自己的领导思想、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才能适应完成新时期历史任务的需要。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说：“刚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现在面临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认真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更迫切更严重了。”^① 四化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工程，要求全党必须随着历史任务的转变，实现思想上的伟大转变。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要求党必须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国情的路线和政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以便提高全党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同时，四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还要求我们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改善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既要看到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到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233页。

性和迫切性同时也要明确改善党的领导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要摆脱和削弱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说，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第二要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是改善的前提，改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如果离开坚持这一目标去谈论什么“改善”，就必然会走到背离党的领导的邪路上去。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必须反对，就在于它抹煞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政党的本质区别，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政党的面貌来“改善”我们的社会、

“改善”我们的党，从而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如果不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就不能实现党对四化建设的坚强领导，四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就难以完成。所以，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坚持和加强党对四化事业的领导。

（三）整党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大措施

用整风的方法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整党经验，不但有以思想建设为主的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而且有自延安整风以来形成的一整套的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党的整顿和建设，总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系的。在新的历史时期

里,为了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党的整顿和建设。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①又说:“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②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根据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和所面临的新的情况,对整党的基本方针、任务、政策和方法都作了明确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以思想建设为主的优良传统和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党的建设的光辉体现。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实事求是地分析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论述了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制定了一系列整党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它在分析党的状况时,即尖锐指出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上严重不纯的问题,又充分肯定党的主流是纯洁的,健康力量在党内占强大优势,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它确定整党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四项基本任务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这是搞好全面整党的思想基础,是搞好整党的首要任务,不解决统一思想问题,整党的其他三项任务也将成为一句空话。整顿作风,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

^① 《邓小平文选》,第16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30页。

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说到底解决党群关系，消除腐败因素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得不到正确的贯彻执行。加强纪律，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这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保证。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特别是“三种人”清除出党。这是从根本上消除最危险的因素，解决党的下一代由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也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组织保证。只有全面完成上述四项基本任务，才能实现整党的总的目的要求，整党才能不走过场。

这次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在整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加强思想教育，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我们党对搞好这次整党下了最大决心，既不允许走过场，把严肃的整党变成什么问题也不解决的表面文章，也不允许重犯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整党的基本方针是：既要坚决积极地解决问题，全面完成整党的任务，实现整党的总的目的和要求；又要审慎稳妥，不要搞乱，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强调必须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开除出党的同时，规定对开除党籍的人要给出路，鼓励他们认真改造自己；在强调清理“三种人”重要性的同时，指出确定是否“三种人”要严肃慎重，要对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表现作历史分析；在强调不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

党的一切目的都达不到的同时，指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要严格遵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既要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群众路线是整党的最基本的工作路线，既要充分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又不要重犯过去“群众整党”的错误。党中央还提出整党和生产、工作两不误，整党要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发展，以及边整边改，使群众见到整党实效的方针等等，这一切都生动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总之，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的经验，同时还总结了多年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执政党建设上的光辉运用，是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而采取的重大步骤，是完成十二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根本保证。通过这次整党，我们党必将获得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一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二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 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

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①。“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②只是自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逐渐不谨慎了。“大跃进”被称之为大搞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名为直接依靠群众，实际却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致使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用严重起来。因此，党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党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对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起到了保证作用。

（一）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③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群众，违背了群众路线，损害甚至导致破坏党的领导。因此，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根本组织路线、根本领导方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对群众路线所作的更为完整而

①《刘少奇选集》，第348、34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27页。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34页。

科学的新概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体现了我们建党的唯一宗旨和根本立场，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纲领和政策，正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党在领导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①显然，群众路线是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路线，是党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路线。所以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辩证法和历史观统一起来，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中，具体化为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教导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要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必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即建立在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要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又必须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即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唯有这样做才能实行党的正确领导。所以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建国以来，我们的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运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际上却程度不同地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至于“文化大革命”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更是根本背离群众路线所导致的一个恶果。可见，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方法的意义

^① 《十二大文件汇编》，第82页。

来说，只有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才能改善和坚持党的领导。

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活动同广大人民的利害得失关系极大，而这种地位又很容易使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去保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切实加强党同各阶层人民的密切联系。”《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正是由于在实际行动中表明具有大公无私的品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得到了人民的衷心爱戴和信赖，才不断地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必须为群众谋利益，争取群众，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充分支持，才站得住脚，才不会失败，这是比较容易为我们的同志理解的。但是，当我们党长期领导了全国政权以后，相当一部分同志对这种必要性的认识，在思想上就不那么清醒了。他们不懂得，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正是因为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党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党如果脱离了群众而不坚决改正，就必然会由于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失败。”现在，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不是正确地运用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或为自己周围的一些人谋取私利。还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困难甚至是灾难。这正是这次整党边

整边改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可见，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防止党由于脱离群众而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失败，必须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

只有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党才能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完成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任务。”^①因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及其伟大胜利，无一不是实行群众路线的杰出成果。党的十二大已经制定出代表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只要我们党继续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必定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努力完成伟大的战略任务，从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这个意义上来说，为着胜利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

总之，我们党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说明，坚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01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34—835页。

和发展群众路线，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保证。

（二）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

首先，科学地阐明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的最本质的内容是群众路线。胡耀邦同志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人民中，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是少数，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并且接受人民的监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就会遭到失败。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①这深刻地阐明了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的最本质的内容，也可以说群众路线的最本质的内容，一是在政治上保证人民群众有民主权利，二是在经济上保障人民群众有物质利益。我们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高度的物质文明，正是为着实现这个根本的目标。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保证人民群众有当家作主的觉悟和本领。

其次，划清群众路线和群众自发性的界限。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65页。

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①这就十分深刻地阐明了，我们所讲的群众路线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决不是取消党的领导，闹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路线。任何把党的领导同群众路线对立起来的倾向，都是错误的。

第三，把群众路线和大搞群众运动区别开来。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②党中央还指出，经济建设，民主和法制建设，也不能大搞群众运动，不能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作法。这就是说，实行群众路线，应该根据情况和任务的变化，争取不同的形式。群众运动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具体形式，因而不能任意到处搬用。

（三）把群众路线制度化、普遍化、经常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把群众路线制度化、普遍化、经常化。这也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新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① 《邓小平文选》，第156—15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96页。

内活动”。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①党的各级组织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充分地体现了党是人民的一部分，是最有觉悟的一部分，在法律面前是和人民群众完全平等的。

第二，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把这一条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②这是既承认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又承认党的领袖个人的历史作用。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能有两种：当我们按照历史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的时候，就可以多多少少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背离人民群众的意志，就要多多少少延缓或阻挠历史的前进。”^③因此，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不能对党的领袖搞个人崇拜，而党的领袖则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第三，新党章明确规定：“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员八条义务之一。规定党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并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提高觉悟，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新党章还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①②《十二大文件汇编》，第39、89页。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61页。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要时时事事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第四，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把“具有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反对官僚主义”规定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有针对性地专列了“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一节，尖锐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对于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作了深刻的阐述：“在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执政党的地位之前，环境迫使我们搞唯物论的反映论。”“执政以后，我们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同志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腐败下去。在剥削制度的历史上，执政的人都是把自己变成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无论担负多么重要的领导职务，都决不能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①

总之，我们的党规党法把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领袖、每个党员、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具体规定，用党的制度和纪律约束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领袖、每个党员、党的干部，不论何时何地，办什么事情，都要自觉地想到和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78页。

三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都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传家宝。但是，一方面，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陷入“文山会海”之中，不深入实际去作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要把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有许许多多的新课题需要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因此，恢复和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就成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思想路线，改进领导方法，从而改善了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领导。

（一）搞好调查研究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键一环

党的领导的根本任务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而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首要条件就要了解和掌握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及其发展规律，其根本途径就是调查研究。能否搞好调查研究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键环节。

调查研究能够保证我们党创造性地制定正确的政策。在制定政策之前，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掌握大量丰富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对于所要决策的事物有一个全面正确地

了解和科学地分析，这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客观依据，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客观基础。如果对于所要决策的事物的情况没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则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实行正确的领导。如果对所要决策的事物的情况，作出了违背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那么作出的决策和按这个决策实行的领导必然是错误的，将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自觉地运用调查研究理论，坚持进行反复调查研究，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打破了“左”的框框的束缚，逐步地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定出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从而开创了我国四化建设的新局面。

调查研究能够使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正确地执行政策。党的各级领导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立脚点，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调查和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殊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客观情况的一般规律，给各地区、各部门的党的领导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则。而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就是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过程。若是离开了对具体的特殊性的分析，一般就难以起到特殊的指导作用。因此，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方法，才能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尤其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南方与北方，农区与牧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发展快的地方与发展缓慢的地方，都有差别性，情况复杂，发展不平衡。不能做什么工作都搞一个标准，一律照办，整齐划一，统一进度，“一刀切”。中央要求我们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很好

地处理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胡耀邦同志明确指出：“中央的这个大政方针只是从全国的普遍情况出发，你执行中央的指示，必须结合你那个地区的特点。如果有了中央的东西，你就不研究自己的特点，不根据本地情况拿出具体办法，还要你那个党委干啥？一个领导者，首要的是了解你那里的特性，把共同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立脚点要研究特殊性，从实际出发，才能解决你那里的问题。”^①

调查研究能够使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党的方针政策。党的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中，由于具体情况的不不断变化，所以必须依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改、补充党的方针政策，使其不断完善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为此，就必须坚持反复地进行调查研究。尤其是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的时间还很短，实践经验还很有限。而我们对现实中国的国情，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不是已经懂得很多，而是懂得还少。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情况非常复杂，事物在不断发展。因此，中央对地方提出要求：“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②当然，应按照组织原则办事，这几条都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交换意见，或者请示报告。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中指出：“中央认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对我们来

①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上的讲话》，1980年5月18、19日。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59页。

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完全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正和完善。中央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农业部门、广大农村干部和农业科学技术教育工作者，要继续深入实际、认真搞好调查研究，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切实、更有效的努力。”

调查研究能够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恢复和发扬。我们经常批评官僚主义，其主要表现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了解情况的主观主义的瞎指挥；或者不善于抓大事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什么事情都要一把手抓，主要领导人陷入事务主义，没有时间考虑大政方针问题，领导水平提不高，工作效率提不高。一个领导人把自己降低到办事员、收发员的地位，不议思想问题，就会陷入领导一般化，不可能真正起领导作用。”^①为了从根本上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恢复和发扬，使我们执行中央的政策更加自觉、更加坚决，保持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以保证更好地实现党的统一领导。

（二）调查研究理论的新运用和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问题成堆、头绪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对全党进行了调查研究的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我国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研究，从而进一步认识了中

^①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国情，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根据这种调查研究所得的真实情况，对一系列方针政策做出了大胆的修改和调整，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很快地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新局面。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在集中主要力量做好当前工作的前提下，用二、三年的时间，对自己主管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办法。”^①中央在大搞调查研究的实践中，把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制定的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和理论观点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

首先，科学地论述了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指出：“要先有调查研究，而后才能发号施令”，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任何工作必须首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解决，而要了解情况，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其次，明确提出调查研究是“我们任何一个部门领导工作的最根本的条件”，是“我们各级领导包括领导机关里面的工作人员的第一位的职责”^②。领导者的正确认识来源于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层出不穷，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找出新办法，打开新局面，善于调查研究是最根本的条件。

再次，强调了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始终应当放在调查研究上。指出“当前领导机关的文件、简报数量过多”，“许多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19页。

②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辽宁视察工作时的讲话。

工作一般化领导太多，老框框太多，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因此，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上”，“要用百分之七十的精力搞调查”^①。越是不下去搞调查研究，领导精力就越陷于烦琐的事务之中，结果就越没有时间搞调查研究，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

第四，论证了调查与研究的关系。指出：“过去把调查研究看成一回事，其实不对，调查和研究不一样”^②。调查和研究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调查要靠研究去提高，而研究又要以调查为基础。那种不调查空研究，或者只调查不研究的做法，都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正确的认识来源于调查和对于各种调查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③

第五，发挥了调查研究是最好的学习的思想。指出：“调查研究、检查督促，就是最好的学习，这就叫从实际中来学习，向实践来学习”，“这是最好的学习，而读书是第二位的。”^④调查研究是培养锻炼干部的一个好办法。

（三）坚持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和方法。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出现两次重大失误，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调查研究和没有做正确的调查研究，结果陷入主观主义。这说明，不搞调查研究固然要陷入主观主义，不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也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正确地调查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取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

要做到正确的调查研究，必须有科学态度。在调查研究中要尊重客观实际，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过去在调查研

^{①②③④}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辽宁视察工作时的讲话。

究中的一条教训，就是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甚至用事先定好的调子去限制被调查的人或者束缚自己，带着预先设想的“框框”到实际中去找“证据”。这种调查研究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调查研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以往还有一种弊病就是坐在屋子里听汇报和看下面报送的材料。听汇报、看报送的材料这种方法是必要的，但又很不够。正象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凭着“生产队那个会计拍脑袋拍出来”的材料，“必然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了解情况的更重要、更基本的方法，是领导者直接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的完整可靠的材料。其次，是要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寻求真理。调查研究中有无科学态度，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①我们从党中央制定的诸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西藏问题的决定，发展农业等决策中可以看出，其内容那么具体、丰富而又切合实际，正是我们党的领导人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虚心求教的结果。

要做到正确的调查研究，还要有科学方法。这就是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把调查得来的感性材料予以加工，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成为有系统的、有条理的理论认识。在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中，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不要被现象和枝节迷惑。胡耀邦同志说：“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存在，但是也要看到，有些问题只是枝节，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不会慌乱。”^②在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中，要防

^{①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840、566页。

止片面性。要全面地、周密地研究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要注意分析研究少数人的意见和同调查者观点不同的意见。决不可偏听偏信，轻率地下结论。总之，不论在什么条件下，调查研究都应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分析和综合，不要被假象迷惑，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观察，不要怕听不同意见，更不要怕被实践检验推翻自己的判断。

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也就是陈云同志提出的“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这是陈云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在一九六二年《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一文中又精辟阐述的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六个字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任何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在方法上，要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对各种意见、设想和方案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并且一定要经过反复考虑而后才作出决定。

首先，要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由于事物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人们的认识有局限性，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①要做到全面地看问题，防止和克服片面性，必须坚持陈云同志教给我们的科学方法。他说：“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

^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54—155页。

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①

其次，要对各种事物、方案进行比较鉴别。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单是全面观察还不够，还必须在全面掌握事物的各方面联系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些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比较。从而确定事物的同异，明确事物的性质，认清各种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陈云同志对于比较的方法作了深刻论述，明确指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②事实证明，比较的方法，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只有通过事物的不同性质、特征、运动形式，存在的时间、地点、条件的比较，才能看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相同的地方；才能看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和各自具有的不同个性，以及它们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以此为根据，提出解决事物矛盾，改造旧事物，发展新事物的几种方案，加以比较，从中选出最好的方案，才有保证把事情办好。当然，只有作正确比较才能达到全面。这主要是抓准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就是说拿来比较的现象必须是同类的，必须在同一关系下进行比较，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只有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比较，才有助于认识的深化。如果割断历史，随意择取不同事物在某段时间内的异同，或仅仅局限于当前的事实，作为比较的依

^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54—155页。

^②《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55页。

据，就会犯诡辩论的错误。又因为任何事物都是诸方面的对立统一体，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只有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看清事物在本质上的对比情况，才能揭示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反映事物的全貌。否则，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难免以偏概全，导致认识上的片面性。

第三，要反复思索而后作出决定。因为人们的认识不仅受历史条件和矛盾表现程度的限制，而且还受人们的实践范围、思维能力，知识水平以及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所以经过一次比较就完全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不可能的，必须有多次反复的思考功夫。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倡反复思考、反复研究、反复实践，从反复中检验、修正、补充、发展已有的认识、计划、方案。陈云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反复的方法是深有体会的，他说：“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于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下就决定的。”^①这深刻地说明，不论何人认识什么事物，作出什么决定，只有坚持运用反复的方法，才能从片面的认识达到全面的认识。实践证明，反复思考、反复研究、反复实践是检验和发展已有的指导方针的科学方法。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所以，经过调查、研究、比较得出来的认识、政策、计划等，是不是正确的，还需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

^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55页。

所谓检验就是检验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即同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否相符合，符合到什么程度。这种检验决不是拿某一具体实践的结果和原来的认识简单地对号就能弄清是非的，而是只有做认真细致的反复调查、研究、比较，才能判明认识的对错，认识对错的程度，认识对错的范围和阶段。因为有时失败并不能证明认识错了，而是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暂时地失败了；有时成功或失败，只能证明认识是部分对了、部分错了，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有时成功或失败，只能证明认识在一定的范围内和阶段上是对的或是错的，不是在一切范围内和各个阶段上都是对的或是错的，不能以局部实践检验关于全局的认识，也不能以某个阶段的实践检验关于全过程的认识。可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反复的调查、研究、比较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坚持正确的认识，纠正错误的认识，补充认识的不足，总结新的经验，提高认识，发展已有的理论和指导方针的过程。因此，反复的调查、研究、比较不仅要做得在制定政策和计划之前，而且在政策和计划制定出来之后，在执行的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



2 020 3898 1

后 记

本书是在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内部刊物《教学研究》上刊登的《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修改合编而成的。本书由李哲同志主编，苗宝泰同志生前曾对本书的编写提出过宝贵意见；参加统编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王长明、关九英、吴南浩、林志、孟继群、景春江同志。

作为本书统编基础的原稿《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和哲学教研室、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辽宁日报》社理论部、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等单位的部分同志共同编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由辽宁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发起，由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和哲学教研室、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等单位部分同志合作编写的。先后参加编写的同志有（以姓氏笔画为序）：于大凡、王长明、王振武、王晶森、史方、关九英、华玉洪、任洪业、许晓东、李光天、狄凤山、杨纯富、吴岩、吴南浩、张炳均、邹德安、初正坤、陈铭卿、陈广亮、林志、武庆安、孟金山、孟继群、胡宝琛、赵如璧、赵松林、洪克俭、梁成纪、温玉世、景春江。

一九八四年一月